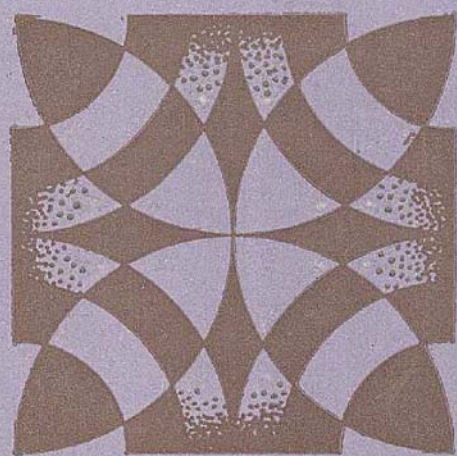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XUESHUYANJIU · 1983 · 4



王正宪，经济学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夏书章，行政管理学家，
现任中山大学教授

学术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目 录

学习 马克思主义	5	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马中柱
经 济	12	学习《资本论》中有关收入问题的几点体会.....卓 炯
	23	关于价格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张问敏 温桂芳
广东经济 研 究	30	论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对策.....中大课题组
	35	江门市创汇农业生产基地的特点和作用李 洲 洪祖伦
精神文明 建 设	38	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邹永图
社会主义 辩 证 法	44	辩证地把握特区、开放区人才建设的几个关系.....吴富泉
哲 学	48	浅论信息概念及其认识论意义.....张海源
	52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齐 云
	59	“两变”命题是对《实践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梁琼芳 袁惠民
史 方 法 学 论	63	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项观奇
历 史	72	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洗剑民
	76	朱九江先生学述朱杰勤
	87	廖仲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李益然
	91	美国的援华抗日蒋相泽
教 育	99	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许肇琳 张天枢

文 学	105	中西方学者论文化的矛盾动力性	(香港) 鲁凡之
	111	论美学研究范围的自律与扩展	彭修良
	115	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 ——论汉代抒情赋	何天杰
	120	关于俞秋圃其人及龚自珍四首诗作的系年问题	樊克政
来稿摘编	127	也谈模糊聚类分析法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与张铁明同志商榷	李忠海
新书评介	129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 ——读《陶渊明论略》	曹础基
广 东 专家动态	131	王正宪教授谈治学育人	
	133	夏书章教授谈行政管理学在我国的建立、应用及其发展	
书 海 酌 蠡	37	《汉语大词典》小议	陈永正
	47	宋玉《高唐赋》中几处倒错	夏 羽
	128	“李清照有子”说质疑	郑宏卫
	71	冯梦龙“司训丹徒”考	易 名
学术会议 论点综述	封三	广东理论界举行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135	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	
	29	广东召开纪念抗战爆发50周年学术座谈会	
	22	广东农史研讨会召开	

封面设计.....王造星

CONTENTS

On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Ma Zhongzhu(5)

A Few Points about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Revenue While Studying Marx's "On Capital"Zhuo Jiong (12)

A Few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the Price ReformZhang Wenmin and Wen Guifang (28)

A Discussion on the Objective of and the Tactic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of the "Foreign-Trade-Oriented Typ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By a subject-projecting group of Zhongshan University(80)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Foreign-Exchange-Earning" Typ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in the Municipality of Jiangmen
..... Li Zhou and Hong Zulun(85)

An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Zou Yongtu (88)

Handle in a Dialectical Way Several Relationships in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Open Zone" Wu Fuquan (44)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Zhang Haiyuan(48)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Socialist Society.....Qi Yun (52)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wo Transformations" Is an Upho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s as Expounded in Mao Zedong's "On Practice"..... Liang Qiongfang and Yuan Huimin(59)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Adopted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Xiang Guanqi (68)
The Process of Feudalization in the Ling Nan Area	Xian Jianmin (72)
An Introduction to Mr. Zhu Jiujiang's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Zhu Jieqin (76)
Liao Zhongkai's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Li Yiran (87)
The U. S. Assistance to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iang Xiangze(91)
The Overseas Chines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Their Hometowns	Xu Zhaolin and Zhang Tianshu (99)
The Opin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Motivation of Contradi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Hong Kong) Lu Fanzhi(105)
On the Autonomy and Expansion in the Sphere of Research in Aesthetics.....	Peng Xiuyin(111)
From "Sentiment Over Reason" to "Reason Over Sentiment" --- A discussion on lyrical <u>fu</u> (a kind of descriptive prose interspersed with verse) of the Han Dynasty	He Tianjie(115)
An Account of Yu Qiupu the Man and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Chronology of the Four Poems by Gong Zizhen	Fan Kezheng(120)
Professor Wang Zhengxian Talks about How to Do Scholarly Research and to Train and Bring Up Young People	(131)
Professor Xia Shuzhang's Opinion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in Our Country	(133)

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马中柱

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其它三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这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用“多元论”、“无用论”、特别是“过时论”来诋毁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因此，有针对性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就完全必要了。

(一)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由它本身的特点和长期的历史斗争形成的。

人们的社会实践是由人们的社会意识来指导的。一定的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不是所有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意识，都在全社会起指导作用，唯有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才起这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①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中，有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科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活动中也不是“平等”地起指导作用的。只有集中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那种社会意识形态，才能成为该社会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成为全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而在一定社会意识中，由哪种社会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对全社会起普遍指导思想的作用，是由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所决定的。因而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

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列宁曾说：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②斯大林也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③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列宁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

义事业和党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说什么“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一个优越的参考系”，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不相符合的。

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在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在和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存在、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确实是作为一个流派，那时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五花八门。但唯独马克思主义站住了脚。正象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说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它们脱离或背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条件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站住脚，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的精神武器。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打了不少败仗。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也偃旗息鼓，销声匿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已载入党章和宪法。

建国三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尤为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正确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有的人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把这些学说看成是和马克思主义“等价”的，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思想流派中的一种”，散布指导思想要“多元化”，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割断历史，在理论上开倒车。

(二)

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普遍性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这个科学世界观是全面的、多层次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

的科学，更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⑥这个定义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层面和完整性。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⑦这个完整的世界观，提供了现实世界各个层面的基本构架，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理论依据。离开了这个世界观，就脱离了全人类文明发展最高成就所铺设的轨道，我们的一切活动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前提，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摸索。因此，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普遍指导作用，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实践证明，无论是建设或改革，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经济建设，要是没有“马克思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⑧的观点作指导，就不能提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上来，提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也不能排除干扰，把它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解决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解决好理想、道德、文化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建设问题，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门育人的科学，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分析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状况及其特点，才能选准改革的目标，制定改革的方针、方法和步骤，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建立起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和适合于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体制模式，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在改革中迷失方向，犯“左”的和右的错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是也侈谈“改革”吗？由于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只能重弹“全盘西化”、“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老调，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照搬到中国来，这是中国国情所不需要的东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普遍指导作用，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科学，说什么“在科学上没有一个外在的指导者”。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各门科学的“外在指导者”，否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各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律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般运动规律存在于特殊运动规律之中，马克思主义从研究现实世界各门科学成果中概括出现实世界发展和认识运动以及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为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成为各门科学的指南。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门科学提供基本的理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解决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原理，是各门科学观察和研究自己对象的基本方向。离开这个基本方向，科学工作就会迷失道路。爱因斯坦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而独立存在的外在世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以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⑧在当代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正确阐明了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基础的这一系列原则。不仅如此，各门科学都要运用哲学的范畴，诸如物质、运动、本质、必然性、形式、内容，等等。“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带。”^⑨而这些范畴是各门科学自己不能单独确定的，必须由哲学来确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对这些范畴的科学规定，才有利于指导各门科学的思维运动，进行分析概括和论证。所以，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⑩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般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科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科学研究要运用观察、实验、模拟等方法搜集大量材料，掌握大量经验事实，但要把这些经验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还须进行理论思维。“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⑪在科学研究中，有的科学工作者在搜集的大量材料面前，一筹莫展，犯所谓“丢失了结论”的错误，在科学史上并非罕见。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⑫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指导，科学家也能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要经过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特别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更加深入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⑬例如，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的研究，提出著名的坂田模型；我国粒子工作者，在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指导下，通过联合研究，建立了层子模型。这不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各门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发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吗？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研究”中“没有指导地位”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事实的。

（三）

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它向无产阶级“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⑭由于马克思主

又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所以，每当无产阶级斗争获得了新的经验，社会历史有了新的发展，科学上出现了新的突破，马克思主义都必然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我们党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作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来看：有的原来被我们忽视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做了充分论述，并把它大大向前推进了。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明确提出的问题，例如，我们提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并对它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内容都作了科学的规定和详细的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社会主义实现以后用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代替市场商品经济；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的经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发展商品经济作为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这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只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都能给以科学的解决，并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说什么“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那些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人，抓住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表面现象，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分析。例如，他们利用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是战后垄断资产阶级迫于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劳工政策。我们知道，当劳动力的价格转化为工资时，资本主义的剥削被掩盖起来，因为它在形式上表现出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获得了报酬。现在由于新技术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大大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大大提高，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也更为增大了。但是，从现象上看，工人工资有增加，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事业有发展，劳动时间也给缩短了。在这个极大矛盾面前，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分析方法，就不难看出：由于福利制度的推行，在劳动力价值中，有越来越大部分脱离了工人自己的支配，工人的工资被国家垄断组织用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形式扣除出来，然后再以福利基金或其它补助金的形式转到工人手中，成为工人的一部分收入。所以，“福利制度”或“福利国家”，是一种更为精巧、更为隐蔽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⑥在现象和本质的矛盾面前，正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指导的时候，反而叫喊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只能使他们离开真理更远。

还有的人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期所依据的科学发现已大大落后于今天，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已陈旧过时的

结论。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六大科学（相对论、量子论、宇宙学、信息论、分子生物学、耗散结构论）、八大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材料技术、激光及激光光学技术、光导纤维与通讯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空间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深入研究新的科学和技术成果，正确理解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各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光荣任务。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开放的，它对各门科学、各个时期的社会实践和各种哲学社会学说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是18—19世纪欧洲哲学、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发展，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把新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终点，而不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机遇，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广博深厚的科学基础之上，随着历史和科学的发展，它的整个内容将得到充实和完善。

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活动中，已经注意了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应用或吸收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来，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还发展了科学哲学、科学学、科学技术史、技术经济学、技术美学等交叉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和吸收各门科学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交叉、综合来汲取我们时代科学思想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将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并永远充满活力。

（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和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分开的。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自然也要否定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解决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研究其中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⑩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路。要达到这个统一，必须经过由理论到实践，又由实践到理论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完成。

首先，从认识上讲，要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在这个一般规律的指导下，要深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更加特殊的规律；在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要制定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制定为实现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所必须的计划、方案和措施。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的过程。这个认识的主体就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部门。

其次，理论的东西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也只有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才能使理论、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符合于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制定出来的。也是由我们党和政府通过艰苦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的。这是有目共睹的。

再次，理论的东西在形成之后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中，都难以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要保证理论的东西正确地形成和贯彻，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以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近十年来，如果没有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就不能进行拨乱反正，克服“左”的错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克服右的错误，保持安定团结局面，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推动、组织和指挥这两条战线斗争的，还是党中央和有关各级党组织以及政府各部门。这充分证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没有党和政府的作用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分的。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向和成功的保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362页
-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3页
- ④ 同①第10页
- ⑤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 ⑥ <红旗>1987年第3期第14页
- ⑦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 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页
- ⑨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284页
- ⑩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 ⑫ 同⑪第482页
-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 ⑭ 同⑬第54页
-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 ⑰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英

学习《资本论》中有关收入问题的 几点体会

卓 炯

如何理解《资本论》第七篇，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不懂得劳动过程一般，就不可能懂得这一篇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为此作了两点启示。

第一点是关于劳动的问题。马克思说：“劳动，这只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①

第二点是关于生产要素的问题。马克思说：“在这个（这个公式就是三位一体公式——作者注）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资本旁边，在一个生产要素的这个属于一定生产方式、属于社会生产过程一定历史形态的形式旁边，在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融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旁边，直接地一方面排上土地，另一方面排上劳动，即排上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而这两者在这种物质形式上，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而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②

这一篇是用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批判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并为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线索。总而言之，只要坚持劳动价值学说，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这一篇共分五章。第四十八章，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并说明收入的源泉是雇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第四十九章，从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分析，批判斯密教条。第五十章，从竞争的假象中进一步批判斯密教条。第五十一章，分析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五十二章，讲的是阶级问题和阶级消灭以后的状况，可惜没有完成。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学说，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就要表现为不同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

一、三位一体的公式

根据我的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体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始终。所谓社会化的大生产，即社会分工的大生产，这正符合我的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的观点。

（一）三位一体的公式用现象来掩盖事物的本质

三位一体的公式就是：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把三种收入说成是三个源泉。这就违反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工资属于必要劳动部分，也就是劳动力价值部分，而利润和地租属于剩余劳动部分，即剩余价值部分。

什么是资本？资本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一种所有权形式。所以资本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独特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生产资料上，并赋予生产资料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即以资本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生产资料，为了维系不断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一定要得到不断的补偿和增殖。补偿是使生产资料不受损失，增殖是使生产资料不断增加，使社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作为社会形态的生产资料，它要占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作为社会形态的生产资料不断增殖，也就是社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执行这种职能，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不断的发展。资本家表现为有产阶级，工人表现为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表现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表现为被剥削的形式。

什么是土地？土地是无机的自然界本身，它当然没有价值。但经过加工的土地，它也是劳动创造的产物，它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它的有限性和差别性，它作为生产资料是任何社会生产都不能缺少的。这种土地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的一定的面积它要取得绝对地租，占有较好的土地它要取得级差地租。土地虽然不能创造价值，却可以影响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的有限性（或叫稀缺性）一定要取得一部分价值，表示不能无条件的使用，至于土地的差别性，会把同量劳动表现在不等量的产品上，从而这些产品会有不同的个别价值。这些个别价值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促使较优良的土地取得超额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超额利润，或者为农业资本家所占有，或者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

什么是劳动？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所谓劳动创造价值就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力创造价值有两个含义，一是把劳动力价值本身再创造出来，二是还要创造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用公式表出来，就是 $v + m$ 。

劳动力创造价值，首先要创造使用价值，因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分不开的，而且它们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价值是由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只是一种客观标准，是衡量价值的一种尺度，但在事实上每一个个别商品生产者不一定都符合价值尺度的要求，有的高于，有的等于，有的低于价值尺度。于是产生一个问题，高于价值的商品生产者，它的产品只能按照价值来出售，他就处于不利的地位。等于价值尺度的商品生产者是符合客观要求的， m 部分可以实现。而低于价值尺度的商品生产者，由于他的劳动效率特别高，不仅可以取得一般的 m ，而且可以取得超额的 m 。

另外还有产品质量的问题，消耗同样的劳动而产品质量不同是常有的。以耐用程度为例，产品质量好的产品比产品质量差的产品如果耐用程度高一倍，这种质量好的产品就等于降低劳动耗费的一半，这是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影响，它不直接表现为劳动耗费，而是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所以不能机械地计算价值量而必需把使用价值的影响考虑进去。有人说马克思劳动价值忽视效用，这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把价值分为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个部分，不要把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混为一谈。所有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但作为价值的分配，则必须考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二) 三位一体的公式混淆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

应该说，三位一体的公式是把价值的分配当作价值的创造。

现在看来，三位一体的公式，对于增加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有巨大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飞速发展，同这种价值的分配方式是有密切联系的。看不到这一点，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以前制度的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只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我们只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之转化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分配形式还是可以吸取的。但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分配的社会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样要重视资金的积累，也就是使生产资料和土地分配到一定的价值量。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无偿使用，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积累而造成巨大的浪费。这也就是说，要通过生产资料和土地取得剩余价值部分。这是社会主义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过去把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对立起来，好象资本主义就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就是按劳分配，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劳动总是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即必要劳动部分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一个部分即剩余劳动部分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问题不在于按资分配，而在于按资分配归谁所有。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归资本家所有，这才是剥削。社会主义的按资分配归劳动人民集体所有，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我们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1. 不论任何社会，各种收入的真正源泉是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但由于所有制的

不同，这种收入的社会形式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是私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成为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就象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和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为了进行积累，土地和生产资料也要取得大部分剩余价值。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即或有矛盾的话，也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然，资本的对抗性矛盾比之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打下物质基础。

2.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属于扩大商品经济的类型，因而剩余价值要表现为平均利润，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剥削集团的分割，而社会主义则表现为各个部门的分配，结果集中为国家所有。

3. 所以，工资、利润、地租是一种分配关系，资本主义把利润和地租当作收入的源泉，有的同志误以为社会主义的利润和地租也是一种剥削形式，都是不正确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分不清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因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当作物质生产过程来理解，把地租和利润当作物来理解，因而产生了资本拜物教，也就是把资本（生产资料的转化形式）当作物来理解。

二、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这一章，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一方面继续批判亚当·斯密把商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三位一体的教条，进一步揭露了庸俗经济学把总产品、总收入和纯收入混为一谈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确立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价值决定仍然起支配作用的观点，这就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过去我们忽视这一点，以致犯了极大的错误。

（一）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工资总是等于工人用来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那部分商品的价值，利润加地租就等于剩余价值。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这就是工人在一年内劳动所创造的总价值。如果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已消耗的不变资本如何解决。这部分资本，不仅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要在实物形式上得到替换，否则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不变资本是一种资本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不变资本在商品一般上表现为不变价值，即“C代表不变价值部分”^⑧可见，商品一般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结合起来，不变价值才转化为不变资本。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一点，总是把商品价值说成是不变资本(c) + 可变资本(v) + 剩余价值(m)，这是由于没有区分商品一般和资本主义商品而造成的。作为商品一般，应该是：c(不变价值) + v(可变价值) + m(剩余价值)。

（二）按照亚当·斯密的教条商品价值只包括 $v + m$ ，那么就会混淆总产品（全部收益或总收益）和总收入的界线。所以应作如下的区分。

总产品，即总收益，就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总产品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构成，也就是 $c+v+m$ 。

总收入是总产品扣除不变资本价值余下的部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地租。

国民收入是从整个社会考察的收入，是总收入的转化形式。

我认为还要确立一个新概念，即把剩余价值从总收入中区别开来叫做纯收入。因为 $c+v$ 带有补偿的性质，而 m 则表现为纯收入，即没有补偿的性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参考。我认为这种区分是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

（三）斯密教条进一步的庸俗化。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能分为纯收益”。这样一来，总产品，总收入、纯收入就没有区别了。

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劳动价值学说，他们把价值的分配关系误认为价值的生产关系，把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误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是创造价值的三个源泉。

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土地作为价值的源泉，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辩护。

集中到一点，由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使他们忽视了商品的价值是基础。商品的价值分解为各种收入，这丝毫不会改变价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规律本身。从而造成了一种误解，好象这些价值的组成部分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分解而成，而是由这些组成部分结合起来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

（四）关于不变资本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把利润看作是一般劳动过程的产物。马克思说：“由利润，或一般说来，由剩余价值的任何形式再转化为资本的事实——我们撇开历史规定的经济形式不说，只把这种转化看作新生产资料的单纯形成——表明：劳动者除了要用劳动来获得直接生活资料以外，还要用劳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状况始终会存在。”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转化为资本，无非就是把一部分剩余劳动用来形成新的追加的生产资料。而这一过程会以利润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出现，无非就是说，支配着这种剩余劳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至于这种剩余劳动必须经过一个表现为收入的阶段，那也只是说，这种劳动或它的产品，要由非劳动者占有。但是，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东西，不是利润本身。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只是表明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不是被资本家当作收入用在个人消费上。实际上这样转化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价值，是物化劳动，是直接体现这个价值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价值先转化为货币，然后交换来的产品。即使是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这个特定形式，利润，也不是这个新资本的源泉。这时，剩余价值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使它变为资本的，并不是这种形式的转化。现在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是商品及其价值。但是，对商品价值没有进行支付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价值才成为无偿占有价值，——同劳

动的物化，同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三、三位一体与竞争的假象

在这一章，马克思继续批判工资、利润、地租三者的总和构成商品价值的错误，三位一体论者认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商品价值的三个来源是由竞争决定的。马克思认为竞争只是一种假象，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变价值+可变价值+剩余价值构成的。

(一) 马克思首先正面讲清这个问题，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总和的绝对界限。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或由商品价值调节的生产价格，分解为以下几个部分：

1. 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代表生产商品时以生产资料的形式用掉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部分。

2. 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部分计量工人的收入。对工人来说，转化为工资，即新创造价值的有偿部分。

3. 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偿劳动部分。

新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地租总和的绝对界限。这就是说，每年新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收入的不同形式，不会改变价值本身的界限。相反，新创造的价值规定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界限。这是因为商品中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的价值部分，和不变资本价值部分一样，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

(二) 新创造的价值不会因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商品价值中新创造的价值会不断转化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是正确的。但是，反过来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商品的价值，则是错误的。新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变化了，但这创造的价值量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变动，只能在新创造的价值所划的界限内进行。

据马克思举出的例子，有两种情况，新创造的价值都是250，其剩余价值率和总利润率可以不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为150%，总利润率为80%，一个剩余价值率为66 $\frac{2}{3}$ %，总利润率为18 $\frac{2}{3}$ %。比例虽然变化了，但新创造的价值均为250。

如果把竞争带到问题中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先说工资。工资不能由竞争来说明。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劳动的价格只能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的。结果，只能是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变成同义语的反复。因此，用竞争的方法不能说明劳动价格究竟是什么？

再说利润。平均利润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是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的。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存在为前提。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

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竞争可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但利润本身的大小是与它无关的。

最后是地租。把竞争搬到地租上，是同样不能说明问题的。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到障碍，就是级差地租，它以超额利润平均化为界限；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就会产生一个绝对地租。它以土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为限制。所以，地租仍然只是已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部分，也与竞争无关。

（三）总而言之，新创造的价值就是可以用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的一切。但是，在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以及庸俗经济学家的观念中，工资、利润和地租合在一起构成商品的价值量，这是把现象当作本质。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具体形式也许有所变动，但它的一般基础，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依然存在。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⑤现在看来，这些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是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可以去掉，但商品经济不能去掉。所以，我们要首先承认工资、利润、地租只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其次，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是由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经济范畴，这说明三者也有共性。但同时又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起来的，说明它们同时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四、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我们学习这一章（即五十一章）应该按照我们发掘的观点，即承认有一个生产关系一般和分配关系一般，然后分析生产关系的特殊和分配关系的特殊。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生产关系，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才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马克思的着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作是自然的关系，抹煞它从属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或者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但又认为生产关系是不变的，具有永恒的性质观点。

（一）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和劳动价值学说，有一个一般劳动过程。这个劳动过程表现为 $c+v+m$ 。 c 是物化劳动或不变价值， v 是可变劳动或可变价值， m 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关系一般，也是分配关系一般。只有这三个组成部分，当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以后，才表现为独特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一部分以工资形式归于劳动力所有者，一部分以利润的形

式归于资本所有者，一部分以地租形式归于土地所有者。这三种形式，表示新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所以它是分配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具有特殊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从而，从属于生产关系的分配关系也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而且，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再生产物质产品，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一种扩大的商品经济，因此，它的生产具有三个层次：第一，它要生产商品；第二，它要生产剩余价值；第三，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生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这个条件下，资本家可以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表现为无偿占有价值。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不仅作为商品，而是商品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生产是资本的生产，流通是资本的流通，分配是资本的分配，消费是资本的消费，工人的个人消费，只是资本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价值规律，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而C和V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是以扩大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它的生产也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它要生产商品；第二，它要生产剩余价值；第三，它要再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C和V的对抗性矛盾，它不断再生产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劳动力所有者，这种剩余价值已为社会所占有，因而这种剩余价值表现为公共必要价值。

（二）分配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

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既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结果，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先谈利润。利润本来是扩大商品经济共有的经济范畴。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利润就反映不同的社会性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必然带来竞争，这就会使利润平均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果实，但利润并不能全部消费掉，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以利润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因而又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至于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种分割之所以发生，当然是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但这样的分割又发展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出现了股份公司，因而也发展了生产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果实。同样的道理，利润也是一分为二，一部分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部分用来扩大再生产，因而利润也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利润本身，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

再说地租。由于土地是生产资料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土地所有权在生产过程中既

不能创造价值也不实现价值，但它却要影响价值。例如，肥沃的土地比之瘦脊的土地，用同样的劳动耗费，却可以提供不同的产量。在物价一致的情况下，肥沃的土地就能提供较大的经济效益。假设每担稻谷的价格是10元，那么肥沃的土地每亩产10担，瘦脊的土地每亩为5担，其经济效益就要相差一倍。不承认这种经济效益的差别是不科学的。这就是所谓级差地租。当然，还有绝对地租。这就是说，通过土地所有权，可以取得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一种分配关系。

在过去，认为这种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现象。现在看来，这种现象，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同样有个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土地公有权。由于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

我国的土地制度，采取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作为耕地，集体占的比重较大。当全民经济向前发展时，必须向集体征用土地。国家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而产生了全民和集体的矛盾。我们认为，在当前，应实行土地国有，为全民所有制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即使是发展个体经济，也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使用任何土地，都要向国家交纳地租。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国家不收地租，而占有多余土地的单位，却可以取得地租或以地租为基础的地价。这是很不科学的。

利润、地租，都是一种分配形式，是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土地、生产资料私有，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土地、生产资料公有，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性质。

我认为，对于三位一体的公式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说三位一体同时创造收入那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但作为资金积累还是起了好作用的，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再生产，同资金积累的关系很大。因此，从资金积累的角度来考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应学习这一点。

我们知道，分配关系决定于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别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是土地、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必然用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社会主义土地和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但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土地和生产资料应该分享一定的剩余价值作为资金积累。我们不应只看到剥削的一面而忽视资金积累的一面。不承认地租和按资分配，是会对资金积累起消极作用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显得资金短缺，是受分配制度不合理的重大影响的。

五、阶级与阶级消亡

（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对阶级作一个总结。关于阶级主要提到三个观点：

1. 资本主义社会有三大阶级，即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2. 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除了基本阶级以外，还有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级，例如许多自由职业者，就不属于三大阶级，还有流氓无产阶级，也不属于三大阶级。

3. 什么是阶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资本论》的整体分析中得出结论。阶级的本质应该属于生产要素占有的形式。工人只占有自己的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其他是一无所有。资本家是占有现代化的生产资料用以剥削劳动人民。地主是占有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阶级。

这些阶级都处在商品经济的体系之中。

（二）阶级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这就必须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结论办事，而不能照抄《哥达纲领批判》的观点。马克思说得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⑥既然价值决定还要起支配作用，而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的同义语，这当然就是商品经济。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它们的共性，二者都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都在发生作用。所不同的前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后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前者存在三大阶级，后者消灭了阶级。但作为商品经济四大部门——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商业资本、地产资本都是存在的。前者表现为四大剥削集团，即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商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后者表现为四大部门，即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商业资本和地产部门。

2. 商品经济生产形式有四大特征：第一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第二商品转化为货币；第三，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力是商品；第四劳动力还创造剩余价值，社会财富不断增加。

3. 商品经济的范畴是共有的经济范畴，这些经济范畴同不同的所有制结合起来，表现为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

4. 价值的本质仍然是劳动。劳动有三种基本形态，即物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物化劳动表现为不变价值，必要劳动表现为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

5.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⑦

6. “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⑧

7. 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力结构又包括生产关系结构。“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⑨

8. 现实的生产过程是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⑩

9. 垄断价格的存在没有取消商品价值决定的界限。“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⑪

10. “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⑩

11. “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1页；

② 同上，第922页；

③ 同上，第944页；

④ 同上，第961页；

⑤ 同上，第990页；

⑥ 同上，第963页；

⑦ 同上，第923页；

⑧ 同上，第925页；

⑨ 同上，第925页；

⑩ 同上，参见第936页；

⑪ 同上，第973页；

⑫ 同上，第992页；

⑬ 同上，第999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东农史研讨会召开

由广东农史研究会筹办的首次广东农史研讨会于7月3日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会议汇集了广州地区大部分从事农史研究的学者及部分古代史研究的老专家共30余人，有13位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发言，涉及广东沙田形成、历史上珠江三角洲农田开发、广东自然灾害史、广东历史上对植物的开发利用、华侨与广东农业的发展以及我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和我国古代瓶花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与会者认为，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农业史的研究。

（林有能）

关于价格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

张问敏 温桂芳

一、指导价格改革的理论依据尚需进一步探讨

价格改革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决定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指导价格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价格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是，到底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理解。首先，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中，有人强调“有计划”一面，有人则强调“商品经济”一面；有人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板块式结合，有人则认为是渗透式或融合式的结合；等等。由于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导致实践上摇摆不定，乃至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当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时，则强调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当前由于粮棉收购量不足，采用所谓“例三七”的超购加价办法，实行合同订购，则又强调“计划经济”的一面。再如，1985年出台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则是典型的计划价与市场价的板块结合理论的产物，但它在实践中已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至于计划与市场如何渗透，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模糊不清的。在现行的价格形式中，浮动价格被认为是集计划价与自由价长处于一身又摒弃两者之不足的好形式，可谓渗透理论的样板。但是，从八年的实践看，能够真正实行浮动价格的产品几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价格下降的，实行最低限价；向上调的，实行最高限价（即以允许的最高调幅为实际执行价），所谓浮动价，成了变相的“第二牌价”，地地道道的计划价。总之，上述四种价格形式就是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四种不同理解的反映；而它们的实践表明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内含，仍是价格改革中首先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理论难题。

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是立足于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毫无疑问，我们所主张实行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的形象，并非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而我国长期实行自然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结果，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小商品经济（即原始商品经济）而不是大商品经济（即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所以在探索改革路子的过程中，有人受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的启发，演绎出“一放就活”的公式，从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就使用“分灶吃饭”、“放权让利”这种违反商品经济原则的“恩赐”办法，结果踏上了原始商品经济的路子，背离了原来的理论设想。目前我们的改革面临三种选

择：一是沿着原始商品经济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二是退回到老路上；三是冷静思考，找出中国式的商品经济的路子。我们认为只能是后一种选择。

那末，中国式的商品经济是什么呢？只能说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因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作为目标模式提出来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模式，尚在实践中，而且这个实践也刚刚开始。因而人们只能从理论上推导，证明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却还不能清晰地看到它活生生的特点和规律性。这样，人们现在只能借助于逻辑思维的帮助，来勾画出它的概貌，还不能真正认识它。所谓有计划与商品经济是板块式、胶体式、渗透式等等的结合，其实都是想象中的画面，还不能证明就是它的本身。应该说，经过几年的检验，人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具体形象。由于实践的局限，企图现在清楚地回答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有困难。正因为这样，在理论研究上应多作探讨，而少做结论。另一方面，板块、胶体、渗透等各种想象，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双轨制”价格、浮动价格、市场价格、超购加价等等的实施，只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人们起码认识到：回到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中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应力求避免商品生产的盲目性所带来的危害，在目前转轨时期的指导思想，不应以原始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也不应以传统的经济理论或计划理论为指导，应该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现在，再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有计划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花费时间，已经似乎没有必要，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以及如何提高国营企业的活力、如何处理好国家进行宏观管理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传统的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实物经济如何向商品经济转轨、八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理论分析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概括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性。我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这种讨论来逐步完善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最终用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

二、价格改革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它涉及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价格改革的成败是影响整个商品经济运行机制是否通畅的条件。对此人们并没有什么疑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争论在于，这里的“成败的关键”的概括是不是准确。有的人同意是“成败的关键”，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机制，而价格市场机制中最有效的一种调节手段。只有改革扭曲的价格结构，使价格灵敏反映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变化，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从企业的角度看，给企业一定的定价权，能够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

而也增加企业活力。再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价格改革的成败关系到能否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所以，无论是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还是劳动工资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价格体系的改革。有的同志则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视具体的经济条件而定。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价格严重扭曲，使其他改革难以进行，从而说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可以的。在目前价格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所有制、财政、金融等方面的问题在改革中的地位比较突出，就不能再提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了。这场争论，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关系极大。近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的讨论，就是由于人们对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理解引起的。有人说，价格改革不能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它充其量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并不能给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以动力和压力。而且当前价格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有等到企业有了消化能力、居民有了承受能力，价格改革才能进行。至于突破口是什么，这种观点认为是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改革可以给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动力和压力，而且可以和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这样，就彻底否定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价格改革也不必继续进行了。所以，这个问题确有搞清楚的需要。

我们认为，不能否认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价格改革是否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都是成败的关键，则是可以研究的。价格改革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它直接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价格改革成败关系到能否为其它改革创造良好环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价格改革成败是其他改革成败的关键。二是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几乎是与计划体制，财政、金融、工资等改革处于平行的地位，不构成与其它改革成败的因果关系。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建立合理价格结构的有效手段，只是间接地对其它经济机制的改革发生影响。所以，笼统地说价格改革是其它改革成败的关键，就不够准确。有人从这里出发，全盘否定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对的。

三、怎样认识和处理稳、调、放、管的关系

经过八年的实践，人们对于价格改革要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在认识上已趋于一致了。为什么在改革和调整的过程中，还会出现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而不能做到基本稳定呢？这是值得认真反思和深入研讨的问题。对此，有的同志从产品结构对价格结构的影响入手，认为急需调整和改革的主要是长期偏低的基础产品价格，这种产品价格变动必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有的同志则从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的关系出发，认为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的过量发行，即由于通货膨胀所致。我们认为，这些分析，各从一个侧面从改革措施的实施中对物价上涨的原因作了有益的探讨。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指导价格调整和改革的思想理论上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从而导致某些改革措施的不完善和失误。具体表

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稳定物价的含义各持己见，认识不统一。例如，有的认为零售物价总水平每年上升不超过1%才能称为物价稳定；有的主张物价水平上升在3%左右也可以认为是基本稳定；有的则坚持只要工资增长快于物价上涨就是物价基本稳定；还有的同志甚至认为稳定物价的方针已经过时。应该肯定，强调价格改革要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思路是对头的。但由于对稳定的含义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在执行中也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即使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仍然认为物价是基本稳定的。二是认为进行结构性的物价调整不会使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对我国原来的价格结构认识不深，对结构性调整的内容、方向缺乏理论上的认真论证，而且在论证时又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把价格的结构性调整简单地看成一部分调高、一部分调低，这样有升有降，升降相抵，不会引起物价上涨；有人甚至用调价金额与降价金额作对比，来说明价格结构性调整不会引起物价上涨等等。显然，把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作为理论论证中的依据，当然不能正确解释物价总水平不会上升的原因。三是把改革与调整混为一谈。认为调就是改，以调整代替改革，以为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可以通过有计划的调整来控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是只调不放的商品价格几乎未调，而对那些放开由市场调节的商品的价格，原先设想用调的办法来控制物价水平已经行不通，以致在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及生产资料实行“双轨价格”后，由于失控而导致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

思想认识上的含混，导致改革失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没有认清放开与改革、放与管之间的关系，把放开等同于改革，以为改革就是放开，进而对放开后的价格撒手不管，甚至出现了问题也不愿管或不会管，怕担反对改革之嫌。诚然，在我国价格管理体制长期处于僵化状态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下放管理权限，逐步放开一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对于松动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在改革中，“放”不仅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必须明确，“放”仅仅是改革的一项而不是全部内容，放开是改革，但改革并不局限于放开。放开后如何管理，同样包含着改革的内容。放与管是统一的。价格放开，要求改变过去管理价格的办法，即由单纯的行政手段，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三者并用的管理办法，使放开的价格更好地发挥功能，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服务。放与管只是在维持旧的管理办法的情况下，才是对立的。因而，放而不管，或放而管死，都反映了对改革的认识是片面或肤浅的，也说明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造成我国价格体系严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因而，要改变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靠调整的办法已不可能凑效。解决价格问题的出路在改革。调整只能是改革的前奏，其作用仅仅在于为改革创造条件，决不能代替改革。因此，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改变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1984年之前，我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调整上，方向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1984年以后，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应该沿着

这条路子把价格改革深入下去。当前，应把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认真从理论上弄清改革与调整的联系与区别，克服以调代改或以放代改的倾向，尤其是要着力研究如何加强对放开后的价格管理，包括管理对象、管理内容、管理办法，管理的组织领导、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价格总水平的控制，使改革健康顺利地前进。

四、关于价格杠杆的运用问题

价格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通过利益的调整 and 信息的传递，对社会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调节、导向作用，因而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但是，价格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具有双向性，运用得好将起好的作用，运用不好就会起反作用。因而，在理论上就有如何认识价格的作用和在实践中如何运用价格杠杆的问题。

我们认为，运用价格杠杆，有三点必须明确：第一，价格杠杆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各种经济机制组成的系统，各种机制既相独立又相联系，任何一种机制要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其他机制的配合。价格机制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机制之一，集中反映着社会经济活动的问题，价格杠杆的运用，容易引起各种连锁反应。尤其是我们当前运用价格机制，是在许多商品价格严重扭曲、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更需要研究相应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包括：①外部条件，主要有财政、税收、利率、工资等经济杠杆的配合，以及商品供需情况，自然资源的制约，国家财力、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价格决策、价格法规，等等。②内部条件，由于商品价格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项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都会对相关产品价格发生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反过来，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动条件，又成为制约该项商品价格变动的因素。这样，运用价格杠杆的内部条件，就表现为各项产品价格调整或改革措施（包括项目选择、出台时机的选择、调整幅度或放开程度等等）的协调。③主观方面的条件，包括人们对价格杠杆的运用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情况，价格决策人员的组织管理水平，等等。所以，在运用价格杠杆时，既要依据外部条件许可程度，又要考虑价格内部条件的制约，还要与人们主观方面的条件相适应，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运用价格杠杆要有适度。既然运用价格杠杆既受客观的和主观的、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制约，那么，运用价格杠杆也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止境的。运用适度，就能起到合理调节要素的配置、推动技术进步和资源的节约等作用，运用不适度，就会事与愿违。此外，所谓要有适度，还指不能以价格杠杆代替其他机制。因为价格杠杆不是万能的。过份地夸大价格杠杆的作用，从而不恰当地运用价格杠杆，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第三，在运用价格杠杆时，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部门和地区、不同产品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不能搞一刀切。

对八年来的实践进行反思，我们认为，重要的教训也正在于这几方面。一是运用价

价格杠杆时往往忽视甚至不顾条件是否许可，对价格的作用期望过高，设计价格调、放方案时往往忽视其他改革的配合，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为价格调、放的步伐过快、过大。二是运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不讲条件，有时甚至出现盲目性。突出表现在为了刺激某些紧缺的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增加供给，有的地方和部门违背价值规律，滥用价格杠杆，把价格抬到惊人的程度；而当产品过剩时，则大幅度降级压价，致使价格一落千丈，形成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落。运用价格杠杆不适度，还表现在调或放的不均衡上。有的产品，由于调价幅度过大，导致与相关产品的比价严重失调；有的产品，放得不恰当，带来放开的产品与未放开的产品在价格上的矛盾。这两种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物价的轮番上涨。三是运用价格杠杆搞一刀切。无论是调整价格或放开价格，几乎是全国统一行动，自上而下进行，而不管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如何，致使价格改革带来许多矛盾和困难。

无论价格杠杆的运用，还是进行价格改革，都要受到周围环境所制约，忽视这一点，都将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今后对价格运用理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价格的功能、价格的调放上，而应深入一步，研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功能的运用条件、运用方式、运用适度、运用效果的评价；如何实现价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尤其是在经济短缺、改革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运用价格杠杆，促进生产，增加供给，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更需要认真研究。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价格的认识及其运用，才能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五、价格与货币关系

价格变动，决定于两个基本的内在因素：一是商品的价值量，一是货币价值。但是，在调整和改革价格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上，忙于测算理论价格，并在以利润率为定价基础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却忽略了对后一个因素的研究。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对于价格与价值的关系的研究、理论价格的测算和定价基础的争论等等没有必要，而是恰恰相反。但是由于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或统一衡量价格是否符合价值的标准问题，因而在实践中，无论是价格调整还是价格改革，都没有以一种所谓的理论价格为依据的。因此，所谓价格既符合价值，又反映供求关系，也仅仅停留在理论的表述上。何况，经过八年的调整和改革，商品的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笼统地说价格背离价值已经于事无补了。

“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9—120页）八年的实践证明，研究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不能忽视价格与货币的关系，即必须重视货币这个特殊商品的价值变化对价格运动的影响。研究价格与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第一，货币发行量直接影响到价格总水平的运动。货币发行过量，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流通所需货币量，就会导致需求过量和通货膨胀，促使物价上涨，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第二，我国的价格调整和改革是在经济

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的。八年来，财政赤字不断，货币过量发行，成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对此，不仅需要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第三，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短缺的问题仍将存在，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短期内也难以解决，抑制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并未消失。一句话，“七五”时期价格改革的经济环境不可能宽松。此外，价格结构性的调整还将进一步推动物价水平上升。因此，有人认为，即使把零售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3—5%之间也是困难的。可见，今后稳定物价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样，如何控制物价总水平，最终要落实到如何控制货币发行上，即如何才能实现货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为此，价格理论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从微观方面转向宏观方面，认真研究价格总水平的运动及其规律性，认真研究影响价格总水平运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货币因素）以及控制或调节总水平运动的办法，以便更好地实现对价格由直接到间接的管理，同时为今后价格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革顺利进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振荣



广东召开纪念抗战爆发50周年学术座谈会

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广东省社科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广东中共党史学会于7月5日在广东省政协联合召开“广东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来自各界的代表共40余人。大会畅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正确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战中的作用、华南抗日纵队的贡献，与会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林有能）

论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对策

中大课题组

本文论及的珠江三角洲，指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包括佛山、江门、中山和东莞四个市，以及顺德、南海、新会、番禺、台山、开平、宝安、增城、斗门、恩平、鹤山和高明12个县。1985年，全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5.4%，耕地面积和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省的18.5%和28.5%。珠江三角洲地处南海之滨，是广东最大的平原，物产极为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农村经济活跃，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全省一半。同时，该区是全国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对外经济贸易走在前列，198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约占全省70%，外贸收购总额占全省42.7%。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的问题，一直得到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国家和省政府也不断采取相应措施，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本文旨在全面分析珠江三角洲发展外向型农业的优势和检讨目前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今后发展的目标和对策。

一、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条件

1. 外向型农业的涵义

农业的发展从市场性质、农业生产结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考察，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封闭型农业。这种农业生产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为目标，其结构适应本地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水平，并尽可能使本地的生产与需求平衡。因此，它是生产与满足本地需求之间的小区域内在循环的经济。

二是开放型农业。它是指随着农村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市场范围不断扩展，生产专业化的形成，发展当地优势的最有利的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和交换的种类和范围不断增多与扩大，市场价

格和市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这就形成了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的经济循环。

三是外向型农业。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型农业，而是面向海外市场，以扩大出口创汇为目标，因此必须有意识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产品流通。外向型农业的发展，不但要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全面调整，还包括流通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

就目前情况看，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早已超出第一种类型，而形成第二种类型。从理论上说，珠江三角洲应加快向第三种类型过渡。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也具备了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有利条件。

2. 基本优势

第一，地理条件优越。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土地肥沃，河海交汇；交通方便，毗邻港澳市场。在全国来说，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

第二，珠江三角洲农业劳动者积累了丰富的种、养经验和技巧。他们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各种高密度利用土地的技巧，从桑基鱼塘发展到蔗基鱼塘、菜基鱼塘、果基鱼塘、花基鱼塘等多种形式。该地区发展经济作物的优势和潜力大。不仅年产量大、种类多，而且正向单产价值高的品种发展。

第三，商品经济发达。历来农产品商品率都高于全省水平。目前，已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区域，例如：广州郊区的蔬菜基地、番禺的糖蔗基地、顺德花卉基地、清远三鸟基地、从化水果和中山塘鱼基地等。

第四，对外经济贸易的有利条件。该区外贸装运点和口岸超过50个，进出口条件较好，十分有利于农副鲜活产品运输出口。

二、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目标

从珠江三角洲农业资源的优势和其对外开放的优势来看,该地区不仅要发展开放型农业,而且要加快实现向外向型农业的转变。解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一直是我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只有在分析优势和现状的基础上,才能实事求是地确立新的农业发展目标。

1. 农副产品出口的现状

首先,主要农副产品出口的相对值和绝对值是呈下降趋势。以佛山市为例,1985年佛山市外贸出口收汇额增长28.1%。同期,粮油、食品出口收汇额下降25.2%。作为该市大宗出口的鲜活农副产品,如塘鱼、蔬菜、三鸟和水果等,下降幅度更大,出口收汇额下降30.1%。

其次,外贸收购农副产品数量占本区农业产值比重较低。例如,东莞市外贸收购农副产品值仅占农业产值7.6%,南海县占4.1%,顺德县占4.6%,番禺县占4.3%。这些市、县是农产品出口较多的,其余县大多数不会超过这些比例。而且,农副产品收购值还包括外地采购的部分。剔除这一部分,其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将更低。

再次,农副产品出口值与农业产值并未同步增长。以南海县为例,从1975至1985年的10年间,农业产值增长2.89倍,年平均递增11.3%,而外贸收购农副产品值仅增长76%,年平均递增5.8%。再从具体产品来看,1980年至1985年,南海塘鱼产量增长62.1%,而外贸收购量增长36.3%;蔬菜面积增加84.4%,外贸收购量下降16.7%;生猪出栏增加1.2%,外贸收购量下降35%;果园面积增长5.4%,外贸收购下降24.7%。可以说,近几年农副产品生产量大幅度上升,但增加的产量主要为“内贸”所吸收了。

最后,出口收汇增长率低于一些重要农副产品出口数量增长率;而出口数量下降低于出口收汇下降幅度。例如,1985年佛山市塘鱼出口量减少1.1%,收汇额却减少43.9%;活禽出口增加71.5%,收汇额仅增19.3%;水果出口增加79.2%,收汇额仅增0.8%;蔬菜出口量下降22.2%,收汇额则下降43.9%。

2. 如何解释“事与愿违”的现象

一种意见认为:自国内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取消大多数农产品派购任务后,出口成本增加,加

上1984年实行的全国统一换汇成本政策,限制了相当数量农副产品出口,因而使该区农副产品出口量减少。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水货”冲击了正常的出口贸易,扰乱了市场;尤其在1985年,农副产品多头出口达到高潮,使我在港澳市场占垄断地位的一些商品供大于求,价格大跌,因而使珠江三角洲农副产品出口额下降。

应该说,这些都是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制约该区农副产品出口的因素。根本制约因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需求制约因素。这是当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珠江三角洲农副产品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从商品结构上看,基本仍以传统的农副产品出口为主;第二,从出口市场结构看,仍以传统的港澳市场为主。这两个特点,制约了本区农副产品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港澳市场对传统农副产品需求本来就十分有限。由于东南亚的国家和台湾省产品的涌入,再加上我省沿海其他地区出口的增加,港澳市场对本区的需求就更加减少了。

其次是供给制约因素,最直接表现是“外贸”与“内贸”的矛盾。该区耕地资源仅占全省18.6%,而城市和建制镇非农业人口则占全省城市和建制镇非农业人口38.7%(1984年);同时,三角洲范围内大城市多,流动人口多,消费水平高。因此,承受内部需求——即“内贸”的压力很重。1979年以前,内贸与外贸的矛盾,是通过外贸按牌价派购,内贸按牌价凭证供应来解决的。实际上,这是通过限制国内消费保证出口货源。1979年以后,出口货源的供给仍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粮食生产仍属计划调节范围,只有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才能安排其他作物种养,从而基本上限定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范围;二是农产品流通基本上受市场调节,外贸部门只有通过价格竞争才能保证货源,从而增加了出口成本。

通过对供求制约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目前来说,制约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出口产品档次低,随着出口市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低档次农副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出口市场狭小,不开拓新的市场,就不可能进一步扩大出口。然而,根据出口市场需求,生产高档农产品,或者开拓新的出口市场,都将涉及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资源的调整,这又涉及到国内需求的压力——即供给制约因素。

3. 近期目标——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和扩大出口市场

珠江三角洲农业向外向型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目前来看，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是需求制约因素。因而，外向型农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在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作大的改变的前提下，根据出口市场需求变化，改变出口农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改变出口农产品结构，重点是开发新的出口农副产品，提高产品档次。一是扩大生产不受出口配额限制的农产品。有出口配额限制的产品，多是我在港澳市场已占垄断地位的产品，配额是为了避免内部互相竞争。扩大不受出口配额限制的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是国外的竞争对手。只有勇于迎接挑战，争取机会，才能迈出外向型农业的第一步。二是提高出口农产品的档次，扩大出口所得需求弹性值较高的农产品。（所得需求弹性值较高，指对该类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消费者所得的增长。）珠江三角洲最有条件充分发挥本身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种养业，迅速实现出口农产品的更新换代。

开拓新的农产品出口市场，重点是扩大向不受出口配额限制的国家地区的出口。也就是说，应重视开发远洋市场。开发远洋市场，面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为此，不但要生产出口档次高、成本低的农副产品，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要发展保鲜、包装和加工工业，否则根本无法远涉重洋将产品运抵市场。

4. 远期目标——实现农业资源最佳配置

从发展观点来看，珠江三角洲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出口数量，将主要受制于“内贸”的压力，即国内迅速增长的对高档农副产品的需求。要解决供给制约因素，将会超出单纯该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单纯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外向型农业发展的远期目标，应该是：以出口为导向，全面调整农业资源配置、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最大可能扩大农副产品出口量和提高出口农副产品的质量。

解决供求制约因素，可有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对本区的农业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在不作大的调整的基础上，增加对土地的资金、技术和劳力投入，从而增加单位土地产出。这个方案比较易行，但农产品出口的最终规模不会有很大

的增长。

第二方案，在广东省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合理调整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以减轻国内需求的压力，尽可能地扩大农产品出口的规模。显然，这个方案的实施，已经超出该区范围，需要从全省角度对农业资源作重新调配。

第三方案，国家有意识地帮助促成该区向外向型的转变。在国家统筹安排下，农业完全以出口为目标，全面调整该地区农业生产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结构，最大可能扩大其农产品出口数量和提高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实施这个方案，调整面涉及全国范围。

第三方案显然是最佳方案。作为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发展的远期目标，应该保证实现第二方案，争取实现第三方案。这样，才能在资源最佳分配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供给制约因素。

三、实现外向型农业发展的对策

1. 建立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

从封闭型农业向开放型农业的转变，其标志是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从开放型农业向外向型农业的转变，其标志则是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的建立。所谓出口生产体系，可以从两个侧面来看。从横向联系看，指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即种养业、加工工业、外贸系统、金融机构、科研市场、供销部门、运输部门相互协调一致；从纵向联系看，必须实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相互衔接，即从培养推广优良品种、提高种养技术开始，直至收获、加工、保鲜、包装、运输、出口、推销等全过程，一环紧扣一环。由纵向和横向形成完整的农产品生产体系，是农业实现外向型转变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在创立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三种主要形式。

贸工农联成一体的出口生产体系。例如，顺德县桂洲区中外合资经营的长毛兔生产联合体，东莞市虎门水产养殖企业，南海县里水区保鲜企业等。这些生产体系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技术，与外商合资或合作生产高档农副产品，或进行深度加工，形成保鲜、贮存、包装和运输一条龙，产品主要销往海

外市场，以引进的先进的种养技术或加工技术为核心，带动当地出口农副产品生产。这种形式的联合企业，其数量还比较少。

以外贸公司为龙头，以专业户为网络，通过外贸部门与专业户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利益均沾，建立起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生产体系，构成第二种形式。如中山市由水产进出口公司牵头，与养鱼专业户签订合同；养鱼专业户按合同规定的品种、规格、价格、数量和上市时间提供产品；外贸部门提供部分饲料和种苗，同时保证合同收购价格浮上不浮下，使生产者受益。现在不少市、县外贸部门，都与生产专业户签订了类似的合同。

第三种形式，由外贸部门自办出口生产基地。例如，东莞市外贸部门自1985年以来，创办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25个，出口创汇290多万美元。南海县外贸公司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设备办起水产品加工厂，就地收购水产品，就地加工，提供出口。

虽然上述出口生产体系能够提供稳定的出口货源，而且在品质和规格上能符合国外市场的要求，但进一步扩大规模则受到供求两方面的制约。从需求方面看，在出口农副产品质量和品种未得到较大改进和提高的前提下，继续增加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会出现外销产品过剩和内销产品不足的失调现象。从供给方面看，生产基地建设需要土地作保证，加工生产基地也需要大量原料供应，这些都涉及土地资源，从而限制了生产基地规模的扩大。

在外向型农业要求扩大出口生产体系，而现实经济水平又制约其进一步扩大的矛盾中，如何实现由开放型农业向外向型农业的第二次转变呢？我们认为，与近期和远期目标相适应，可以分两个阶段促进第二次转变：第一阶段，以贸农形式的出口生产体系为主，第二阶段，以贸工农形式的出口生产体系为主。

2. 第一阶段——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中心

所谓贸农形式的生产体系，指由外贸牵头，直接带动农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出口商品生产体系。其具体组织可以是以外贸为主，以专业户为网络的联营，或者由外贸自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个阶段重点是解决出口农副产品档次，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这里，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引进新品种，使农产品高档化。例如南海

县与澳大利亚合作的哈迪果蔬公司，引进了一批西式蔬菜和水果品种，其扩散和推广对改变传统种植结构将起带动作用。二是改良传统品种，使产品质量标准化，外形规格化，以适应市场需要。三是更新栽培技术，改变品种自然习性，以解决均衡上市的需要，保证每个季节都有充足的出口货源。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都用于产品质量提高这个中心环节，因而可以保证重点。产品质量的突破，将带动数量的增加，这将为第二阶段创造坚实的基础。

3. 第二阶段——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技术为中心

这阶段，将以贸工农形式的生产联合体为主，以农副产品加工技术体系的发展为中心环节。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将替代鲜活农副产品出口，成为主要部分。农副产品加工技术体系不仅包括贮藏、保鲜、运输，以保证市场均衡供应，而且包括对鲜活农副产品的初加工和精加工过程，采用国际通行的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进行加工，制成成品和半成品，以适应以方便化、营养化、个性化为特点的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

之所以将加工环节看作贸工农出口生产体系的中心环节，这是由于：一、加工过程可以改变农副产品出口结构，既使农产品出口向高档化、名、优、特产品转化，又可增加附加价值，提高创汇能力；二、农业种养业的种类、品种是有限的，而加工过程则可以打破这种界限，来源于农业的原料，其加工后的产品种类会大大超过原料的种类，这是工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特点；三、加工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系列化的过程，它同时要求农业种养业的产品适应加工过程的需要，从而对农业种养技术提出新的要求。

目前，扩大农副产品出口首先要从产品质量入手，从贸农联合体的初级阶段抓起。随着出口能力加强和加工技术体系确立，再进行农业生产资源大范围的调整，由此引导农业外向型发展。

4. 外贸体制方面的保证

向外向型农业的转变，必须在逐步完善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的同时，相应采取一系列鼓励出口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尤其在现有情况下，从外贸体制和政策方面，促进和保证外向型农业的发展。

首先是完善现行农副产品出口体制。当前，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产销脱节是发展外向型农业的一个痼疾。在外贸体制还没有全面改革之前，解决产销脱节的中心是协调外贸与生产单位之间权、责、利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在确定双方经济合同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出口代理制，共担风险，利益均沾；另一方面，推进多种形式和内容的联合，通过联系，发挥各自优势，减少流通过环节损耗，灵活适应市场需要。同时，对用以装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资料的进口，也应给予相应政策，使进出口结合，以进养出，以进促出。

其次是完善出口许可证制度。农副产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能够避免内部互相竞争，有利于统一对外。一方面，对于我产品市场占有率比较稳定的产品出口配额分配权力，可试行择优切块到市、县一级；另一方面，对我产品市场占有率趋于下降的产品，既要减少配额，还要通报信息，以加强和促进内部竞争，形成优势，从而复

兴海外市场占有率。

最后，应适当调整现行政策，以鼓励农副产品出口。例如，在价格上，外贸收购产品质量档次高于内销标准的，应给予差价，对于新产品，在价格上也应给予扶持；对发展出口的农业生产体系，在进口生产资源、引进技术以及产品出口方面，应给予关税减免的优惠；用于出口生产基地的贷款，在还款期限和贷款利率上适当予以照顾；在外汇留成方面和农业用汇方面，都应具体体现鼓励出口的政策。

〔本文说明：本研究专题得到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本研究专题由汤其高主持，参加人员有：李智生、朱家健、王珺、叶启文、黎和平。本文是《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农业发展研究报告》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周华



江门市创汇农业生产基地的特点和作用

李 洲 洪祖伦

为了不断增强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外贸出口能力,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江门市农村在去年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就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要建立的外向型的“贸工农”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体系。在经济活动的指导上是按照贸——工——农的顺序,即根据国外市场的需求来决定加工什么和种植什么;在实践上则按照农——工——贸的步骤进行,把着眼点放在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的多种类型的农副产品出口基地,以逐步形成系列化的出口商品生产体系。1985年以来,全市先后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出口商品基地62个。主要是水果、水产、蔬菜、禽畜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五大类。其中优质粮、高档蔬菜、优质水果、名贵花卉等出口农业生产基地25个,种植优质粮面积70多万亩,蔬菜5万多亩,椪柑、夏橙、红玉橙、香蕉、无籽西瓜等10多万亩;瘦肉型猪、美国王鸽、西德长毛兔、鹧鸪、蛇等出口畜牧品生产基地19个,饲养王鸽30万对,瘦肉型猪7万多头,长毛兔4万多只,鹧鸪10万多只;人工饲养对虾、鳗鱼、风鳝、蚝、蚶、育肥蟹等以及加工出口水产品生产基地18个,饲养面积达18万多亩。

上述建立的各种创汇农业的生产基地,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

一是贸工农结合。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这种形式一般是以加工为依托,上联外贸出口部门,下联广大农民,在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关系。如新会县去年兴办的柑桔生产加工体系,就是这种形式。

二是农贸结合。外贸部门同生产单位和农户挂钩,建立产销关系。具体形式,有的是外贸部门投资和生产单位联合经营,利润比例分成;也有的由外贸部门通过供销社或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向专业户或联合体收购产品,并给农户以一定

资金、物资和技术扶持。如新会县外贸部门在同和、茶坑、大洞、大泽、小泽和九子沙建立蔬菜出口生产基地,就是分别采用上述的形式。

三是贸工结合。即外贸部门和加工企业联合经营。如江门市郊区的排粉厂和新会县的通心粉厂,就是采用这种形式。

四是农贸技结合。如新会县外贸部门和供销部门在1985年与农业科技部门合作,与罗坑镇的52户农户挂钩试验种植无籽西瓜,试验成功后,去年继续扩大发展到280户,360亩,提供的无籽西瓜出口350吨,创汇100多万港元,初步发展成为一个无籽西瓜出口的生产基地。

五是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如江门市“江荷园”有限公司,是江门市林化产品公司与香港侨园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合作经营的。这个公司引进一条温室种植的生产线,年产番茄50万公斤,产品全部由外商外销,将成为番茄出口的生产基地。

上述各种创汇农业生产基地,共同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鲜活型。是以生产肉、旦、禽、果、菜、花、鱼为主体的鲜活商品为特征。它是同保鲜、急冻、包装、运输等比较先进的技术设施紧密结合的。

二是科技型。是以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采用比较先进的农业栽培、畜牧饲养、水产饲养等科学技术为特征。它是同引进先进的种苗、技术、设备等联系在一起的。

三是优质效益型。是以国内外市场信息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传统土特产品,继续突出拳头产品,同时提高一般产品,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讲求经济效益为特征。它是按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

四是加工型。是以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增值为

特征。它的蓬勃兴起是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和符合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战略方针的产物。

这些生产基地的建立，虽然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已显示了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对农业现代化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因为这些生产基地，大多数是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先进设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的，因而经济效益比较显著。所以它一出现，就极大地吸引和鼓舞了广大农民，促进农村的农业技术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二是成了外向型农村经济结构的支柱。许多地方以基地为中心，发展各种横向和纵向的联合，与市内外、省内外有关专业厂场进行某些合作，它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单个家庭而能把分散的家庭经营联结起来，能够与当地农村的“两户一体”和专业户挂钩联合，逐步形成专业化、系列化的出口农业生产体系。例如恩平县去年与港商合作建立的脆肉鲩鱼出口生产基地，由港方出资金、出技术，由县农场出土地、出劳力、出厂房，联合经营，产品全部出口。饲养鲩鱼的鱼格，主要来自各专业承包农户，即以合同订购的形式与各承包户挂钩，将适龄鲩鱼（鱼格）收购进来，再加工饲养成优质高效益的脆肉鲩。去年，这个基地已挖300多亩鱼塘饲养脆肉鲩，已先后出口脆肉鲩300多吨。出口的脆肉鲩，在港具有强大竞争力，其售价每吨3200多港元，比当地价格高出三倍多。三是进一步发挥了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贸易的优势。有了出口农业的生产基地，就能有效地解决当前不少地方出口农副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比较分散，科研、生产、加工、技术比较落后，产品质量低劣，以及出口数量不能保证均衡供应等问题。使生产、加工、科研、销售结合起来，不仅有效地从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上为农副产品的出口提供可靠的保证，而且有效地引导和推动了农村经济沿着外向经济的轨道不断发展。例如新会县崖西镇去年组织本地农户利用山地放养本地优质鸡，并得到有关部门从资金、种苗、饲料、防疫等方面大力支持，形成了以专业户为基础的与有关部门横向联系的活鸡出口基地。1985年以来，这个基地发展很快，而且越办越好，两年时间为外贸提供出口的活鸡达115万只，创汇额达390万美元。其中1986年为外贸提供出口活鸡75万只，比上年翻了一番多。现在，这个基地又进一步发展扩大，饲养“三黄”鸡的专业户由去年

310户增加到460多户，预计今年可提供外贸出口活鸡超过100万只，创汇额将会超过前两年的总和。

但是还应当看到，当前江门农村建立各种出口农业的生产基地正在起步，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都未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还要大力发展。今年各地规划发展的各种出口农业生产基地虽比去年增加35个，但能否实现，还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从当前情况来看，要办好创汇农业的生产基地，需进一步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经营方针问题。由于现在出口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大多数要通过外贸部门才能出口。由于流通环节多了，七除八扣后，经营者所得的利益甚微，因而有的主张不把立足点放在出口创汇。看来这种指导思想是不符合沿海经济开放区“贸工农”的方针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出口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的经营，必须实行以外贸出口为主，内外贸结合的方针。因为如果不是以外贸出口为主，就失去了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意义，也失去了沿海经济开放区固有的优势。但有些商品由于国外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受国内出口配额限制等原因而不能出口的，也应在国内寻找市场。因此，只有实行外贸出口为主，内外贸结合的方针，才能使出口生产基地经受得住国际市场变化的风险，做到能进能退，立于不败之地。

（二）政策配套问题。出口农业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使外贸出口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都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才能调动他们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多出口，多创汇。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外贸收购出口渠道统得过死，生产和收购单位缺少经营的自主权。现行的政策是出口商品按行政区域由省外贸各专业公司独家经营，即使超计划产品也不准向外地口岸出口；出口配额少，而且办理出口配额手续繁琐，特别是鲜活产品，对沿海经济开放区照顾不够，外汇留成比例少。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外汇留成不仅比特区少，而且比山区也少，与非开放经济区比较也没有多大差别。在外汇留成的政策上，体现不出对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优惠；外汇留成结算不及时，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单位很少有外汇留成，即使有一些也是结算不及时，迟迟不兑现；创汇的单位和部门用汇太少，外汇使用不合理。为了调动基地生产和经营单位多出口、多创汇的积极性，各地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政策，应在坚持统一管

理的前提下,允许比一般地区搞得更活一些,外汇留成比一般地区适当多一些,以及让下面有更多的自主权,以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

(三)出口商品基地的生产专业化问题。出口商品基地的生产要实行专业化,但不能把专业化搞成单一化。农副产品与工业品不同,可综合利用比较多,例如水产品、畜产品、林产品的综合利用,都大有文章可做。许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充分利用基地的加工设备和技术条件,充分利用原材料及其副产品进行加工综合利用,做到一物多用,变废为宝,才能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起步要高。建立出口农业生产基地起步要高,因为每一商品都有其生产周期,并经历萌芽、发展、成熟、衰落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基地更应该是富有生命力和有竞争能力的。无论引进的品种、种苗和种植、饲养技术以及机械设备和管理方法等,都应当是先进的。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价廉物美的拳头产品,占领国外市场。

(五)加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领导问题。搞好基地建设,首先要加强领导。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强的领导班子来组织规划,协调关系,逐步把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为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现代化的商品基地。对基地所需的资金、物资、能源等,各级政府应统筹兼顾,优先安排;出口创汇重点基地经营有困难的,经市、县财税部门批准,在留利上给予适当照顾;外汇管理部门,应优先安排出口创汇农业基地对经济效益好、创汇多的引进项目;企业外汇不足时,有关部门应考虑安排外汇贷款;农业、银信、科技、交通等部门应从各方面支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以进一步推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门市农委

责任编辑:高伟梧



《汉语大辞典》小议

陈永正

《汉语大辞典》第一卷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略一翻阅,似还有下列不足之处:

一、有些例证未能引原始出处。如“一”部收有“一死生”和“一死生”条目,引明人庄元臣《叔苴子内编》“故至人一生死”和晋人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为例证。若能先征引《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则可免读者再翻检之劳。又如“一本万利”条,引清人昭槤《啸亭杂录》,则不如引明人徐复祚《一文钱》杂剧“一本万利财源长”。

二、编排条目次序舛误。如“人”部“依”字,把“依依不舍”条编于1349页,“依依”条编于1350页。据大词典凡例云,“在多字条目的左上角,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画数序号”,“以该条第二字的全画数计算”。大词典中“依依不舍”的画数序号为“6”,“依依”的画数序号为“8”,则前者有误。应将“依依不舍”条移置于“依依”条之下。

三、引文有误。笔者曾检907页至912页“博”字中的词条,则发现有如下的错误:字头释义第九义项引卢同《若雪寄退之》诗:“若”为“苦”之误。“博士”条引苏曼殊《焚剑记》:“尝游学大鹿国”,“大”字前漏一“于”字。“博山炉”条引李白《杨叛儿》诗“双咽一气凌紫霞”,“咽”为“烟”之误。“博局”条引俞樾《春在堂随笔》“倡楼买笑,博局呼庐”,“庐”为“卢”之误。“博夜”条引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冥冥汶汶,雾雾雰雰”,“雾雾”为“雰雰”之误。“博射”条引《南史·柳惔传》“惔尝与琅琊王瞻博射”,于“琅琊王”三字下加横线,误。琅琊为地名,王瞻为人名。“博泉”条引姚燮《岁暮四章》诗“埋盐窖冷饥逃崔”,“崔”为“雀”之误。“博望”条引刘基《题陈大初画扇》诗“玉绳光裹看山河”,“裹”为“里”之误。

“书海酌蠡”责任编辑:刘斯翰

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邹永图

我认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包含了“政治文明” 的思想，我们应当加以实践和发展

在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明确地把政治建设列入精神文明之中。他在辛亥革命后，把国家的建设分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建设，或叫“实际上之建设”与“精神上之建设”。他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①“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如斯而已。”^②他的建设方略虽有可取之处，但把政治实践看成精神的东西则是欠妥的，把政治建设当成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不当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国家政权、军队、法院等社会的上层建筑物；是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包括阶级斗争）以及人民内部关系；是参与国家事务（包括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内容、形式和任务等）。必须指出，民族间、阶级间、阶级内部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而政治上的革命运动、战争行为、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调整则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关系和活动并不是精神的东西，显然属于社会存在，决不能把它们列入精神活动范围之中。只有政治思想、观点、政策、方针、路线等，才是社会意识，它们的进步与发展，才能列入精神文明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包含了“政治文明”的思想，它讲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系统与文明的过程的统一，是完整的、全面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讲的文明是指人类与社会进步状态和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既讲社会文明又讲人的文明；既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又讲政治文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具体分析了作为客体的社会文明，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不仅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和差别性，而且精辟地阐述了它们的共性：文明的“动力”是“卑劣的贪欲”；文明的“目的”是“个人的财富”；文明的“基础”是“阶级的剥削”。不仅如此，马克思则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精辟地提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文明。他把“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对而

言，并认为全面而发展的人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吸收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驱者傅立叶的观点，认为伟大的文明事业中有两个事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所以，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时，应当既讲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又讲个人的文明，使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否则，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文明系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的文明，都包含了三个文明要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思想，大家谈得很多，这里着重谈谈政治文明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用以反映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的进步和发展状态。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明确地提出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问题。^③而恩格斯则在《起源》一书中，精辟地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既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概括”了文明社会，怎么能说不存在政治文明呢？不仅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政治文明的表现，而且规范社会政治关系的法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具体标志了社会的政治文明。正如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指出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④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政治文明的起源，认为它大体上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步产生的。他们认为，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⑤同时，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⑥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政治文明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⑦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肯定了政治文明，它是整个文明系统的三要素之一，决不能否认和忽视，而应当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倡和加强。

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首先，从人们生活的基本领域及其需要的满足来看，有必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自从人类划分阶级以来，人类的生活类型和历史活动，基本上有三大领域：一是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从而形成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二是由分工、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决定的，因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或血缘地域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及阶级成员内部关系，各民族、各阶级为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与联合，使每一个人都处于一定的政治生活之中；三是人类为了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人自身的结构和活动，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研究，进行各种文明交往以及精神交流，因而形成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整个人类的

社会生活区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指出物质生活的决定性的意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在这三大生活领域的进步和发展状态，便相应地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生活需要。因此，不仅要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在现实社会中，只要有阶级、民族、国家、政党的存在，人们就必然有政治生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只讲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离开或忽视政治、放弃政治建设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得好，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我们今天从事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要加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加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其次，从充分发挥社会系统结构的整体功能来看，有必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由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社会之所以是活的有机体，而不是坚硬的结晶体，正是由于这三者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社会的新旧更替，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正是社会文明的表现，而这只有依赖于上述三个层次的新旧更替才能实现。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也有赖于这三者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社会才有活力，才有前进。社会有机体的三因素即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一方面，经济是基础，是社会的骨骼；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社会的血肉；精神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社会的神经。另一方面，经济决定政治，经济与政治决定精神；反过来，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精神反作用于经济与政治。由此可见，政治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中介作用是很突出的。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即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 and 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离不开政治文明的建设。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建设作为精神文明是不对的，但他重视政治建设的思想却是十分可取的。他指出：“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⑥至于列宁强调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观点，则是大家熟悉的。总之，在社会系统的三个基本层次中，政治的中介作用和反作用以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均足以证明：社会要前进和发展，特别是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协调发展。

最后，从人类社会的文明系统内部三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每一要素的地位和作用看，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要素组成的文明系统中，每一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特点。同时，文明系统的三要素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它们互为存在的条件。因此，只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文明系统的整体功能，包括加速社会的发展和新人的成长。

第一，物质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系统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以物质生产、经济交往为内容的物质生活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生活过程；另一方面，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基础，政治是它的表现形式，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必须为它服务；再方面，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党的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政治工作的成果以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来衡量。有人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这是不妥的。这种看法，除了颠倒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外，还违背了政治将随阶级、国家、政党的消亡而消亡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践证明，把“政治挂帅”作为普遍原理，也不利于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所以，我们讲社会文明的建设，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和核心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除了自身的建设，还必须为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服务。

第二，政治文明是整个阶级社会文明系统的主导和保证，这是因为，政治来源于经济又高于经济，就是说，“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不仅反作用于经济，而且与经济一道决定着精神的发展，政治革命是经济变革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先进阶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革命专政的手段来满足；国家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国家的经济职能以及健全的法制，对经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起保证作用。恩格斯关于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的分析，也是众所周知的。列宁关于政策决定共和国的命运的判断，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保证的判断，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政治在社会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主导和保证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关系是否协调，政治生活是否民主，政治局面是否生动活泼，法制是否健全，党政机关的领导是否高效等等政治文明问题，对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的主导和保证作用，无论国内外还是正反面的实践，都有足够的证明。

第三，精神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系统的动力和先导。这里的关键在于，精神是人类特有的现象，而人是社会及其历史的主体。世间的一切非天然物质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人是一切文明的主体。这就是说，精神文明说到底乃是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提高、科学知识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的状态和过程。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因而人的精神文明的加强，必然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与人自身的改造中，充分地发挥能动作用，推进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也可以说，精神作为动力，通过人为中介、为人所具有，必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成果。物质生产力乃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我们讲精神文明的动力作用，并不否定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它们作为文明的基础和主导，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动力作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任何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社会生产力的跃进，任何先进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新政权的巩固，都必须以先进的、科学的精神（理想、理论、舆论、科学、知识等等）为前导，为新事物鸣锣开道，提供正确的路线、方针和规章。同时，无论物质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其内部必然包含精神文明的成果，如物质生产发展中的科学知识，政治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思想与法律法令。综上所述，精神文明是整个文明系统的动力和先导。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征及其主要内容

政治总是阶级之间的政治和阶级内部的政治，因而政治文明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社会的政治文明，是迄今为止的最高类型的政治文明。这是因为它不再是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参与的政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只对极少数敌人和严重的犯罪分子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以至整个人类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与以往社会的政治文明不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广大人民的人民性的统一，因而这种政治基础是最广泛、最牢固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的改革与建设，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主动调整，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更新，而不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是推翻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决不能允许利用政治体制的改革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共同的统一的内容，又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特定内容。我们国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历史和国情出发，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文明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不仅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还强调了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特别是不适应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为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改革政治体制，我认为，在内容上特别要首先抓如下几项：

第一，加速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真正形成“六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由于剥削阶级已消灭，阶级关系有新变化以及人民政治觉悟和水平提高了等新情况决定的。因而必须建立新型的政治关系，即达到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全体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前进的关系。”也只有在这种新型的政治关系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稳定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由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存在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决定的，实际上，按列宁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民主首先是国家制度，是国家形态；其次，民主是指人民的根本权利；第三，民主是领导原则和作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是真正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生活。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础。当然，它并不排斥集中制，也不排斥自治制。但是，集中制或自治制都必须以民主制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形成民主的集中制、民主的自治制，才能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此外，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应当逐步由间接到直接，由有限到广泛，才能真正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力，充分调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政治权力合理配置和制约平衡的机制，达到政治法律化。这是为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家长制、个人崇拜、滥用权力等残余现象；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法可依，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有秩序地进行，必须健全法制，包括立法、守法、执法等等的完善和严明。特别要强调包括执政党在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决不允许以党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存在。还要强调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和相互协调，共同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第四，改善和加强党政领导，实行党政分工、各司其职，实现领导与管理高效化。这是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问题；正确与有效发挥政府职能问题；中央与地方、集中与分散、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一般来说，党主要解决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路线总的领导问题，而政府则主要解决路线的执行和对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问题。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一大祸害，它足以毁灭党和国家。问题的解决，在于人民民主权力的充分运用，使政治体制有利于和方便于人民对党和国家干部的有效监督；在于有一个完善的领导和干部管理制度。

第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切实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文化、艺术、科学、思想等领域的民主自由融洽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振奋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
- ① 《孙中山选集》第139页。
 -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3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8页。
 - ④ 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第154页。
 - ⑤ 参阅《哲学的贫困》。
 - ⑥ 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
 - ⑦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4页。
 - ⑧ 《孙中山选集》第738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范英

辩证地把握特区、开放区 人才建设的几个关系

吴富泉

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建设能否成功，能否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为全国提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而我们要加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建设，就必须辩证把握和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人才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建设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我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为全国提供经验。加强人才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只抓经济建设，不抓人才建设，那么，经济建设是不可能巩固和持久的。因此，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建设，必须与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经济开发建设相适应，同步进行。这应当成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人才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十分明确的。每当采取一个对外开放步骤时，都提出加强人才建设的问题，要求建设一支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富有开拓精神，技术和管理都过得硬的对外开放工作的干部队伍；强调指出，实行对外开放，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必须有一大批党性强、政策水平高、有事业心、通晓业务、精明强干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一大批精通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法律、外语和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特别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造就一批精通经济技术和国际贸易的专家。中央的指示说明，不解决人才问题，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经济技术的开发建设就缺乏组织保证。为使人才建设与经济建设相适

应，推动和促进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宏观上，不仅在制订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经济建设总体规划的同时，要进行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制订出人才开发建设总体规划，而且要根据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的不同时期人才的需要量和专业要求，搞好近期、中期、远期人才开发建设的规划；在微观上，当规划新的建设项目、进行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分析的同时，对新建设项目所必需的人才来源，也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准备好能胜任新建设项目的洽谈、可行性调查、设计、施工、投产后的管理、生产等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人才建设不能不受到经济建设的制约。人才的数量只能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增长。既不能超越经济发展而盲目增长，也不能拖经济建设的后腿。从长远看，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人才需求量大而又门类繁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解决人才时，既要求保证一定的数量，更要求保证质量，对口适用，讲究效益；既要保证各行各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更要根据轻重缓急，确保重点建设项目所急需的人才，使人才建设与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经济建设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二、引进国外人才和内联 吸引人才的关系

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所实行的特殊政策，而成为加强与国外和内地联系的一个重要交接点。这就决定了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在人才建设上也要采取外引内联的方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引进国外人才的目的是

为了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为我所用，提高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而通过内联吸引人才的目的则是为了集中国内的人才优势，以增强对外引进、吸收、消化、创新和向内地转移的能力。因此，必须把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发展，引进国外人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当代，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对外开放是历史的趋势，世界的潮流。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排外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谁善于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来为发展本国的经济服务，谁就发展得顺利一些，进步得快一些。近百年来美国经济曾一度迅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大量引进国外人才。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从欧洲流亡出来的两千多名著名科学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1949年至1973年间，美国从国外引进了22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在当代美国40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5名是外裔美籍科学家。在这24年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450美元猛增到5010美元。节约了教育投资和有关开支200亿美元。再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科学技术水平并不高，经济也十分落后。为加强经济建设，列宁和斯大林除了重视培养本国人才外，还采取有力措施，从国外引进人才。在1932年的工业化时期，引进国外专家、工程师9000多人，高级技工1万名，有的还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这些人才对苏联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外国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几年，我国的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吸取外国经验，从实际出发，在大力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了一批国外人才，特别是华裔人才，尽可能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建设中来。这些人才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人才，使我们的一些干部逐步学会了同国外资本打交道的本领。这说明，加快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引进国外人才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引进，加速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就必须具备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创新能力的人才。从目前看，光靠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本身的人才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集中国内其它地区的人才优势。而内联则是集中人才优势的一种好形式。我们在对外引进的同时，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搞好内联。因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优越环境和优惠政策，不仅对国外有吸引力，而且对内地也有很大的吸引力。随着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起着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两个扇面的作用，对外辐射力越强，就越需要有后盾，越离不开内地的合作和支持，在经济、技术上是如此，在人才上更是如此。在内地不少地区，不仅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而且大批在专业技术理论上、实践经验上都有相当基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如果把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优势与内地的资金、资源，特别是人才优势结合起来，力量就更加雄厚，对外就越有吸引力。因此，经济特区、开放地区需要通过多种内联形式，把内地的人才优势吸引到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中来。由于内联双方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又不涉及“人才所有制”问题，因而也激发内地选派高素质、成龙配套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到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来开设“窗口”的积极性，以弥补内地信息不灵，知识老化，管理落后等缺陷。同时，内地派来的人员，一般比较精干，又定期轮换，不仅从人才上支援了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解决经济特区、开放地区部分人才不足困难，又能使内地有更多的人在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同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中，得到充实、提高。

总之，经济特区、开放地区采取外引内联的方针，既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人才，又吸引内地的资源、技术和人才，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促进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开发建设，又能加快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信息和人才向内地的转移，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三、培养新一代人才和提高 现有人才素质的关系

从长远看，解决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人才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教育。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对现有人才进行继续教育。发展普通教育，培养新一代人才，是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的明天准备好人才；对现有人才进行继续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是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建设的今天提供急需的人才。因此，搞好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建设，也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告诉我们，不抓普通教育，不提高全民族文化的素质是不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日本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发展起来，成了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我国的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是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人才十分短缺，就更需要重视智力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尤其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面对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对人才的培养要有紧迫感。要把发展普通教育，培养新一代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为90年代和本世纪末的经济振兴和腾飞，作好人才的准备。

作为战略方针，大力发展普通教育，成千成万地培养新一代人才，要坚定不移。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前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要对现有人才、干部进行继续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个任务之所以紧迫，不仅仅是由于当前我们的科学文化还比较落后，而且还因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知识的陈旧周期大大缩短了。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如果不继续学习，进行知识更新，就不能成为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

对现有人才、干部进行继续教育，除了按全国统一要求的，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层次，提高全体干部文化科学和业务技术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说，要充分利用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对外交往频繁、信息灵通，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知识，引进国外智力，引进图书资料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比较方便的特殊有利条件，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武装干部。可以组织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出国研修、调查考察、参观学习；也可以选一两个地方或学校，举办对外开放专题速成班，聘请国外专家、教授来讲授当代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等等。

这些都是对现有人才、干部，特别是科技干部进行继续教育的有效办法。值得需要重视的是，要充分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这个阵地学习科学技术，训练人才。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证明，这种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训练班。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成龙配套地选派一批政治素质好、善于学习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通过合作共事和跟班学习，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到手。

总之，要下很大功夫，发展教育，培养一大批既善于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敢于负责，熟悉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情况、条例、法规并能创造性运用，又熟悉国际市场、精通业务技术的外向型人才。

四、向全国输送人才和全国支援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人才的关系

经济特区、开放地区要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基地。正如“七·五”计划明确提出的，经济特区、开放地区要加快建设，使这一地带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基地、向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基地的同时，逐步成为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基地。这是中央赋予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极其光荣而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长远看，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执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要求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本身要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较高的对外开放工作的人才队伍。而现在的问题是，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这些地区特别需要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外语翻译和律师等人才。这种状况，与经济特区、开放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和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需要是很不相称的，要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吸引人才，壮大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队伍。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经济特

区、开放地区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全国的支持。这是因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事业就是全国的事业。全国各地都要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开放地区，不仅要在物资上、资金上支援，更要在人才上支援。在这方面，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所在的省（市）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全国各地支援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可以采取下述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诸如采取上级委派、商调、借调、合约聘请、内联、对口支援、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在经济特区、开放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组成经济技术顾问小组，提供咨询服务等等。

全国支援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服务全国。只要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有足够的高质量的人才，并利用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锻炼提高，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能力，才能使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在向全国转移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

时，输送更多的人才。实践证明，支援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素质好些，培养新型人才的成才率就会高些，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开发建设的成就就会大些，向全国输送新型人才就会多些。目前，一些省（市）尝试选派一些后备干部到经济特区、开放地区挂职学习锻炼一段时间，也是一条解决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人才不足，又为内地培养输送新型人才的可探索的路子。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辩证把握和正确处理这几个关系，认真加强人才建设，那么，经济特区、开放地区就会出现一个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的局面，大大推动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的经济技术的开发建设，使经济特区、开放地区真正成为我国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责任编辑：巫贵均



宋玉《高唐赋》中几处倒错

夏羽

宋玉《高唐赋》中有几处明显倒错，但历来似无人见及。原文如下：

“……醴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舆，骊仓螭，垂旒旌，旒合谐。絃大弦而雅声流，浏风过而增悲哀。于是调讴，令人怵悒惨凄，协息增歎。于是乃纵猎者，基址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罟罟不倾。……”（断句据梁昭明《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影印本）

这段文字有几处令人生疑。其一，“垂旒旌，旒合谐”二句，“旒”显属上句，因为“旒合谐”本身不通；其二，“于是乃纵猎者，基址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数句，先纵猎者，后传言羽猎，叙事次序混乱，且“基址如星”一句亦颇费解，《文选》诸家注即缺然无说；其三，本来，楚王既已登车扬旒，宜接“传言羽猎”，司马相如《上林赋》、张衡《西京赋》中描叙行猎部分正是这样的。但文中却突然接写“絃大弦而雅声流……协息增歎”一节，就有点不伦不类。

据上述疑点，笔者认为这段描写确有倒错，原来的次序应是，在祝辞已毕之后，继以乐歌，然后接传猎。今试调整其文：

“……醴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于是调讴合谐，絃大弦而雅声流，浏风过而增悲哀。令人怵悒惨凄，协息增歎。王乃乘玉舆，骊仓螭，垂旒旌旒，传言羽猎。于是乃纵猎者，衔枚无声……”

这样调整，不能说已经尽如人意，比如在“垂旒旌旒”之后，还可能有脱简，但已经无法寻补，因此“基址如星”一句，也就显得落落难合了。

浅论信息概念及其认识论意义

张 海 源

“信息”一词，英文为information，意指消息、报告、资料、情报等，由拉丁文informatio转化而来。为了给信息概念规定一个比较准确和科学的定义，首先需要考察“信息”概念本来的应用对象以及它本身在应用对象中的发展。

信息论是控制论的基础。狭义信息论本来是一门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研究存在于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一门通讯理论。广义信息论则被理解为凡是利用狭义信息论观点来研究一切问题的理论。信息与通讯有密切的关系，有同通讯三个阶段相适应的三个信息概念。在第一阶段上，通讯是技术的或语法的，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信号尽可能正确地接收即复制出来。与此相对应，这个阶段的信息称为技术信息（或语法信息），主张信息是物质属性的反映，例如物质的反射性、多样性、结构性、有序性以及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和能量分布的不均匀性等等。有人称它为客观信息；在第二阶段上，通讯是语义的，它和语言的意义有关，保证理解所接收到的信号、语义，必须借助于记忆。与此相适应，这个阶段上的信息称之为语义信息。它强调信息的逻辑——语义观点，认为信息是反映相对于外部世界的某种知识，又有人称它为主观信息；在第三阶段上，是通讯的行动阶段，即把信号变为行动。行动也包括“信码化了的和符号化了的行动系统”，即“谈话和书写的语言”。与此相适应，其信息概念称之为价值信息（或效用信息）。它从逻辑——现实主义观点强调信息的效果，把信息看成为价值性、有利性、经济性及其它类似的特性方面的知识。^①由此可见，信息概念的内容，既包括客观的，也包括主观的，

包括客观实在主观效用的知识。但不论哪一种情况，信息都客观存在。因此，信息的第一个属性就是客观存在，这是我们规定信息涵义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基本点。

信息是什么样的客观存在呢？这就必须对信息作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信息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必然与物质和能量相联系。由于它是通过消息的传递和变换来实现自身的，因而要以物质为载体，能量为动力才会变为现实。即使最简单的朋友通信，也要以信纸信封为载体，人力和交通工具的能量输出为动力才能实现。脱离物质和能量的信息，同离开物质的运动或离开运动的物质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按照维纳的意见，信息既不同于物质，又不同于能量。如果我们把信息和消息看作同义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消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证明维纳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进一步分析“消息”作为客观存在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特征，就一定会发现，消息是消息源发出的在消息的接收体中得到反映的东西，而且没有反映就没有消息，因而消息在本质上就是反映，或者说是与反映相联系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同物质和能量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不是客观实在性，而是反映的属性。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科学地规定信息的涵义。

我们所说的反映，是指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一个事物的属性结构、内容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事物中显示出来，即在另一事物中发生相应的变化，形成对应关系、同构关系或同态关系。宇宙万物绚丽多采，变化无穷，无一不是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反映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反映论。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反映，这种反映是人作为主体与客体事物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反映不是一般事物的反映，而是更加高级更加复杂的反映，是客观事物普遍反映特性的反映。这是因

为，客观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包括其特质、属性和规律等等），既然是对象客体在自己身上的反映，人的头脑再把这种反映加以反映，当然就是反映的反映。这种反映固然也是反映，但已有别于其他客体所固有的反映。主要区别是：第一，它虽然是外部环境在机体上的反映，但作为人的认识都毫不例外地首先发生在感官而后发生在头脑，再后就是通过头脑的行为动作反应。有意识的大脑是这种反映的中心。第二，头脑作为反映的中心，不只是表现在对象客体的反映特性被主体意识到了，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头脑的再创造，把头脑中的反映对象化在物质载体之中，即以语言、文字、符号、信号作代码，把主观反映的形式客观化，以人工形式化的反映代替主观化的客观对象的反映。在这里，语言、文字、符号、信号等等是代意性的，有人为的约定俗成性，有人自身规定的含意。人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反映，不是语言、文字、符号本身，而是由它们所表征的含义。第三，客观自然固有的反映，一般只以对象客体在自身中烙下的客观印记来表征，而人们反映则要找它到它所反映的对象客体固有的对象。换句话说，在人之外的物质体，只消极地接受或被动地反抗外在对象的影响，虽然反映一定包含它的对象内容，但凡属理性的东西，它们是不能加以反映的，对这一点能加以反映的，只有人才做得到。

由此可见，一切反映都源于物质，又不同于物质；它要以能量为动力，又不是能量本身。它的实质是借助于物质及能量的传递、交换，把某一事物的特征、属性在对象客体中复制或再现出来，具有对象性的接收、传输、存贮等特点。这和原来的信息概念是一致的。因此，可将信息定义为：信息是事物相互作用过程的表征，在客体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个事物的特性对象地反映在另一事物之中，并在另一事物中打下自己的印记，这就是信息。

二

前面的信息定义，包含了信息论创始人关于信息概念的描述，但有了更加广泛的含意。哈特莱和申农，从通讯理论出发，把信息看作是消息中不定性的消除。申农还借助于热力学中“熵”的

概念，把“熵”看作是描写不定性大小的量，不定性的消除就是负熵，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与负熵是等价的东西。我们把信息定义为对象性的反映，反映的对象性品质本身就意味着消除了消息中的随机不定性，把非对象的消息排除在外，使它具有客观对象的确定性。同样，维纳把信息看作是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另一种客观存在，实质就是“反映”本身。我们的定义也自在包含了这一思想。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包括某些信息论的奠基人，把信息看作是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分布的不均匀度，这同样和我们的信息定义不相矛盾。因为我们把信息看做客体事物相互作用的表征，而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实质就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当然离不开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的不均匀分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停步于信息论创始人的信息涵义，是会抑制科学技术的进步，阻滞社会实践的发展，与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与时代固有的特征相悖的。因而，我们尝试着给出如上所述的更具有普遍性的信息定义，就是要力图冲破原有信息定义的狭义界限，使它从对象学科的专有名词中解脱出来，赋与它本来应有的涵义，使其在一切实践领域、一切学科对象均享有适用的权力，从而使人们毫不例外地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在具体学科的理论研究中，认识所遵循的路线始终要把自身作为主体对象地与客体事物的信息联系起来，在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找事物的因果关系，推动科学认识的发展和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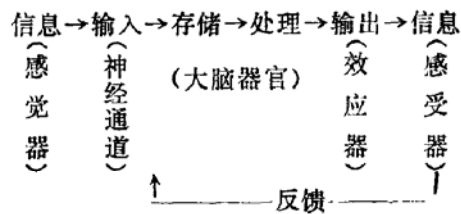
信息概念的认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传统的认识论多是就认识论认识，忽视了主体认识能力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信息概念表明，信息作为反映，是事物相互作用过程的表征。人的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不同于一般的物体或生物体，而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主体的意识（当然包括作为意识存在方式的认知）能力无疑对认识活动本身产生最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信息之成为信息是以对象同化和识别为基础的。对人是信息的东西，就是人能消化和吸收的东西。从信息论观点来看，人类的精神产品可比作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对于具体从事认识活动的人，利用已经存贮的信息，把它提取出来，加以综合和消化，并进一步融汇于新的实践中获取最新的信息，进而寻求新

的原理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具有丰富科学理论知识的人，才能从信息库中取得更多的信息，进行更好的加工处理。空白的大脑既不能感觉更多的东西，也不认识更多的东西”。“只有人们的头脑用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和科学理论知识武装起来，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从‘信息库’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以丰富、发展人们的感觉和思维活动，才能加工处理，形成新的信息，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②但长期以来，认识能力对于认识活动的影响却在我们的认识论体系中被忽视了。甚至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以为在研究人的认识活动之前，首先要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就是离经叛道。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经嘲笑康德关于认识之前“先对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考察工夫，看人是否有达到此种知识的能力”是“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③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事实表明，康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如果不研究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怎样形成和发展，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断定，人类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图式，倾向于只吸收刺激中那些能够加以处理的东西。他明确地指出：“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的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种能力”。^④这是很有启发的。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以为实践就是一切，以为实践已经总结出来的真知不足齿数，忽视前人的科学文化遗产，满足于“实践、实践、再实践”，本质上还是愚昧的表现。这样做的结果，很难同化客体于主体，把人的认识推向前进。

2. 传统的认识论把实践看作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唯一桥梁，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不够完整。主体与客体是否能够联系起来，还有赖于信息。也就是说，任何认识的形成，在宏观固然要归因于实践，但在微观上却要归因于信息。所以更完整地讲应当是实践基础上的信息才是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桥梁。信息论的创立，信息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当我们感知外部世界时，进入我们感官的不是实践中的物质因素本身，而仅仅是客观反映的反映。因为我们看到、听到或触到外在物的存在时，外物并没有跑到我们感觉器官中来，同样，当我们头脑中对感觉反映进行思维加工时，加工的对象也不直接就是

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质实在，而是由感官摄取到的存储于神经中枢的感觉信息。所以人的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信息过程。当我们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时，绝对不容忽视信息在认识过程的特殊作用。维纳在他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中，始终把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行为归结为信息和信息反馈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科学地描绘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世界的模式。他指出，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周围世界，在脑和神经系统中调整感官获得的信息，经过适当的储存、校正和选择，进入效应器官。这些效应器官反作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通过象感觉器官末梢这类感受器官，再作用于神经系统。运动感觉器所收到的信息又同已存储的信息结合起来，影响将来的动作，这个过程我们可简单图示如下：



显然这个过程是在实践中发生的，但不能仅仅用实践来说明。作为信息过程，同实际行动的实践活动还有所区别。用信息过程来说明人的认识，避免了把人的认识活动简单地等同于实践活动。这对于认识活动的探索和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开拓了新的途径。

3. 传统的认识论讲反映，只讲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也就是说只讲主体的反映属性，不讲客体本身的反映属性，这就不能不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带来某种弊端。因为人们认识任何事物，必须同客体自身的反映属性联系起来。否则，就会象动物那样，只能再现事物的感性图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过去，我们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但人们在认识客体事物时则常常用实践的直观形式来思考问题，即把实践过程中所见到的某些现象直接地不加分析地同实践活动挂钩。信息概念指明了信息是客观事物相互作用过程的表征，指明了客体事物普遍具有反映属性，这就有利于克服实践的直观形式的思维方法，使主体能从客体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从它的对象性反映的存在物中找到较为科学的答案。例如，从信息论观点出发，就应当把不正之风这一客观现象看作某一特定事物（或某几

种特定事物)的对象性反映。我们就能充分意识到,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有些是早已有之,有些是乘改革之机泛滥起来的。这一客观现象的本质特征不是以改革为对象的。相反,它是以反改革作为自己对象的。它本身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没落思想的反映。因此,不能把它的出现归咎于改革。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一样,都必须意识到客体对象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人的认识作为客体的对象性反映的反映,就要从客观事物本身的对象性反映中掌握它的特殊本质。把认识客体简单化、直观化,是不能不犯片面性错误的。

4. 由于信息概念的提出,已揭示出信息本身的客观存在。因而,人们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实体属性、运动属性,而且还要认识它的反映属性。人的认识(也即人的知识)作为反映的反映,也成了人的认识活动的重要对象。正如美国人工智能奠基人之一、知识工程理论提出者爱德华·费根鲍姆教授所指出的,专家系统的力量来自于它们存储的知识,那些知识现在是存储在专家(人)的头脑里,而把这些知识取出来——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称之为知识获取问题——则是知识工程技术员当前面临的重大难关。所以,知识工程师的认识对象,已经超出了传统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对象,知识信息本身的获取、存贮、处理已变成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除此之外,当我们把主体的人作为客体对象来研究时,这个客体对象也包含有崭新的内容。由于人的思维已经能部分地交给机器来完成,人类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大大加强,所以主体也不完全等同于原

来意义上的主体。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原来不是人的认识对象的新的对象、新的方面和规律性被引进到人的思维领域。今天我们研究认识论,不仅要把外在物质客体作为对象,也要把已有的知识信息作为自己的对象;不仅要把人作为主体,而且要把主体思维的辅助手段作为自己的主体性的本质力量。只有这样,认识论才会有生机勃勃的现代气息,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

综上所述,信息概念及其认识论意义就在于,它说明了人的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反馈过程;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主体对于客观信息的识别能力、客体本身的反映属性的对象性质、主体的知识信息对于人的认识产生深刻的影响;客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通过客体固有的反映属性,即信息来折射的。要全面地掌握认识过程的本质,就首先把信息作为一个认识对象来研究。

①② 参见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第102—103页,第167—168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50页。

④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60—61页。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 冯达才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

齐 云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人们思想上便随之出现了关于商品经济的种种观念。然而，对商品经济观念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当前还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的分歧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存在，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积极作用。因此，明确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确定对不同的商品经济观念的不同态度，而且可以自觉地发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观念上的表现

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商品经济观念，在性质上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因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性质上不同的商品经济，即在国际上存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商品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便产生性质不同的两种商品经济观念。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具有自身鲜明特色。把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也就有利于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特征。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这说明它可以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相结合。事实上，也曾经存在过建立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它在社会经济中还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才在社会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并且成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说：“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①以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虽然没有改变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质，但是对商品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却发生重要的影响。

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济。它依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个性。首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虽然同样以交换为目的，但从事商品生产的人不再是独立的劳动者，而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相结合，才形成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其次，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基本特征。建立在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其产品全部归劳动者自身所有。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全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其中一小部分作为劳动力的价格转化为工人的工资，而绝大部分作为工人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所掠夺。再次，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增殖资本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目的。独立的个体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是用以交换自身需要的其他消费资料。资本家利用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商品，不仅是为了交换资本家需要的其他消费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取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地增殖资本。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②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作为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作用也必然地具有二重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必然克服对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地域界限、民族偏见和闭关自守，克服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和观念，并且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马克思指出，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财富表现的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正是人对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挥，正是人创造的天赋的绝对发挥。然而，“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这种本质特征，它把追逐金钱、积累财富作为根本目的，把一切视为可以同货币交换的商品，这种观念上的异化正是经济生活中的异化的表现。

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虽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却具有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的特性。首先，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的自主劳动为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工人和资本家在劳动力的出卖与购买上是平等的商品交换者。然而一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家就完全支配着工人，工人的劳动是被强制的和为他人的异化劳动。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彼此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现阶段，劳动虽然主要还是谋生的手段，但劳动者的劳动已摆脱人和物的强制，属于自主的和自由的劳动。其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产品，经过必要的社会扣除外，按照各人的劳动情况（即各人所提供的必要社会劳动的情况）进行分

配。而社会扣除的各个部分，最终也经不同的形式用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是为自己和社会而劳动。再次，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单个企业可以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可是从全社会的规模看，价值规律是盲目地发生作用的。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根本利益互相对抗的阶级、阶层，可以使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因而可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应用价值规律，减少商品经济的盲目性。以上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使劳动者共同富裕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映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在本质上是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致的。它的核心是劳动致富的观念，把劳动视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倡导通过劳动以达到个人、集体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在社会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上，可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的观念形式，自然也可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这是我们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一个观点，不要一谈到商品经济观念，就以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不要一谈到商品经济观念的作用，就想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消极作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独特内容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映，就其内容看，它是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定的。然而，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就其来源看，它必然要从以往各种商品经济观念中吸取思想资料。但是，这种吸收应该是经过改造和发展的，使它们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观念。商品交换中的平等观念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商品经济观念，它是随着商品交换行为的出现而形成的，它体现了商品交换活动中的主体之间和客体之间都是等价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当然必须吸取这种平等观念，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同样必须反对特权，必须承认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身分平等的商品交换者。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平等观念还必须增添新的内容。因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都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都按照自己提供的必要社会劳动量参加分配。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是一般的商品经济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平等观念是全面的，是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平等观念的新发展。

竞争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特殊

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当商品经济形式在社会经济中还处于从属地位，即它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一般地不会出现明显的竞争行为。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就是说社会财富的产生，人们的生活资料的取得，主要地以至全部地来源于商品经济时，商品经济活动中就必然出现竞争行为，并且越演越烈。这种行为在观念上的反映，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竞争观念，并且进而发展为一般的竞争意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也包含竞争观念，但它应该摒弃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中消极的成分，吸收它的合理的积极的内容。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受追逐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支配，所以竞争是不择手段的，力求打倒或吞并竞争对手，发展到以垄断来进行竞争。在观念上，表现为竞争就是目的，竞争就是一切。这种竞争的行为和观念，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竞争观念应该吸收资本主义竞争观念中那种敢于超过对手的精神，那种通过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去争取和扩大市场的思想，那种在竞争中着力于创新的思维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的竞争观念不应把竞争看作一切，而应把竞争当作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的进步和促进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手段。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批判地继承那些反映商品经济一般和具备合理因素的思想观念，而对那些内容腐朽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则坚决地摒弃。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一方面，必须批判地吸收历史上的商品经济观念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形成自己的特有的新观念。那些反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个性、特征的观念，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中的新观念。例如，劳动致富的观念就是这种新的观念。因为劳动致富作为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社会现象，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存在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只有奴隶主、封建领主等可以通过占有奴隶、农奴、农民的剩余劳动致富，那些被剥削者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至于独立的个体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同样难以通过劳动致富，他们的有限的劳动资料和劳动能力就决定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形式中，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而独立地从事商品生产的个体劳动者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致富，也不过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所以，我国旧时代有句俗话：“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是反映了旧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致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普遍的必然性。首先，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的工资已经有了原则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资是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价格，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报酬）是他的劳动成果经过必要的社会扣除后的全部剩余。从质和量上看，它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不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劳动得越好，创造的财富越多，他们取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多，而不受再生产自身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价格这一界限的限制。所以，在真正和彻底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完全可以通过劳动致富。当然，前提是必须发

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不能搞所谓的“穷社会主义”。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致富，这已经为不少的事实所证明。我们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提供的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为依据的。

还有经济活动中的互利观念，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新内容。一般来看，商品交换活动的各方应该是互利的。缺乏必要的互利条件，正常的商品交换就无法实现。可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各个资本家、各个企业都极力追逐自身的利益，甚至通过损害他方的利益去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中没有互利观念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多地增加社会产品、社会财富，以逐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各个个人、各个企业必须把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和满足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必须在相互间的经济活动中提倡互利而反对损人利己。只有互利，才有利于各项经济联系、经济活动的实现，有利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协调健康的运行。在企业与顾客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应该这样，在国内市场上的活动和国际市场上的活动都应该这样。因此，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中，互利观念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不仅具有独特的新内容，而且在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组成为有机的整体。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是根本规律。相应地，拜金主义，不顾一切地追逐货币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通过劳动实现共同富裕是根本规律。相应地，劳动致富和共同富裕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具体观念都是受其制约的。从价值观念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具体地揭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必要的社会劳动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中，以上述的认识为基础，把个人、集体通过劳动（体力的和智力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的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与社会对这种贡献的承认和肯定，作为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个人的价值既不取决于他占有的财富的多少，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职务的高低。脱离了劳动创造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人的劳动创造得不到社会的相应的承认、肯定，他的价值也是没有实现的。

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内容和内在结构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探讨。

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映，它的首要的作用就是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是突破原有的经济体制的束缚而实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发展经济和建设现代化，基本上采取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是按照产品经济的理论，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否认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使直接生产、建设、经营的单位丧失了自主权和主动性，使整个经济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表现在理论、观念上，就是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用计划经济否定商品经济。因此，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必须在理论观念上得到突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批评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阐明了实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形成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它从政治上、理论上、体制上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自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取得前所未有的蓬勃的发展势头。它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在宏观决策上的积极作用。

当前，要继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彻底地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旧体制，完整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去清除、代替自然经济观念、小生产观念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这是一个关键。

首先，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从宏观上看，必须坚决抵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图。国际上某些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希望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将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演变成单一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即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为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观念上明确划清二者的界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其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等的作用，最终要受到计划机制的制约。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巩固、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离开了这两条，就会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从微观上看，必须坚决抵制、清除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及其影响。拜金主义观念把一切社会事物、人际关系都视为可以交换的商品，把追逐货币、金钱当作全部活动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④这种腐朽的观念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所谓“一切向钱看”、“认钱不认人”的观点及其表现，不能不说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在商品经济中，货币、金钱是商品价值的普遍等价物。发展商品经济，而要求不讲钱、不向钱看，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能“一切向钱看”，必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从人际关系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之间当然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关系，但决不是全部关系都是等价交换。仅仅从

经济关系看，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还存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提倡在经济活动中“认钱又认人”，就是既看到商品交换的关系，又看到人们之间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

其次，要继续破除自然经济观念和产品经济观念及其影响。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不仅受到产品经济观念的巨大影响，也受到自然经济观念的重要影响。自然经济形成的封闭性观念、轻商观念等，产品经济形成的依赖行政手段调节经济的观念、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观念等，都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取代那些不符合实际要求的观念，才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扫除思想障碍。

再次，要彻底清除小生产观念及其影响。在广大农民中，小生产观念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小生产的一个特点是生产什么销售什么，生产活动脱离市场变化，缺乏市场观念。小生产的又一个特点是孤立地而又全面地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缺乏专业化观念和联合观念。对于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和脱贫致富，这些观念和特点都是思想的束缚和实际的阻力。因此，必须帮助广大农民从小生产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增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特别要强化市场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专业化生产观念，引导农民眼睛盯着市场，按照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进行生产、经营，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竞争能力。这样，才能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取得主动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②同①第257、679页

③同①第46卷（上）第486—487页

④同③第171页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范英

“两变”命题是对《实践论》 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梁琼芳 袁惠民

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这一哲学命题同《实践论》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两变”命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两变”命题，溯源于我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继承了《实践论》的科学思想。

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经历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直到1949年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伟大而又来之不易的胜利。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是必然的。毛泽东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客观世界。他指出，他的一些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以及当时起草的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等，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标志着我党对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具有基本的正确认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的概括；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和革命战争的战

略、策略；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方面的政策、策略；关于政治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等等，都是我国民主革命一系列丰富经验的总结。哲学上的“两变”命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些哲学思想，都可以溯源于这些丰富的革命经验。

对于我党在民主革命中这个伟大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毛泽东还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我党的全部工作，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它的代表作。

以《实践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着重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两变”命题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之所以正确，正在于它继承了《实践论》的科学思想。它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过程，开始是感性认识，后来积累多了，变成理性认识，然后再把理性认识放到实践中去考验，看是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他特别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些关于认识的基础、过程、目的和检验标准等思想，是和《实践论》的思想一致的。

围绕着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来阐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期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说过：“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

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①我们说“两变”命题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继承和发挥了这些基本观点。

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两变”哲学命题的精华。《实践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思想，正是要人们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这方面的论述更是深刻透澈。他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他又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③“两变”命题所提倡的，就是这种符合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用这八个字传神地表述了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他在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④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正是这样做的。革命战争是这种能动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场所。几十年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说明这个思想的真理性，同样，它也说明了“两变”命题的正确性。

二

“两变”命题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经验，对《实践论》思想作了正确的发挥。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3年的14年间，我党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

要矛盾；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从事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指出要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不关系；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八大以后，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又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59年，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些都是对我国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了各种条例，分别制定了各项具体的政策，表明我党对中国国情的掌握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经验日益丰富。与此同时，毛泽东经常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唯物论和坚持辩证法，并在总结工作过程中常常进行深刻的哲学论述。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王国，今后我们要在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性，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盲目性，从而获得自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哲学论文及其提出的“两变”命题，就是在我国进行了14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产生，是综合了上述哲学思想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困难纷繁的东方大国中，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建设，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识上，无论在改造客观世界还是在改造主观世界方面，都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不能不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使这个社会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将必表现得充分、更丰富、更多姿多采。“两变”命题的提出，正是想从哲学上、从总体上来反映、概括这个伟大的实践的和认识的运动，想对这个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壮观

图景，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

“两变”命题对《实践论》思想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它紧紧抓住物质与精神这对范畴，把它和实践与认识这对范畴连结在一起而展开阐述。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关于认识的来源、过程等原理结合起来，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丰富和发挥。论文多处论述着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首先，它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取得正确思想的基本问题。其次，它认为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也就是从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这是统一过程的两重含义。如果说《实践论》侧重于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探求正确认识的来源、形成和检验发展等方面，那末，可以说“两变”命题，正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着重发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意义。再次，“两变”命题还指出，人们割裂物质与精神关系，正是错误思想发生原因之一。可见，“两变”命题正是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上，丰富和发挥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发展了《实践论》的思想。

诚然，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党工作在政策上乃至指导思想，开始发生严重的失误。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无视客观规律；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教条主义和“左”的情绪在增长。这些错误的实践与经验，对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哲学论文，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笔者以为，文中对先进力量斗争中失败的原因，没有着重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强调主客观分裂的根源，强调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这是一点不足。对于物质与精神互相转化的条件，即如何做到在“变”字上的科学化、具体化，也论述得不够。但整个看来，“两变”命题及这篇哲学论文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它确实继承和发展了《实践论》的思想，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至于毛泽东晚年在估计形势和制定政策上所发生的严重错误，这并不足以改变他几十年来形成和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甚至他自己在主观上还以为这种做法正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哩。对于这种悲剧，我们后人固然要时刻有所警惕。但是，历史上这种复杂的认识现象，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要分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些是主流，那些是支流。而且，在毛泽东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时，它主要地是和我党的整个的正确经验相联系的。可见“两变”的命题，确是继承了《实践论》等著作的哲学传统，不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经验和哲学概括，在哲学思想上它确有新的见解与发挥。只有作这样的分析与评价，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对待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晚期的哲学思维。

三

社会主义建设，是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事业，也是千百万人的创造活动。因而，更需要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更需要强调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反对割裂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任何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说，能否实现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的正确飞跃，直接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怎样把“两变”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前实际，并使它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呢？

首先，要有社会进步的观点。我国的建设，物质在变，精神也在变。“变”是“两变”命题的生命。没有“变”，这个具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命题就不复存在。

和《实践论》发表时的50年前相比，中国的变化，恐怕已为世所公认。和发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时相比，20多年来，我们经历过严重“左”倾错误的沉重教训，也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批判“两个凡是”，完整地准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我党的地堡；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澄清了历史问题上的是非功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开展了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济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日渐形成一个整体设想；肯定特区建设成就，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加强对外交往；努力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现新老交替和实行新老结合，逐步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展科技教育事业，赶上世界范围的技术革命……等等。总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物质变精神，还是精神变物质，这个“变”的立足点，已经安置在一个新的起点线上，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熟视无睹，

那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其次,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形成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①他又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物质是“两变”过程的出发点,我们发扬能动性的前提是要符合客观实际。所谓从物质到精神,就是要根据客观实际来确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民主革命中,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错误,都是和盲目照抄别国经验,脱离中国国情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也和照搬别国模式有关,体制不活,统得过死。建设中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急于求成的唯意志论,都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割裂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是保证从物质到精神的正确飞跃的基本条件。能否认识国情,正是我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是否认识、是否成熟的标志。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它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是相互联系、唇齿相依的。我们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再次,必须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两变”原理表明,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水

平都比较落后。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开放政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国内,在全民所有制为主的情况下,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在搞活国内商品经济的同时,要经常克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影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精神优势。我们必须重视这种精神优势的作用,才能克服复杂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不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同时也要认真克服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我国建设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左”倾严重错误的产生,是和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只有克服上述的错误思想与作风,才能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反对一切理论与实践分离、精神与物质割裂的倾向,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6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2页。

⑤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巫贵均

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

项观奇

近二三十年间，国外出现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的新学派，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反映了历史科学方法论正适应当今时代的条件、特点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历史数量研究法正在迅速向世界各国史学界渗透。相比之下，我们对这一方法的研究和运用还较为落后。为了在自己已有的基础和优良传统之上，建立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体系，引进并消化国外各种历史研究的新的科学方法是完全必要的。这里试图对历史数量研究法作一初步探讨，并相应对国外关于这一方法的运用作一点评价。

运用历史数量研究法的现实性

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注意量的考察，从古代就已开始了。例如在许多著名的历史著作中，中外史学家，为了准确说明某一王朝的规模与实力，都曾充分注意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数量关系，如城池大小的量，兵车多少的量，征战胜负的量，经济实力的量，动乱发生的量……乃至一些细微的量。正是基于这些大小不等的量，史学家就能据以表达自己对某一王朝盛衰强弱的认识。量的事实越充分，认识的内容就显得越充实，越精确。于是，自古以来，对历史作量的考察，就成为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方法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延续下来。

为了把历史科学中对于量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需要首先弄清这一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历史作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既往过程，表现为质与量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无比丰富，表现为一系列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这一系列的质的规定性，又总是相应地伴随着一系列的量的规定性而展开；而且，这些量的规定性又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存在着，它们随同着质的变化而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交错和不断变动，形成一系列复杂的量的关系。因此，从数学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这个复杂的运动着的大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着的数量关系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历史的物质性则是这种数量关系的唯物主义依据。这就决定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是可行的、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社会历史都能够、而且非常需要从量的角度去研究，这是把握历史事物的质的限度、使之对于质的认识深刻化、精确化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已经为历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没有足够的量和量的关系的资料，无法深刻说明历史的本质。对于量和量的关系的研究层次越高，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也越深刻。

这既是对历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可行性的哲学论证，也是对历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今天探讨的历史数量研究法，严格地说，并不是以往运用算术知识或初等数学即可进行的简单计量方法的重复，而是建立在高等数学知识基础之上、突出表现在运用以新的科学水平——首先是自然科学水平为前提形成的现代数学成就，并以电子计算机作为有力的工作工具，这样，才把历史数量研究法提高到新的时代的高度。日本学者曾对历史数量研究法作过这样的归纳：“第一，要求使用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系统收集、利用史料及进行统计分析成为可能。电子计算机向研究者提供了处理大量情况资料和分析多变量现象的能力，这就为数量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统计分析。这里不是指历史学中过去所使用的描述性统计，而是属于更高级的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这些分析大部分非使用电子计算机不可。第三，制作数学模式。借用各相邻学科原有的模式，在数量历史学发展中获得数理表现。”^①美苏诸国学者也大致持此种看法。显而易见，这种新方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数学发展的结果。苏联学者说：“我们生活在数学世纪。从二十世纪初起，数学就活跃地渗透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②现代数学不断以新的方法去解析人们正在认识的客观物质世界的量的关系；它的形式越抽象，反映得越深刻，它的形式越复杂，反映得越广阔，因此没有一门科学不在自己的认识层次上借助于现代数学这个有力的工具，比较而言，历史学在这方面的醒悟是较晚的，因为现代数学已经将认识工具放在了自己的门前。其次，它是整个自然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结果。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发展迅猛，新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的综合理论、方法论不断提出，象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问世，即集中反映了自然科学在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中的进步。这种进步，尤其它的方法论的进步，必然会作为一种可供借鉴的认识工具向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渗透，事实上已经发生着这种渗透。最后，还应说明，历史数量研究法并不是现代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论分别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结果，而是二者相联系、相统一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结果。这反映着时代特点——自然科学方法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社会科学方法论渗透。

新的历史数量研究法所以引起史学家的兴趣和重视，还与历史认识的特点有关。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以往的人类社会的活动，要研究历史只有借助前人留下的反映历史活动面貌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总是有限的，甚至常常是稀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料，就成为历史学家着意探讨的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历史数量研究法表现出相当大的方法论价值。英国著名数量史学家福格尔论述过这一价值：“以往的经济学家主要限于阐述从标准史料中发现的数字，并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很少进一步改造这些数字，因此无法阐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概念’。另外，旧经济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限于计量那些可以直接计量的东西，至于那些只能间接计量的东西，他们常常是从定性角度、而很少从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计量对象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新经济史明显有别于旧经济史的地方。……它们还有不少新的目标，其中之一就

是复原那些一度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经济数据。”^⑧事实上数量研究法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把历史认识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了，有利于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考察。

历史数量研究法的现实性，还与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及其换代更新、迅速普及分不开。事实证明，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历史研究，不仅大大节约研究者的时间，摆脱纯技术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其特殊功能可以扩大供研究使用的原始资料的数量，并根据这些资料所包含的特征或指标，作出人工难于完成的技术处理，它还可试验各种处理资料的方式，并根据试验结果作出比较，选取最合理的方式。所以电子计算机作为一种模拟人工智能的认识工具，给历史数量研究法开辟了广阔前景。

这就是历史数量研究法赖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深刻背景，认识这种必然性对于中国史学界还是必要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历史数量研究法的意义及其现实性。我们面临着急起直追的任务。美国是首倡历史数量研究法的国家，50年代后期就开始运用这一方法。苏联起步稍晚，但进展较快。苏美之外，法国、英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北欧诸国都有专家从事这一方法的研究和运用。综合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一、普遍建立了数量方法的研究中心；二、普遍使用了电子计算机，建立了资料库并互相协作；三、出版一批数量史学的丛书、刊物和专著；四、在大学开设数量方法的课程或举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培训班；五、召开国内或国际数量史学的学术会议，互相交流，并推动这一方法的传播。正是依靠二三十年扎扎实实的努力，数量史学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

理论的考察和经验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历史数量研究法是可行的、有效的，中国史学家没有理由拒绝它，问题在于如何抓紧起步。

运用历史数量研究法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考察国外运用数量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践过程，尤其是将苏联东欧诸国与西方欧美诸国运用这一方法所获得的成果作一比较，我们清楚看到，在我们“引进”历史数量研究法的时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有些同志关于在历史研究领域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包括数量方法的意义的估价，也使我们感到，为了使历史数量研究法在中国史学园地生根开花，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运用数量方法的指导作用，依然有现实针对性。

应该怎样估量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呢？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中的一个，而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列宁将这种历史观视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破天荒第一次将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认识置于唯物主义之上，它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形式、基本规律，从而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既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又是考察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的

方法论，其意义已经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证明，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发展所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处于其他任何方法所不能代替的中心地位。

为了从方法论上弄清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作为一门具体的科学，它的最基本的方法论究竟是怎么确定的。众所周知，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因而和其他科学相区别。研究对象不同，对于方法论的要求也不同。方法论只有适合研究对象才有效。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来看，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是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最基本的运动形式的理论。因为事物总是以运动形式的特殊的规定性相区别的，作为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管其具体展开的形式如何，都贯穿着和包含着这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运动形式，否则即不属于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关于这种基本运动形式的理论，直接关系到这门科学的建立，并可以在广大范围里应用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具有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的意义。进一步分析又可看出，其他科学领域的方法论，不管是高层次的、低层次的，对于这门科学的基本方法论来说，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也决不是取代具体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指从认识论上、从思维规律上指导、帮助人们更好地贯彻具体科学的方法论。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唯物辩证法是他和马克思毕生使用的得心应手的“劳动工具”。如果这样认识方法论问题是对的，那么，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只能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基本运动形式、基本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目前还找不出第二种比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基本运动形式、基本运动规律的理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在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范围内，其他方法只具有从属意义，只有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发挥其方法论作用。

有的同志认为，宏观的跨学科的自然科学方法论，比如数量研究法，可以凌驾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比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地说明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其实，这是没有弄懂方法论的哲学意义。众所周知，数量方法用之于历史研究，主要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量与量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任务。因为人类历史中的量与量的关系变化的规律，决不等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要达此目的，只有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以，数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但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只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才能显示在历史研究中的力量。

有的同志还认为，以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传统方法”是叙述性、描述性的，只注意定性分析，不注意定量分析，带着对历史认识的“近似”的性质，因而主张用数量方法去弥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不足。这也是有待澄清的。首先，把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笼统地称为“叙述性、描述性”的史学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特点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对历史规律性的深刻说明，因而注重理论分析，强调用

抽象思维去把握大量材料中的内部联系，这已为实践所证明。用“叙述性、描述性”显然是不能概括出其特点的。其次，说以往的历史研究只注意定性分析，不注意定量分析是有失偏颇的。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注意质的分析，即是说定性分析显得突出。这是因为只有把握事物的质才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就历史认识的特点来说，一般应是应以定性重于定量的。但以往的历史研究并非不注意定量分析，象8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史学家们都注意量与量的关系。再次，在强调运用数量方法可以使历史认识精确化的同时，却认为以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能达到对历史的“近似”认识，这也欠妥。定量分析可以使定性分析更为精确，但不等于说定性分析总是“近似”的，所谓精确化，一是指事物量与量的关系精确化，再是指事物所必须具有的度。从研究的不同角度来看，定性分析讲的是矛盾诸方面的关系、结构，定量分析讲的是矛盾诸方面的量的值和量的关系，后者可以加深对前者的理解，提供关于质的量方面的精确化认识。正因为如此，历史数量研究法只有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显示它在历史认识精确化中的作用，也是它应担当的任务。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苏联和美国学者的实践也得到证明。苏联史学界在推广数量方法时是比较注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的，并一再申明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界限，批评西方的数量方法接受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影响了数量方法在揭示历史规律方面的作用。他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认为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提出：“本质——内容模式是对于模拟对象的知识进行理论分析的结果，它概括地反映了被研究现象和过程的基本特征、规律性、活动特点及其理论上允许的状况。它是制作形式——定量模式并对定量模拟进行内容解释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定性方面、即本质——内容方面在模拟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很明显，定性模式在科学上是否客观和有效，完全取决于它所根据的社会认识理论和方法论的性质。……正是对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达到了能够确定这种发展的许多重要表现的本质——内容模式的深度。”^④由于苏联史学界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所以他们运用数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公认的积极成果，这可供我们借鉴。例如，为了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地主产业的经济制度，分析其中包含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工役制形式之间的比例，从而确定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在没有关于自由雇佣劳动和奴役性剥削劳动的系统资料的情况下，苏联学者运用数学方法，从而顺利过渡到根据有关地主产业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现有资料（如全国统计资料、农业银行资料、1916年和1917年农业调查资料等），完整地揭示其内部结构，亦即形成数学模式。他们先对两种地主产业制作了定性模式，即本质——内容模式，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的说明，列宁对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地主经济发展的分析，是确定这种模式的基础。随后制作了二者的相关模式，以及运用回归分析证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在地主经济中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这种分析，显然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相反，美国数量史学家不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实际上，往往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其结果使数量方法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也举一例，福格尔在《铁道和美国经济发展（计量经济史论文集）》中，为了探讨19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发展途径的问题，运用了数量方法。但是，他为了论证当时铁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采取了“反事实情势”的虚拟方法，即假定全部货物由水路和马车运输，然后计算其运费。经过各种数学方法的复杂运算，福格尔得出结论：铁道带来的“社会节约”并不大，因此铁道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无甚影响。由此还作出进一步的推论，技术的进步、改革对历史发展并无重大意义。这些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问题出在福格尔的反事实模拟带着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因为去掉铁道本身即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而且，这种模拟的理论指导实际是结构主义观点的，它使福格尔把复杂的历史系统考虑得过分简单，在分析铁道与“社会节约”这一复杂问题时，忽视了铁道给整个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市场扩大以及对水运、马车运输带来的影响，因而得出上面的结论。这就充分说明，没有正确的定性方法指导，科学的数量方法并不能达到科学研究历史的目的。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以自己的深刻性、科学性、优越性为数量方法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由这一理论指导，一切数量形式才会在历史这个大系统中有机联系起来。

运用历史数量研究法的有效性

美苏诸国这方面的史学家普遍认为：“由于过去二十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下列一点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主要不在于历史科学是否需要定量方法，甚至也不在于他们能够用于什么地方（经验证明，它们在研究过去的任何现象和过程时都能找到用武之地），而在于怎样运用，以真正加深历史认识。”^⑤“争论历史著述应否允许使用数量方法是浪费时间，因为驱逐这一幽灵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使用数量方法。”^⑥的确，要想正确地运用数量方法，研究数量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局限性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国内尚确乏运用数量方法的实践，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只能主要参考国外运用数量方法的一些情况，并吸收国外史学家在他们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合理意见。

第一、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其中较常用的是回归分析方法，达到或者利用残缺不全的资料，去发现、复原某些数量关系；或者处理大量的、形式各异的、以往史家难于利用的资料，去获得易于说明历史本质的有价值的新的数量关系。正如福格尔所说：“有些史学家认为，由于可资利用的数据太少，所以用这些复杂的统计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是没有意义的。但实际情况常常相反。当资料十分完备时，通常用简单的统计方法就够了；数据越少，就越要运用上述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资利用的资料常常不能满足其标准统计过程的最低需要，这时，研究者能否设计出利用现存数据的最有效方法，就成为成败的关键，换言之，研究者必须找到能利用手头有限的数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⑦美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数量史学家成功地这样做了，他们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于解决的课题，开拓了研究的新的领域。

第二、数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大规模资料时，克服例证性或罗列性的不足，

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被研究对象的特点、属性的量的程度，从而揭示相应现象的规律性、固有本质以及发展的水平。这是数量方法的一个明显优点。它实际是利用新的数学手段使之对于历史事物的质的研究更紧密、更科学，以及对于历史事物的量的研究统一起来。例如苏联学者关于俄国国内统一市场形成问题的考察，美国以及西欧学者所从事的新城市史、新社会史、新人口史、新政治史的考察，都充分证实了数量方法对于推进历史认识的独特价值。

第三、以相似原理为基础的数学模拟，也是一种能使我们获得关于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新情报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的意义决不是用一种数学模式去表述对已知的历史事物的认识，重要的在于它能提供新情报以加深历史认识。按照苏联学者的意见，数学模拟应用于历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种形式，首先是反映——测定模式，“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发展的某些现象和过程，揭露社会发展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不能揭示的那些方面、规律性和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模式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中实际发生过的社会生活现象和过程，它是一种测定器，也就是模拟对象的某些属性和状况的数量程度的指示器。”其次是虚拟——预测模式，“可以用来预测某些系统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或这些系统在这些那些方面的最佳活动。为此，模式不仅应当提供反映模拟对象的主要属性的新情报，而且能够模拟对象的活动，也就是能够复制有关对象以后的发展或可能的、可以允许的状况的数据。”^⑧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主要是应用前者，这种模拟有助于我们揭示实际历史过程的本质、内在联系、活动机制以及运动的规律性和特点。数学模拟当然以应用于经济史最为有效，但经验证明，这一方法亦可应用于政治史、文化史等领域，重要的是能够制作建立在叙述性史料的数量分析和数量处理基础上的模式。模拟方法实际以自己的特点大大丰富、提高了人们利用史料的技巧。

第四、数量方法在史料学中的有效性也十分突出，能够完成以往运用传统考证方法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包括对版本的分析、作者的测定、著作年代的估算，等等。例如，有一位专门研究《春秋》的苏联学者，^⑨为了解决《春秋》的性质问题，他依据《春秋》的五个特点（即1.紧凑性；2.语言枯燥划一；3.原文和叙述对象语言简单；4.措辞稳定；5.没有词形变化），充分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进行了各种定量分析，列出了一系列图表。经过这种特殊的数量方法的考证，不仅对《春秋》作为一部编年史进行了充分论证，而且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征战结盟的特点，政治上升降变化的规律，伦理道德的观念等一系列变动发展中的历史现象提出了见解，给人以启发。不管这些结论是否全部正确，但他的做法证明在史料学方面，数量方法亦有相当大的价值，可以补充传统的考证的方法。

第五、现代数量方法得以大显神通，还与电子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分不开，这种能力常常是传统的手工劳作方式不可比的。计算机既是强有力的计算工具，从而保证数量方法的展开，又能独立解决某些课题，而且，可以建立机读历史资料情报库，在各研究者之间互相交换、互相利用。它的储存能力，不仅可以使计算、研究工作不断继续下去，而

且可以再现计算、研究过程，启发后来者，检验先行者，并在不同研究者之间实现交叉联系，将研究课题逐步统一、扩大，构成整体研究。可以说，电子计算机是数量方法赖以运用并不断发展的物质手段，是数量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可行性的保证和前提。

历史数量研究法的有效性已为国外史学界的实践所证实，并得到史学家的普遍承认。但是，这依然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运用数量方法，并在不断创新中，发展这一方法。

研究数量方法的有效性，不仅仅是指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而且还指其发挥作用要受什么条件制约，也就是局限性的问题。国外史学家认为，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在合理条件下、在有效范围内谨慎从事。例如，填补资料中的数量关系记载的不足是数量方法的特殊作用之一，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基础资料必须可靠，而且在运用数量方法分析这些资料时，随时都要考虑这些资料的历史前提，不允许从一个时代的资料去推导另一个时代的数量关系，不能借用现代资料去计算古代的指标。又如，在史料含有大量指标的情况下，选择指标也极为复杂。无限制地扩大指标，会使问题复杂化，而合适地选择指标，本身即和理论的指导、历史的素养密切相关，并非仅仅是数学的问题、定量方法的问题，而是和定性分析融合在一起。如果作抽样分析，以怎样的理论为指导作选择更为突出。再如，历史现象是丰富多样的，数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到某一问题，就有用那一种方法才合理的问题，因为数量方法同其他方法一样有自己的使用范围。总而言之，数量方法是应该有条件地运用，条件考虑得越充分，使用的价值也越高，反之，精确的方法也会带来荒唐的结果。

最后，还应指出，要想正确地、有效地运用数量方法，就得学习数学，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国外数量史学的发展历程证明，这是困难的一步，传统的教学缺少这一内容，教材至今稀疏难寻，历史学家数学修养有限，数学家又缺少历史研究的实践，因而学会将数学运用于史学步履艰难，但没有这一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就成为一句空话。美国史学界在这方面表现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历史数量研究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这已毋庸置疑，摆在中国史学界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是：何时做起？怎么做起？

① 芝井敬司《现代历史学和数量方法》，日本《史林》杂志，1981年第5期。

② 米罗诺夫、斯捷潘诺夫《数学世纪的历史学》，《历史学家和数学（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序言，列宁格勒，1975年。

③ 福格尔《新经济史初探》，《美国经济评论》1964年第54卷。

④⑧ 科瓦利琴科《论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模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78年第5期。

⑤ 科瓦利琴科《定量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4年第9期。

⑥ 福格尔《历史学中数量方法的极限》，《美国历史评论》杂志，1975年第80卷。

- ⑦ 福格尔《新经济史的发现和方法》，《美国经济史评论》，1966年第19卷。
- ⑧ 杰奥皮克《古代东方编年史〈春秋〉的定量分析尝试》，《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莫斯科1977年。

• 以上引文均采自正在印刷中的《历史计量研究法》一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冯梦龙“司训丹徒”考

易名

冯梦龙于《寿宁待志》中自言“司训丹徒”（《升科》）。据此，冯曾任丹徒训导，这可肯定。至于任职年月，冯未明说，需加考定。但在史料中，冯这一生平重要史实的记载却不一致：光绪《丹徒县志》卷21《官师表》载：“冯梦龙，吴县人，天启中任，升寿宁知县。”这就是说，冯在天启中曾任丹徒训导，并由此升寿宁知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0于冯梦龙《春秋衡库》一书注云：“（冯）崇禎中由贡生官寿宁知县。”民国《吴县志》卷16《选举表八》载：“（崇禎）三年庚午，冯梦龙，犹龙，官寿宁知县。”这就是说，冯在崇禎三年（1630）由贡生选寿宁知县，而不言其任丹徒训导事。史料记载不一，也导致时贤说法不一：缪咏禾先生认为：“冯梦龙在天启年间曾任丹徒训导”（《冯梦龙与三言》第4页）这是根据《丹徒县志》的记载。容肇祖先生认为，冯梦龙“崇禎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岭南学报》2卷2—3期）。这是根据《提要》的记载。还要指出：问题并不单指冯的生平，也涉及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正确理解。冯任丹徒训导，如在天启年间，根据明代“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明史·选举三》）之规定，训导正属学官。冯既在“天启中任”丹徒训导，冯此时必属举人、贡生无疑，那么，冯何以在崇禎三年再举贡生呢？史料相互牴牾，说明其中必有问题。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实有考定之必要。

查《寿宁待志》冯说为：“因思前司训丹徒时，适焦山沙长数里，诸势家纷纷争佃。”“余曾苦口为石令景云言之，求其踏勘条陈，即以新佃准销归摊之额，利民甚博。景云慨然力任，会调宜兴而止。”据上可知：冯任训导时，丹徒县令为石景云。

石景云确有其人。《丹徒县志》于《职官表》载：“石确，黄梅人，（崇禎）四年，辛未科。”石确任后为陈丰頊，“晋江人，（崇禎）七年，甲戌科。”据此又知：石确任丹徒县令在崇禎四年（1631）至七年（1634）。检《历代进士题名录》，崇禎四年辛未科三甲第一百七十五名为石确。问题还有：石确即石景云吗？《宜兴县志》于《守令》中作了肯定的回答：“石确，字景云，崇禎间由丹徒知县调任宜兴，时宜兴民变初定，确先声所至，群逞望风胆落，确廉其渠恶，次第除之。”

问题至此，水落石出。冯任丹徒训导，时为崇禎三年至七年。这与史载冯于崇禎三年举贡生，及冯自云“余于崇禎七年甲戌八月十一日到任”（《寿宁待志·祥瑞》）之语吻合无间。而冯之任丹徒训导，又是举贡生后听选。《丹徒县志》谓冯“天启中任”训导之说全讹，从其说者为以讹传讹。《提要》与《吴县志》不言冯任丹徒训导事系未作考证，从其说者为失之细察。正确记载应为：冯梦龙，崇禎三年贡生，选丹徒训导，七年升寿宁知县。

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

洗剑民

岭南是中国中央王朝的一个部分，中原的社会性质对岭南起过重要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就岭南地区而言，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其封建化的过程和道路怎样，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试作回答。

一、先秦时期的岭南社会性质

要认识岭南的封建化过程，首先要正确了解封建化前的岭南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岭南部分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广东的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罗定和广西的平乐、恭城、灌阳、兴安、平安、灵山、田东、靖西等地均发现了不少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如青铜矛、刀戈、剑、镞头等，表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墓葬中的编钟、礼器和精美的工艺器，反映了奴隶主生活的奢侈。但在岭南的西部、东部、西南部等广大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新石器遗址，说明这些地区尚未进入到青铜时代，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秦统一前，岭南的经济生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始采集狩猎或渔猎的类型，主要分布在西部、西南部以及各地深山森林地带。东南沿海多是渔猎经济。大批的贝丘遗址，正是这种生产类型的堆积遗址。第二种是原始农业耕作类型，它广泛分布于沿河的平原地带和谷地，其特点是以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进行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属新石器晚期的生产方式。在广西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地带，发现了许多石铲、石犁、石锄、石斧、石铤、石镞，其中以石铲为多，正是这种生产类型的佐证。第三种是奴隶社会的粗放农业耕作类型，主要以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进行。已使用了青铜的金属工具，分布于西江、北江、东江沿岸一带。

百越酋长成为社会统治的核心力量是岭南的显著特点。在秦统一岭南以前，这里未受过外族的征服。岭南本地没有统一过，长期处于破碎的酋长割据局面。百越酋长控制了各自的部族，有自己活动范围，地域性的血缘关系牢固。原始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没有被彻底扬弃，便带到了阶级社会中。

当时的岭南居民带有浓重的原始社会风习，如披发纹身、鼻饮、拔牙等等。某些后进地区还未习惯熟食，个别地区甚至有吃人之风。这种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有较强的排它性，使得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对岭南的影响十分薄弱。

恩格斯指出：“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只起着极其从属的作用。”^①由于岭南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不可能在生产、贸易和财富上有较大增长，所以奴隶制是极不发达的，在当时社会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它必须借助外力去改变原来落后的生产关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向封建文明过渡的阶段。

二、岭南的封建化道路

各民族、各地区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不同的道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

在的封建主义的。”^②欧洲的奴隶社会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类型，中国的奴隶社会发展很不充分，岭南地区的奴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带浓重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残余形态，这就使岭南的封建化道路明显异于欧洲罗马式的封建化途径。

秦汉时期是北方的封建帝国正处于上升的发展期，中原地区的生产水平已达较高的程度。处于落后状态的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就是在北方的封建帝国统一岭南斗争中开始的。从秦朝到东汉初，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使岭南的政治结构得到改变，成了岭南封建化的先导。

真正促使岭南封建化是中央封建政府的移民开发运动。每次征战之后，参战将士大部分留守岭南，同时又移徙大批中原人至岭南地区。在秦代，先后三次移民，总人数达十几万。这些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封建经济开始在岭南繁衍滋生。至汉代，徙民至岭南地区也不少。尤其是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唯独岭南安宁，南迁汉人就更多。其中还有不少的文人学者，北海人刘熙“避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受生徒数百人。”精通五经的牟子避世乱于交趾。桓华在初平中（190—193年）“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闻里不爭讼。”这些中原学者在岭南传播了封建文化。到了魏晋年间，南迁的移民中，有不少是北方的地主豪族，他们带着农奴、婢妾、部曲来到岭南，把中原封建的生产方式直接在岭南推行。可见，移民开发是岭南封建化的主要道路，它把先进的封建生产力输入到落后地区，使旧有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封建的生产关系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封建的改革运动

尽管南下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封建文明，但岭南本土的居民仍占绝大多数，他们固守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给封建制的推行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因此变革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传播先进的封建生产技术与文化成为一场运动而展开。经过这场改革运动，使封建制度在魏晋年间终于在岭南地区确立。

（一）郡县制的建立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由封建帝王直接委任官吏进行治理。但实

际效果不大，郡县形同虚设。秦亡，赵佗割据自立为南越武王，基本上承袭了秦的郡县制，并把这种制度切实地巩固起来。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重新调整行政区，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九郡。公元前106年，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岭南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从此郡县制才完善地建立起来。封建政体的建立为封建经济的推行与发展扫除了前进的障碍，大大加快了岭南封建化的进程。

（二）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封建改革的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府委派各郡国太守，他们教化士民，传播封建文明，领导着地方的变革。

汉平帝时颉光为交趾太守，“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婭，建立学校，倡导礼义。”^③开始把封建文明在岭南传播。

建武初年，九真太守任延教土民铸田器，推广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改变原来的狩猎生活。

建武初年，卫飒任桂阳太守，他建学校，设立婚姻礼法，在耒阳把私营的炼铁作坊，改为官营，大铸铁器。^④

茨充任桂阳太守时，教山民种桑、养蚕、植麻、编屨，织布，经过数年，使山民的生活面貌有所改观。^⑤

此外，孟尝、周昕、贾琮、陈茂、马援、唐羌、张乔、桓晔等人，在岭南任职期间也作了不少贡献。由于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变革，不少人学会了中原汉人深耕细作的技术，铁农具和牛耕在部分地区得到推广。东汉墓葬中，陶制的粮仓和六畜模型很多，这正是经历了变革后生产发展的例证。

（三）凿山开道，整治交通

岭南偏隅，五岭与中原阻隔，交通闭塞，中原的先进文化技术不易传入。加强南北的交通往来成了封建改革的重要一环。秦始皇派史禄修筑灵渠，不但沟通了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加强了南北经济的往来，而且使两岸的农田得到灌溉，大大利于农业的发展。东汉马援南征时也建了不少水道和陆路工程，“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⑥“凿口马援所凿，内通九真、浦阳”，“凿南塘者，

九真之所经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年马援所平。”^⑦建武二年（26年）卫飒整治交通“凿山英通道五百余里”，使英德至曲江的交通大为改观。^⑧灵帝时桂阳太守周昕修治了粤北武水的河道，使南北交通顺利畅通，商业贸易繁荣发展。^⑨建初八年（83年）郑宏为大司农，奏开零陵桂阳峽道。^⑩这些工程的开凿对整个岭南交通有决定性的意义，既带来了经济的有利发展，也便于封建王朝对岭南的统治。

（四）封建赋税制度的推行

汉武帝初平南越的时候，“以其故俗治，不纳赋税。”^⑪但这种政策不能长久维持，随着官僚机构在地方上建立，到东汉后期中后期赋税制度已普遍在岭南推行了。《后汉书·循吏传》记：“含涯、汝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东汉时经过卫飒太守的得力治理，“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⑫说明了东汉时期赋税制度已在粤北地区的深山中推行。而且此时赋税已很重，《后汉书·和帝纪》中载象林县的赋税就有“更赋、田租、台稿”三种。封建赋税制度的推行是封建经济政策在岭南进一步渗透的结果，是封建化过程中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

（五）中原先进文化的逐渐传播

岭南的封建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原先进文化逐渐传播、岭南落后习俗不断改造的过程。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中原移民的徙入，民族间的相互融合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推行，对地方风习进行改造的结果。秦并天下谪徙民与越杂处，这是第一次汉越民族的融合。赵佗统治时期，他和集百越，也注意对越人的不良风习加以改造，使“粤人好相攻击之俗益止。”^⑬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赐丞相吕嘉及内史、中尉、太傅等高级官员印章，去除南越国原来采用的刺面、割鼻种种酷刑，颁行汉法，让越王同属于中原诸侯，^⑭对岭南刑法实行改造。东汉建武年间，马援南征越地，“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⑮把汉人的律令和越人的律令结合起来颁行，这也是法律汉化的表现。

此外，汉越通婚，行嫁娶之礼。如任延任九真太守，“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

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⑯

不少地方还建立学校传播汉文化知识，灌输封建思想意识。到东汉后期岭南已出现了不少的学者名士，象苍梧郡的陈元，士燮四兄弟、郁林郡的养奇，都成为名噪一时的名儒学者。

百越族接受先进文化的过程，不仅是民族的进化，而且是社会的进化，它使岭南地区不少落后的民族避过了奴隶制的历史阶段，直接从原始公社的末期过渡到封建社会。

四、封建制度的确立

关于岭南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笔者认为不在秦汉，秦汉时期只是岭南向封建化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

首先，封建制度的奠立关键是剥削方式上的更新，只有租佃制度的全面推动，才可能有真正的封建制度。斯大林指出：“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奴……”^⑰这里说的不完全占有就是指依附关系的存在，体现在租佃制的生产关系上。在岭南，这种关系在汉代并未彻底形成。

其次，汉代封建制度的萌芽，并不等于封建制度的确立，量变不等于质变。岭南封建化的过程是以主要的郡县治所开始，然后以点带面逐渐影响到广大地区。汉代毕竟是量变过程。

再次，虽然岭南在汉代已经部分地使用了铁器和牛耕，但这并不标志封建制的确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社会末期）“从铁矿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一切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恩格斯把铁器的出现看作是向阶级社会（奴隶社会）过渡的一个特征。所以不能把铁器的使用和封建制等同起来。

上述几点，表明了秦汉时期的岭南社会并未完成向封建制度质变的飞跃，而是处于过渡的阶段。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则大不相同，经过秦汉时期的封建化运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封建生产关系日趋成熟，使封建制度终于在岭南确立。

首先，从生产力方面来看。魏晋时岭南已从过去依赖外地输入铁器逐渐转变为冶铁自给。东

晋咸康年间邓嶽任广州刺史，大开鼓铸，广州冶铁业发展起来了。1975年在中山四路的秦汉遗址中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较大的晋代冶铁工场。交州刺史陶璜讨南方之“贼”时说：“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田器。”^①说明交州已有了自己的冶铁业，铁器农具也广泛使用。

广东连县出土的永嘉六年（312年）墓葬中的一组模型器，其中有一件犁田耙田模型，反映了当时水田耕作技术的提高。广西苍梧出土的一组陶瓷模型，其中也有驾牛犁田和牛圈等模型。韶关市郊区出土有西晋太康七年（286年）的耙田犁田模型，与连县器物相似。可知魏晋时岭南的牛耕已广泛使用。

这一时期制瓷手工业迅速发展，岭南地区的晋墓都有大量青瓷出土，器物造型美观，釉质莹亮，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商品。此外造船、纺织的技术水平都有显著提高。

其次，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魏晋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中原的经济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这对整个岭南地区是直接的促进。特别是东晋首都移至建康，封建因素对岭南有强烈的影响。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使得岭南的封建生产关系蓬勃发展起来。东汉后期的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多座陶城堡的模型，反映了地主阶级已经出现，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地主筑堡自守。在城堡中有正在劳作的泥俑，他们不得不投身于地主豪族的家中，求得经济上的依附，成为封建农奴。

魏晋以来，小农分化较为激烈。《宋书·杜慧度传》载：“慧度，瑗第五子也，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迁九真太守。”当时有流民督护一官，说明流民较多，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确立。在桂林市观音阁出土有南朝的买地券，用滑石刻成。^②广西北部的融安也出土有南朝滑石地券。在广东仁化县古墓中出土有南朝宋元嘉廿一年（444年）的买地券砖。^③这是魏晋以来土地私有制确立，土地买卖盛行的真实写照。

不少农民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他们的武装力量。在广西苍梧出土的魏晋墓中，有执刀持盾的部曲家兵的陶俑，有一组兵器，包括铜弩机，铜刀和铁矛，这是依附关系在军事上的反映。

豪强地主的典型代表当推三国时苍梧广信人士燮。他的家族从一个普通移民发展为岭南一霸的豪强地主。兄弟四人，控制了岭南地区的重要职位，雄长一州，“中国士人多往避难者以百数”，^④以求得到某种庇护。这正说明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

魏晋时岭南生产关系已具有了封建农奴制度最典型的特征——封建的依附性，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上的依附，耕种豪强地主的田地以获得经济上的收入；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人身的依附关系，即他们投靠豪族以求得人身的庇护。同时在战乱纷扰时，他们又要充当地主豪族的部曲家兵，求得军事上的依附。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标志着岭南封建制度的确立。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5页。

②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上书第3卷，第88页。

③ 《后汉书·南蛮传》卷86。

④⑤⑬⑰ 《后汉书·循吏传》卷76。

⑤ 《东观汉记》转引自《水经注·温水》卷39。

⑥⑱ 《后汉书·马援传》卷76。

⑦ 《水经注·温水》卷36。

⑧ 《韶州府志》《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

⑩ 《后汉书·郑宏传》卷33。

⑪ 《汉书·食货志》卷24。

⑫ 《后汉书·贾琮传》卷31。

⑬ 《后汉书·高帝纪》卷1。

⑭ 《史记·赵佗传》卷113。

⑮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50页。

⑯ 《晋书·陶璜传》卷57。

⑰ 桂林市博物馆资料。

⑱ 仁化县博物馆资料。

⑲ 《三国志·士燮传》卷49。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朱九江先生学述

朱杰勤

19世纪初，吾粤学风盛极一时，人材辈出，各有专长，亦各有成就，甚至可以在全国学术之林独树一帜而无愧色。例如侯康之经史学，李垣恢、李文田之西北史地，梁廷枬、何藻翔之中外关系史，张维屏之诗，谢里甫之书法，黎二樵之绘画，邹特夫之数学，都是赫赫有名的。

广东偏处一隅，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开发较迟，中原人士视作化外瘴疠之区，公元前二世纪，南越王赵佗归汉，上书汉朝，还自称为“蛮夷大长。”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唐代往往把贬谪的官吏充军到岭南，号为“流人”，也视广东为边远艰苦的地区。这些“流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传播文化的媒介，但在地方当局管制下，他们不能发生这种作用了。终唐之世，广东的历史人物，只有唐开元年间，韶关地区的张九龄（曲江）。可见，岭南文化还是不振。宋元二代，广东学术界的突出人物亦寥寥无几。明代学者可敬的有理学家陈献章（白沙先生）、湛若本（甘泉），文学家邱露、黎遂球、陈恭尹（独漉山人）、梁佩兰，艺术家张穆、冯敏昌等，成名的学者虽不及江浙之多，但比前代增加不少。

古语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广东人口繁殖，岂无人材，足为世用？必须指出，番禺自秦汉以来，是商业的大都会，从事商业的人比较多，读书之人比较少。当局者对于提倡学术，培养人材，缺乏诚意，不能造成良好的学风。发现人材和提拔人材都不得其法，有真才实学者，往往默默无闻，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莘莘学子，多志在科名而不志在经世，科场失意之后，有些人就改弦易辙，弃儒从商，亦为人材的式微，学风不兢的原因。

至19世纪初期，广东的学风有很大的提高，人材辈出，盛况空前。这点固然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大有关系。广东濒海，海外交通较他省为早，出洋的人亦多，对于外国的文物制度及情况亦颇为了解。因而更触发了粤人不屈不挠的独立自强的思想，风气一开，学术界就更加强调经世致用之学。

正在这个时期，清廷派来广东的总督和学使都是学术界的大师。例如阮元（芸台）于嘉庆二十二年任粤督，至道光六年调职，居粤九年，大力提倡文教事业，道光六年，

建学海堂于越秀山上。学海堂课士经解诗赋诸作，作品择优刊出，名为《学海堂集》，共四集行世。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即今之奖学金）。①此外，阮元还辑刊《皇清经解》，以严厚民（杰）为编辑，吴石华为监刻，学海堂诸生为校对。影响所及，于是《岭南遗书》、《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等相继问世，大大推动了广东学术风气和印刷术的发展（广州在那时已有四色彩印及雕刻印刷术）。

学政一职，主要是主持风雅，提携真才，他与地方学术风气的升降大有关系。18世纪末，大金石学家翁方纲（覃溪）为广东学政凡三任共八年，著录粤东金石562种，有《粤东金石略》一书行世，对广东考古学的影响既深且广，特别是金石证史方面。南海吴荣光（荷屋）的金石学和书法亦承其坠绪。吴荣光是阮元门生，有《筠清馆金文》行世。

阮元的门人程恩泽（春海）曾担任广东正主考，他典试广东，所取多实学之士。程恩泽精于地理、天文、数学。道光十二年乡试，他出算学试题，无能对者。番禺侯君模叹曰：“读书虽多，而不学算，今为程春海考倒矣。”乃邀其友数人共延梁南溟学之。②广东人士学习数学的风气，是由程春海推动的。程春海的遗作《程侍郎遗集》收入《粤雅堂丛书》中，由学海堂学长谭莹校刻。

19世纪是广东学术改革时期，程春海也说：“士气文风，较前日进。”可谓持平之论。广东学术的丕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内因和外因已如上述。在这百年期间，广东教育的发达，学风的丕变，真才的崛起，一时难以尽述。根据广东学术界传统的看法，首推两位同时的大学者为代表，即番禺陈兰甫（澧1810—1868年）和南海朱次琦（1807—1881年），字稚圭，一字子襄，学者称为九江先生，因他晚年在故乡九江讲学20多年。

陈兰甫（后学称为东塾先生）治学博而能精，无门户之见，凡地理、算术、乐律、诗古文词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亦富。曾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为菊坡精舍山长。桃李满门，成就甚众。读者参看其《东塾读书记》和《东塾集》便知梗概，今不具论，独论朱九江先生的学行。

朱九江先生，广东南海县九江乡人，先世居南雄州保昌县，南宋末年有朱元龙及其子迁入南海九江，因而入籍。明世以来称望族，亦有盛名，朱成发（奋之）为十五传，业商，疏财仗义，济困扶危，一掷千金无吝色，推己及人以仁慈见称。娶同里张国渔女，产四子：一士琦（字毅虔，号晚亭）、二炳琦（号隐石）、三次琦（即九江先生）、四宗琦（字宜城）。

朱氏一家，读书知礼，互相切磋，怡怡如也。九江先生幼时从其母张氏口授以唐人绝句，已能琅琅成诵。五岁入塾学习，七岁能诗，十三岁，曾钊（勉士）携他往见总督阮元，阮元命作葭沓湾观海韵，挥笔成五律一首：“八月试新寒，苍茫海岸间。天风吹积水，落日满群山。潮汐防冲突，楼船许往还。劳劳千里事，行路反成闲。”阮元大惊叹说：“老夫当让此子出十头地，过余彩旗门观海作矣，苟不憊为之，即止”

一代才也。”先生年十八肄业羊城书院，山长为谢里甫（兰生），书法为广东第一，其门人陈兰甫称其画在黎二樵之上。我家“旷远楼”三字即其手笔，超逸刚劲，令人意远。谢里甫认为朱九江学书最有条件，遂授以笔法。关于朱九江之书法，将详论于下文。

朱九江年二十六肄业于越华书院，山长陈莲史一见异之，称为“天下士。”尝以天中节宴诸生，命赋新松。朱九江席上应教，诗云：“分得苍株烟雨浓，滋培造化与同功。著书岁月忘年对，起蛰云雷有日通。御李渐吹寒谡谡，补萝休待盖童童。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此诗才气横溢，意旨深远，说明人材的培养必须及时，还要独具慧眼识别人材和提拔人材。作为被培养的人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学好本领，以便随时出为世用，有益于民。这正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可知的道理。陈莲史读此诗后，赞叹不止。

当时朱九江先生还是一个生员（秀才），他洁身自好，闭户潜修，不干于有司，但他的品行才名亦赫赫受人注意和称道。两广总督卢坤（厚山）遣吏征写先生之诗，后相见时，还说：“天下虽大，人才有数。”先生深感其言。卢坤又告诉嘉兴钱仪吉说：“南海茂才朱次琦稚圭庄士也，顾才气无双。”钱仪吉因介李绣子太史、曾勉士学博求与交，后为先生作诗序说：“其为人伟，瞻视嶷嶷然，气纯以方。其论说纵恣滂葩，有晁贾之核。其诗无弗学，亦无弗工，往往于转换顿挫处得古大家神解。梁简文有言：斯文不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其不在斯人欤？”所言恳切而无溢美。

先生年三十三，与兄同举于乡，北行会试，不利，旅居京都，访友读书，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车马造门者，一刺报之而已。越一年南归教学，更为勤奋，至四十一岁，又北行会试，遂成进士，即用知县，签分山西。

先生自少至壮的经历就是读书、应考和做官，《千字文》中“学优则仕，摄职从政”这八个字可以概括先生的前半生。先生之入仕途，其故亦不难解释。封建王朝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先生出身于“书香之家”，又饱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自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既欲治国，则不得不从政了。由于时代环境种种条件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朱先生有反封建的行动，而只能从他做官的动机和行政的效果来评价他。先生尝说：“人人以一官样作官，民生何赖焉”。他往山西的旅费是由乡人借贷得来的，他先把一部分旅费存起来，作为他日回乡之用。辞官后，路费不足，还要典当衣服，才能回家，前所贷款，至逝世前一年才偿清。生前不取百姓一文，死后家徒四壁，可谓廉吏。他在山西，特别襄阳令期内，德政甚多，具见于陈士杖撰《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铭》一文，王璠撰《稚圭先生画像记》及晋人所辑的《爱棠录》及《清史稿·循吏传》中。今不具论，独论朱先生之学。

至于朱先生为政不久，而急流勇退的原因，说法不一。先生答王莪友书说：“仆少无宦情，又不习吏事，州县之任，非所克堪。此出盖为亲知逼迫，勉强一行，待罪来襄，奉职无状，瓜及便当弃去，进维周任陈力之义，退奉柱史止足之诫，不如是固不可也。”④可见先生出任，始终无恋栈之意。康有为说：“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抚

某为亲王嬖人，拂衣归，讲学于其九江乡礼山草堂，垂三十年。”^①此又一说。亦有说先生上防乱之策给抚军哈芬而不用，就引疾辞职。我们认为清清末叶，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官场黑暗，夺利争权，排斥异己，假公济私，几乎没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先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以经世救民为归，守身如玉，大公无私，自然不能大有作为了。正如他对家人说：“君子立身行事，当昭昭如日月之明，离离若星辰之行，微特较德不欺其志而已，安能随波靡，犯笑侮，招逆亿，以察察之躬，为当世所指目耶？”^②可见先生辞官归里不是偶然的。

先生回里后，居邑学尊经阁，乡里旧游的子弟皆从学，翌年至家中授课，后远方从学者众，乃讲学于礼山下的礼山草堂，十八年后，康有为受业于先生，还未到二十岁，而先生已年垂七十了。康有为对先生有亲切的描述：“有为未冠，以何参之列，骤闻受学，则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温温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兴起发奋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远也。”^③又关于其师的治学宗旨又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浮俗，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④康有为从学三年，自认为深受影响，说先生“日一登堂讲学，诸生敬侍，威仪严肃。先生博闻强记，不挟一卷，而征引群书，贯穿讽诵，不避只字，学者录之，即可成书一卷，今所传礼山讲义是也。然十不传其六七。至于大节所关，名节所系，气盛颊赤，大声震堂壁，聆者悚然。为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伪学，自此始也”。^⑤据此，康有为不仅从朱九江先生受经世之学，而且先生对康氏日后解放思想，创立新的思想体系，也有启发作用。1891年康有为开万木草堂于长兴里讲学，仍遵师训，大发求仁之义。其《长兴学记》有说：“先师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暴，伊尹之任难。故学者学为仁而已，若不行仁，则不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而不可与居。”康有为还主张在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增加经世之学。

朱九江先生以四行五学教授学者。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节，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这四项属于修身之类。作育英才，必须要求德才兼备，而以德行为先。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尊德性而道学问”，是儒家的传统精神教育，但一切以实践为归。暂不详论。

五学一曰经，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义理，五曰词章。四行和五学有辩证的关系，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渗透，达到明体达用的目的。现分别说明于下。经（包括四经学——《诗》、《书》、《易》、《礼》、《春秋》都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典籍，大概因经孔子修订，后世学者尊之为经，似在唐代才普遍有这种称谓。陶渊明说：“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所谓古人书，主要是上述几种经典。我们要了解三代的文学、哲学、历史、典章制度等，就不能不加以研究。研究的人多，意见自然分歧，学者各执己见，自立的

户。汉代学者主要从事经典之整理和考订。这固然有裨于古籍。可是有些人对经文极穿凿附会的能事，进行繁琐无用的考证，往往用过万字来考释经文中无关宏旨的一句话。而对于其中义理漠然置之。这不能不说是偏蔽。汉之学以郑康成集大成。至宋而研究经学者又注重义理，发扬孔子之道，以朱熹集其大成，尊汉学者诋其空疏。其实朱子还是推许郑康成的。直至清代乾隆年间，尊崇汉学，以考据为宗。有江藩者，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另写《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即《宋学师承记》）作为前书的附录，硬把汉宋二学分开，大扬门户之见，甚至把治学不分汉宋的顾亭林列为汉学家。清代学者龚自珍劝其把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提出批评意见，略说：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⑩可见龚自珍是汉宋并采的，可谓卓识。

朱九江先生认为纪昀是汉学之前茅，阮元是汉学之后劲，十分中肯。阮元曾建立学海堂于广东，对广东学风影响很大，他虽然没有攻击朱子和宋学，他主编的《皇清经解》，虽然有采用顾亭林之说，但又将尊宋的言论删去，亦可见阮元的倾向了。

广东理学大师如陈白沙、湛甘泉对清代岭南学界还是有影响的，兼采汉宋，大有人在。例如学海堂学长林伯桐（月亭）及其子弟金锡龄都是好的榜样。金氏说：“宋儒之学与汉儒之学，相为表里，乃今之学者或有为汉学则诋宋学，为宋学则诋汉学，攻击不遗余力。其实讲考究，如郑君，何尝不明于义理，讲道学，如朱子，何尝不深研考证。持平而论，自知宋学汉学不容偏废。此非龄之臆说，殆师法于月亭先生者。”^⑪金锡龄晚年所著书曰《理学庸言》，发明朱学而无汉宋门户之见。

朱九江先生力排汉宋门户之见，认为“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修身读书而已。”他既肯定以郑康成为首的汉儒整理经典之功，又尊重以朱子为首的宋儒释经之力。他甚至说：“朱子即汉学而稽之者也。”经典如果没有汉儒一番整理和考证，则残缺不全，文字难懂，不便于学，如果没有宋儒探求经典的道理，也就不能发挥其大义和作用，而不便于实践，其实汉宋二派对经学都有裨益，不可偏废。学者应该汉宋兼治，全面研究。朱九江先生认为古代之学在于五经。他说：“于《易》验消长之机，于《书》察治乱之迹，于《诗》辨邪正之介，于《礼》见圣人行事之大经，于《春秋》见圣人断事之大权。”所谓圣人是指文王、周公和孔子。五经之外，本来还有《乐经》，共称六艺，可是《乐经》早已亡佚。朱先生认为：乐章存乎《诗》，乐节存乎《礼》，《乐经》亡而不亡。他还鼓励学者要通习五经，每天诵三百字，多读几遍，不到三年，五经都读完了。这是中材所能做到的。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于实践，不明经谊，不能实践，就不算通经。通经所以致用，致用就是躬行实践，修身治国。^⑫

朱九江先生歿后，国史馆曾为他立传，因为他没有经学的书著，就把他列入《循吏传》（见《清史稿》）。其实朱先生讲学二十多年，他关于经学的论述是很多的。但不见于文字而已。吾乡朱法卢（桥觞）孝廉曾从朱九江先生游，称高足弟子。尝述先生遗事

说，先生登坛讲学，不挟书本，按已定的课程，作精辟的论述。而门弟子手目并用，认真笔记，视为鸿宝，故门弟子无不保全有一二部笔记。孝廉逝世后，其课堂笔记三本由我保存，其一册专言易象，其他泛论群经和文艺，皆先生口授精华，而外间鲜有传者。1984年，我曾把关于经学的一部整理，题为《朱九江先生经说》，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2期，1986年出版。这些笔记本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一炬，至今引以为憾。此书篇幅较多，分别全面论述各经的授受源流，后人训诂和考证的得失，以及纠正伪经的谬论等等。此文篇幅有限，不拟评论了。

史学——《书》与《春秋》后人尊之为经，其实都是古史，后世史家不能不法于此。司马迁《史记》自称继《春秋》而作。历代王朝的正史的史意和史法都不同程度受二书的影响。朱九江先生讲学经史并重。他说：“《书》与《春秋》，经之史，史之经也。百王史法其流也。正史记传，《书》也；通鉴编年，《春秋》也。以此况治经治史不可以或偏也。”先生要求学者研究历史，大概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国家治乱之迹，以古为鉴，吸取前人的经验，作为处世治国的参考。他教诫学者要遍读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因为这四史写得最好。《明史》也应该读，因为时代较近，清因袭明代的東西很多，我们不能知古而不知今。而且《明史》的主要执笔人是熟悉明代掌故的万季野，参加编写的还是当时硕学之士，洞悉历代编史的得失，费时60年才告完成，所以在史法和史道上超过前史。朱先生还极力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因为明体达用，有益于治国。毕秋帆主编的《续资治通鉴》远不及它，但在同类的著作中还算第一。至于纪事本末等书，扼要简明，便于查考，亦应备用。

朱先生的史学未有成书，学者深以为憾。至光绪二十六年，福建海澄邱炜萋（菽园）辑校《朱九江先生论史口说》在粤东出版，序中说：“此篇论前后《汉书》、《三国志》。炜萋顾得之南海佛山人谭炳轩太守（彪）。据言其获此书即于九江弟子书中，悉笔记体，又当日师弟子之间之应，亦乙乙质书，似皋比讲学时，弟子从旁之载笔，而非九江之手撰。原书不名，既为校刻以传当世，遂名曰《朱九江先生论史口说》云。”

朱九江认为四史为史之冠，不能不讲，今此书只谈《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不谈《史记》，可能是门弟子不及记录，或已记录成册，而又遗失的缘故。但论《汉书》中，也常涉及对《史记》的意见。例如说：

“后世史家虽多，而《史记》之通史，《汉书》之断代，因是自开其体例，而文章之妙，亦超绝千古。故杜牧有云：高摘屈宋艳，浓薰马班香。”

朱先生对于裴彪父子批评司马迁的错误意见，亦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例如说：“班彪父子谓史公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太史公自序：谓自文王以至孔子，又五百余岁至于今，历数文王、孔子、周公之学。至老子则屈与申、韩同传，何得谓之先黄老乎？况史公之尊孔子，谓夫子可谓至圣矣。千古定评，至今依之。”

先生对于司马迁之史笔文笔极为推重说：

“史公之著书也，志在传事，务宜将三千年之事迹，纬之以文理，绘之以笔墨，善于序事，易于动听，使千秋万世，永垂不朽”。

“又史记之为传，错综其事，彼此互见，如陈平世家附入王陵事，张苍附入赵尧任敖事，旁见例出，以见文章之妙”。

朱先生在著史方法上，对《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也提出一些意见。如对《史记》，对个别有条件入传的人物如吴芮而史公不为其立传，是疏忽；又《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而《货殖传》载白圭已不合，并载入子贡等事，失于限断，况断代为史，何以载及上古”。但先生有个别的提法，还是可以商榷。例如说：“《史记》序事，经术不如《汉书》之多。于名臣之传，汉朝一代风气都见。凡大疑难，皆引经据典，断大事，释大疑，亦孟坚之特识”。

“以《春秋》决狱，以《禹贡》行水道治河，以《洪范》明灾异，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礼记》定郊祀大典”。

以后还援引《汉书》所纪以经断事的一些例子。

我们认为以经断事虽然是尊经的行为，但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事物不断变化，时代不断推移，能行于古之法，未必能行于今，何况三代至汉相距近二千年，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自然界的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解决新的具体问题，处理当前的国家大事。如果步古人的陈迹，引经据典，不知通变，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把国事搞坏。今朱先生认为提倡以经断大事是班固的特色，我们不敢苟同。这可能是朱先生的时代局限性和好古尊经的片面观吧。

朱先生对范曄蔚宗的《后汉书》有相当高的评价。他说：

“范蔚宗南朝刘宋人，维时纪东汉一朝之事，不传之书不知其数。自范史一出，而诸书遂亡，即著名之籍，至唐时犹未亡者不下数十余，而范史卒驾其上，可知其精也”。

先生认为《后汉书》体例精密，列传亦斟酌归于至当，有创造性。说：“大凡著书之体，视其时之风会，前人所有而后人所无者不妨删，前人所无而后人所有者不妨增。”东汉末年，宦官用事，败坏朝廷，动摇国政，至十常侍而极，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立《宦者传》。当时亦有特立之士，力与之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所以又立《独行传》。乱世之时，政治腐败，有些士人洁贞自好，独善其身，视功名如粪土，所以立《逸民传》。还有一批知名人士，力持清议，反对奸党，同赴国难，桓灵之际，皆入党锢，所以立《党锢传》。此外范氏又立《列女传》，专载才高一世的妇女如蔡文姬等人，不限于节妇。所谓列女，非如节烈之烈，如殉土殉侯而已。范书亦有不足之处。例如每篇文章之后，作者有论，论之后，又以四言韵语继之，谓之赞，未免过赞。作者如有更多意见，何不并入论中？《方术传》有裨于医术，但不应杂有神异之事。总之，全书力矫班固之失，表彰忠良正直之士，不遗余力，有功于世。朱先生赞曰：“范氏当六代昏无天日之时，而能为此直笔，亦可谓特识矣”。

朱先生对于陈寿《三国志》极为推崇，认为体例严谨，文字简洁，立论有识，书中无神异之说，裨官野史之言，胜于《后汉书》。后人批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不帝蜀而帝魏，失史裁之正。其实正统是指帝王在宗亲中求适当的人作为嗣位之选。这种传子不传贤的王家世袭之法，就所谓正统。我们知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才可居其位。正统之争发生于统治阶级之间，老百姓从不注意。《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是不得已之举。朱九江先生极力为之辩护，认为论人者当知其世，立说者当观其微。《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实有难言之隐，不得已也。他的理由是：

“寿自国亡入晋，当时相重，荐以为官于晋，终身未之有改，乃晋臣也，既为晋臣，不得不尊晋，晋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则魏者晋之祖宗，陈寿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为伪，伪魏是伪晋也。如何行得？”陈寿虽以正统予魏，但深怀故国之情，字里行间，还是以蜀为尊。

“且观其书，称先主后主不称名，正所以见其尊蜀。蜀之妃匹，谓之甘王后、张王后、敬哀王后、穆王后。吴（《吴志》）称吴主权，吴王亮，又吴主权夫人，吴主亮夫人。先主即位武担山南，告天之文，图讖之书，尽皆载入，如光武即位告天一样相同。又曹丕之篡，观裴松之注，群臣上表称贺不知凡几，寿皆不载，至武帝载一篇九锡、文帝载一篇禅位诏书而已。又魏书所有册立王后，册立王子、王侯，皆不载。至蜀，则甘王后、张王后、敬哀王后，载其册；王子永、刘理有册，王子璇亦然。车骑将军张益德、骠骑将军马超，皆载其册，又册诸葛亮为丞相，后因败自贬为左将军，复丞相册。而陈寿于其册封之词，一一载之，而吴人无，魏亦然。”

朱九江先生认为陈寿是蜀人，又是晋臣，逼于时势，对于魏篡汉、晋夺魏之事，不能行其直笔，有所忌讳，是情有可原的。陈寿之书，一片惻怛低徊故国旧君之情，正符合《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笔法。

以上九江先生关于四史的意见，主要根据《朱九江先生论史口说》一书，引文亦同。谱牒之学（包括家谱、族谱）是史学的一支，与宗法相维系，为国史所取材，起于周代，源远流长。朱先生精于此学，曾撰《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及《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⑩共长达万言。他这两篇文章，贯串了有关的经传、正史和杂史以及金石文字，来考证牒学的发生和发展，厘定了谱牒的体例及其撰写的方法和其他应该变通改革的地方。自古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全面研究谱学之书，朱先生之文可补其缺，实为创举。近来史学界研究国史，纷纷搜罗家谱和族谱，以供参考，可谓知所先务。希望能把朱先生之文作为参考之助。

掌故之学——掌故之学属于史学范围，但又是以经世之学为重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等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特殊学问。朱先生说：“掌故之学至陋也，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亟矣。”先生一贯留心掌故之学，他到山西任职时，更讲究此事。“故于武备、仓储、河渠、地利诸书，不得不重加搜索，有可借者无不往借，至无可借处，犹出候补勉强之钱购之也”。^⑪清代锐意经营西北，

有志经世的爱国知识分子，多留意西北史地的研究，朱先生由于时势的需要，亦曾从事于此。人都知道先生熟悉蒙古的情况，因为他曾经奉命调解晋边和蒙古边界居民的械斗而获得成功。不料先生对新疆还有更多的研究。一日，其兄朱士琦和他谈及新疆，他就把新疆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都会民族、各地土产、以及管理制度和历史沿革，口述出来，瞭如指掌，如亲履其地，使人叹服不置。

先生说：“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朱士琦：《读袁简斋齐侍郎墓志铭书后》，见《宋氏传芳集》）是谓不通”。（九通指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九通属于类书，可供参考。

义理之学——理学其实是五经四书的道理研究，以仁为本，推己及人，以修身淑世为目的，以明辨慎思，依仁由义为手段，以省身克己，躬行实践为途径，是理论和实践合一的人生哲学。

词章之学——词章之学即文学，孔子之时已有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归之。孔子说：“修辞立其诚”。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可见孔子用文学来教育学生。魏曹丕《典论》说：“文章者经学之盛事，不朽之大业”。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后汉书》立《文苑传》，后世史家多从之。故朱先生列为五学之一。

朱先生重视词章之学，应有所论述。可是遗著中仅《朱氏传芳集凡例》^⑩一文有关于文学。此文虽是文集的体例，但也有关于文集的起源和分类，诗与文，散文与骈文的关系及其源流正变的考证，都是很精彩的。摘要录下：

“古人文字不以集名，《汉志》载赋颂歌诗一百家，皆不曰集。晋分四部（荀勖撰），四曰丁部，宋作七志（王俭撰），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也。文集题称始见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以谓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创，属文之士日众，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然则古所谓集，乃后人聚集前人所作，非作者自称为集也。”

“书目集部有别集，有总集。其总集总当世之集，有总一家之集。总录当世者始于《文章流别》（晋挚虞撰），后来《集苑》（谢混撰）、《集林》（刘义庆撰）其流也。李善所谓《中叶之辞林，酌前修之笔海》是也。总录一家者，著于《廖氏家集》（唐廖光瓘撰），后来《王氏文献》、《陈氏义溪世稿》其类也。陆机所谓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是也。”

“古人文集只以名氏名篇，南朝张融创加美号（融有玉海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而总集之玉台珠英仿之（徐陵有玉台新咏，崔融有珠英学士集），其在家集，则李氏花萼集、窦氏联珠集、谢氏兰玉集，咸缘义锡名者也。”

“刘勰文心，《明诗》先列，昭明文选，各录诗歌，盖诗即文也。尔后文粹文鉴诸书（《唐文粹》姚铉撰，《圣宋文鉴》吕祖谦撰），禀承靡异。但姚氏惟取古风，吕氏兼选近体，同源各委，稍别衡裁。窃谓五言七言，造端三百，排比声韵，具体梁陈，谓唐律不与汉魏同风，则汉魏亦未与风骚合派，径途旧群，运会攸异，观其会通，理无偏废。”

“昌黎古文，尊曰起衰，王杨时体，亦云不废。曰骈曰散，两艺分驰。全椒吴氏谓一奇一偶，数相生而相成，尚质尚文，道日衍而日盛，陶谷幽都之名，古史工于属对，观闲受侮之句，葩经已有两言。道其缘起，略见源流，沿流似分，叩源即合。所谓古文若肤，不如骈体，骈体有气，即是古文。信也，萧选浑合不分，于义为古。”

朱先生认为诗即文。《昭明文选》收入大量的诗歌，不仅诗文不分，而骈散体文亦兼收并蓄，韩愈古文，人称起八代之衰，而王、杨、卢、骆的骈文，杜甫亦谓“不废江河万古流”。文体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革和发展，流派作风虽与前代有所不同，但其源则一。

朱先生于诗还有许多精辟之论。乃先生讲学时口授其弟子者，我叔祖朱桥舫曾录一本，现将其关于《诗经》者摘要录出。^⑥

“诗为心声，古人感情丰富，郁积中怀，不能自止，故发为诗。古人为诗，先有诗而后有题，何以知之？现《金縢篇》‘名之曰鸛鹑’一句可知。后人先有题而后有诗，则性情已薄。三百篇之标题：一字如《氓》之诗、《丰》之诗等，两字如《关雎》等，三字如《殷其雷》，四字如《野有死麋》，五字如《昊天有性命》，皆篇之一字一句，并无深意存在于其间，以为篇什目录。此皆为诗人信口吟成，后人随意加题，实可为先有诗而后有题之证。今人先命题而后有诗，有序，有跋，有失其本意者也。”

“后人之诗，体无不备，而其源皆自三百篇来。后人有一字之诗以为奇矣，而不知三百篇早已有之，如缁衣之诗：‘敝，余又改为兮’，敝字是也。又二言之诗：如《吴越春秋》中‘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三百篇又有之，如‘祈父’，‘相殷’等是。汉魏乐府三字为句者极多，而三百篇早已有之，如‘绥万邦’，‘麟之趾’等句。四言之诗，三百篇最多。五言之诗后世极盛，而三百篇亦不少，如‘谁谓鼠无牙’之类。六言之诗，汉人渐有之，至唐人有六言绝句，亦自三百篇来。如‘谓尔迁于皇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是也。七言诗，三百篇已开其端，如‘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贻孙子’等句便是。八言诗，三百篇亦有，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至于九字以上之句，三百篇所无，后人亦卒不能成为诗体”。

朱先生关于三百篇对历代作家的影响，对历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比较研究以及学诗之法，还有许多精辟意见和经验之谈。先生论诗之语累累数千言，拙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介绍了。

先生受谢里甫的真传，尤工书法。康有为说：“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躞于欧、虞，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踰之象……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叔乎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⑦五十多年前，我曾将朱先生论书法的口说，从其门人朱桥舫笔记中整理出来发表，约千余言。^⑧可参看。

朱先生晚年勤于著述，属稿中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宋、辽、金、元、明）实征录》、《国朝大儒学案》、《晋乘》、《蒙古记》（后三种

书名未定)七种。先生逝世前,尽将文稿焚毁。其意殆不可知,有说先生无取于身后之名的,有说先生律己甚严,谦虚谨慎,不欲以未定之稿传于后人的。十年之后,门弟子简朝亮(竹居)等搜集先生的遗文编成《朱九江先生集》付印行世,收入之诗百余首,文40多篇(其中书札为多)而已,都是早已外传,而先生未能焚去的。康有为谓“先生之诗,精警雄奇,晚而淡雅,由杜韩陶谢而上汉魏,以溯风骚。先生之文,雄浑雅健,深入秦汉之奥”。我亦颇有同感。先生的道德文章博大崇高,而现代学者论之寥寥,且偏重其政绩,不无微憾。古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作者窃不自揆,学习之余,鸠集遗闻,谨将先生的学术大端,胪述如上,以表敬仰之忱,尚祈海内贤达有以教之。

- ①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页9,卷6页3。
 ② 陈澧:《东塾集》卷5《梁南溟传》。
 ③ 《朱氏传芳集》外集,潘铎《清故赠君奋之朱公墓志铭》及陈志澄撰《朱士琦行状》。
 ④ 《朱九江先生集》卷7《答王莱友书》。
 ⑤⑦⑨ 康有为:《朱九江先生佚文序》,载《不忍》杂志1915年号。
 ⑥ 《朱九江先生集·抵山西寄兄弟书》。
 ⑧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⑩ 《龚自珍全集》下册《与江子屏笺》。
 ⑪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6《八十自述》。
 ⑫ 简朝亮撰《朱九江讲学记》的有关部分。
 ⑬ 《朱九江先生集》卷8。
 ⑭ 同上卷7《寄伯兄书》。
 ⑮ 《朱氏传芳集》卷首及《朱九江先生文集》卷8。
 ⑯ 朱杰勤整理,《朱九江先生谈诗》,《广州学报》1937年1月第1卷第1期。
 ⑰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光绪年间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⑱ 朱杰勤整理《朱九江先生论书》,中山大学《文史汇刊》1935年5月第1卷第2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林有能

廖仲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李益然

廖仲恺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同时也是积极探求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先驱。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曾攻读政治经济专科，投身革命后，又长期负责财政工作，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今天，我们重温他在《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和一系列著作及讲演中，提出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些设想和理论观点，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由爱国而革命，由革命而振兴中国经济，这是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强烈愿望。在这方面，廖仲恺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在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经济建设不能慢慢来，不能老是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而是要迎头赶上。他在《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民国，是这新时代里的新国，这‘新’字的意味，不但是国名的新，而且是疆土的新。不但是精神的新，并且是物质的新。……中国的新青年，如果要在哪里听天打卦，不去除了那些建设的障碍，来利用这个祖先遗留下来的处女地，做成一个新国家，那就当真是最旧的旧古董了，比较非洲的、美洲的古国，还要旧了。要是努力去弄一个新建设，那时中国的新，不要说欧洲的旧国家是比不上我们的，就是最新的美国，也不见得比得上我们了。拿这样旧国家的底子，来变成一个新国家，把从前压死了的无穷的物产，要它活泼泼的输出；从前压死了的民生商业，要它热腾腾的发达。”（《廖仲恺集》第17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但是，要振兴中国经济，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理想，在当时是不容易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指出的，破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有两个祸根，一个是“帝国主义之

侵略”，一个是“军阀的压迫”。有鉴于此，廖仲恺在许多文章和讲演中分析批判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压迫对中国的危害，论述了根绝这两个祸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政治上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和人民贫穷的根源。“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这是一定的道理。”（223页）为此，廖仲恺以火一般的热情大声疾呼：“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吾人其不欲打倒国内军阀则已，否则必先唤起全国国民，共图国民革命。”（194页）这表明廖仲恺此时对革命与建设都必须反帝反封建已有了明确认识，因而使自己的经济思想在斗争中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廖仲恺在论述中国必须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时，还特别强调要对世界人类作出贡献。他分析了我国的领土、人口、资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世界上独立的国民，总以中国的国民为最多；世界上相连的领土，总以中国的领土为最阔；世界上未开的财源，总以中国的财源为最富；对于世界能够有最大贡献的就是中国。”又说，“我们建设能成功，就可以增加全人类幸福；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世界人类的义务。”（88页）他以此来激励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建设热情，以摆脱政治上受奴役，经济上遭压迫的地位，实现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廖仲恺把振兴中国经济同“增进全人类幸福”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革命党人艰辛求索的目标，视野实在比前辈以至比同时代的许多人开阔得多，心胸宽广得多。

廖仲恺对如何振兴中国经济，如何赶超西

方，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方针，这就是要“刺激生产的原动力”。他认为这是在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最有效的方法。廖仲恺之所以杰出，在于他很早就看清楚建设中国的途径，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使中国富强，如果忽视了“刺激生产的原动力”，无论怎样渴望“发展实业”、“振兴中华”，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都不会有补益。他强调：“若待民间资本自然之增殖，而不思利用社会的集团力，以最理想方法为助长之工，决不能脱离经济上藩属之地位，与东西资本国并存于世界。”（57页）所以“欲救贫乏，自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今之所谓利用机器，扩张工场，振兴实业，皆图所以解决此生产问题，以致富裕。”（284页）

廖仲恺怀着“自强”、“富国”的目的，从上述方针和观点出发，把扫除思想障碍，看作是中国由贫穷落后向繁荣富强转化的重要环节。他引用美国政治家亚力山大·威美尔顿的“大帝国做成民国”的理论来反驳卢梭、亚里士多德“大帝国不能治论”的观点，抨击当时所谓“人满之患”的谬论。并指出，中华民族只有依靠自己国家天然有利的条件——人多、地大、物博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能增强御侮能力。

在经济问题上，廖仲恺非常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他反复强调：“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31页）他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抓好铁路、运河的建设。”只有“以铁路、运河之力”，才能冲破传统的居全国十之八九的地域性自然经济的藩篱，只有“以有系统之交通组织”，才能疏通内地与边省或腹地物产和商品的流通渠道，“混全国为一经济单位”，扩大交换门路，增加生产刺激，繁荣国内市场，使中国的生产水平逐步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接近。廖仲恺把兴办铁路，建设运河定为振兴经济的一项国策，这表明他对我国经济关系的研究的逐步深化，并在实践中加深对我国经济体系的认识。

廖仲恺还重视积累资本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需要也不断发生变化。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总过程中，积累资本是直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继续。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不断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提供多方面的物质，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积累

资本，是不行的。他以“欧美各国，当产业革命后，机械之用日宏，生产之力日大，而资本之积亦日厚”（57页）为例，来说明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是达到增强我国国力，深固邦本，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廖仲恺把积累资本看作是扩大再生产复杂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按照他这一观点来发展生产、扩大再生产，其结果将是：国家的各业日益兴旺，投资生产总额不断增加，国民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廖仲恺还强调改革钱币的重要性。他认为，改革钱币是商品经济中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过程。他说：“生产消费，任阙其一，则两者均无用”。“经济社会，易事通工，局部供求，一赖钱币以资周转。”（52页）根据货币的职能，廖仲恺把改革金银币为纸币和统一全国货币，做为改革币制的核心。他针对当时中国“钱币之紊，省自为制，于同一经济单位中，而无统一国币流通四境之内”的情况，认为改中国金银硬币为纸币、统一全国货币之势，不可阻挡。他说：我国货物本位钱币制度，若改换“以纸币、银行券、支票之形式代其流通于社会”，并“以其盈余价值，依纸币形式拨入国库，以充政费”，“则金银数千年专制之毒害可除，而经济革命之实效可举。于此而民不富国不立者，未之或有。”（56、61页）由此可见，廖仲恺不仅看到改革币制在流通中的作用，而且把它提高到“富民”、“强国”重要措施的地位。这一远见卓识正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从上述，廖仲恺把“刺激生产的原动力”，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是振兴中国经济的思想。既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是与世界潮流俱进的。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廖仲恺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在论述怎样扫除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时，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税权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先决条件。

廖仲恺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作了分析，特别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的危害。他说：“迨帝国主义东渐，吾国沿江、

沿海之重要门户，皆为彼所冲破，凡江、河、海、铁路所及之处，皆变为其势力繁殖之所在地，以致此数千年来过惯安定生活之中国人，一变日处飘风凄雨中。”（194页）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不单只是要赔款的，还要把工业、商业的生命放在外人的手。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都是几万万的赔偿。”“他们定下条例，输入口货是不能抽过百分之七点五；入口货由海关抽了税后，无论到何处，不能再加抽算之例。”“海关的权在他们手上，我们欲改良也不能了。所以我们航业不能发达，农、工、商业样样都是失败的。这是条约的结果了！”（271—272页）

廖仲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看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后，坚定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没有自主权，因而不具备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条件，那么，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有真正的生产活力和经济繁荣的。他多次指出：“中国自受政治的束缚以后，又复受经济的束缚，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都困苦到了不得，所以士农工商各业，都不能发展。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力谋解脱束缚不可。”否则，“中国产业界上，无论有甚么高深学问的人才，化学、工业、矿学等等研究无论那样精深，资本无论那样巨大，皆不能有所作为。我们虽有资本、虽有人才，也不是一定能振兴我国的产业。”（224页）还值得注意的是，廖仲恺这时已明确认识到，我国的生产活力，有内因，也有外因。追求国家的经济繁荣和长远利益，是增强生产活力的内在动力；维护国家海关的自主权，增强和外来货物的竞争力，是刺激生产活力的外部条件。廖仲恺思想的尖锐之处，在于高屋建瓴，从几十年革命的痛苦经验教训中，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侵略和中国贫穷落后联系起来考察，断定“倘我们不能收回关税权，不能自定税律，则只成为消费者，专养外国资本制度的生长，愈养愈大；而我则愈贫愈弱，受他们的蚕食也愈甚。”（223页）因而大声疾呼：“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他，条约我们要推翻，我们才有翻身之日。”（272页）达到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难以达到的高度。

四

在探索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廖仲恺强调一

定要打破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世界潮流，加强国际联系，以利国家建设和民族前途。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东侵，中国“自给自足，独立生存的经济体系”，已被“外人要求通商”冲破，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几乎崩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当时中国之间，先进与落后的距离之大，使廖仲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采用盲目排外的方法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救亡图存，致富求强，只有在已“敞开大门”的基础上，实行开放政策，切切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各国通商、互惠，才能迎头赶上世界之潮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廖仲恺在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先进时，并没有步入民族自卑、崇洋媚外的歧途。他十分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利用外资、人才，只是我国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放弃依靠自己力量这个根本。实践证明，廖仲恺的这种见解是很明智的，也是正确的。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廖仲恺特别强调在对外开放中要保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从这个立场出发，对于民族压迫与掠夺，他坚决反对，而对于各国间的经济利益之平等互助，他则以满腔热情加以欢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竞争——弱肉强食、你死我活、损人利己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指出：“一国的供给和需要，因自然的方法而使之适合，其间若无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为之作梗，自然能实行的。若两法皆不能做到，须依赖其他的原因来补足他，这是最劣的方法。”（221页）因此，他十分强调“通商而无政治为之妨害”，才可以“促进国内的生产事业”。可是“现在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所谓门户开放的意义，就是开放中国的富源，保存他们的富源；拿中国的原料和人口，支持他们的生产机关和资本制度。”（221页）所以，廖仲恺认为，以保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为前提来确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今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重视的问题。

廖仲恺在探求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根据自己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认识，始终记住这个事实：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和欧美国家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开放型；但中国同欧美国家又有不同的实际和特点，那就是中国比欧美国家

家落后，“开放”是被迫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竞争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发展生产首先要以国内资金与国内市场为依托，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的资本、专业人才、科学技术。但他并未因此而忽视开拓商品的国际市场这个奋斗目标。他说：“一国的生产，当和该国人口及消费力，有密切的关系。只在消费力中求经济的独立，则当为其消费上设想，先满足该国人享乐的需要，然后分配于别国，这是经济独立的真正解决方法。”（219页）倘若开放只让外国人的制造品输于中国，“专替外人谋销路，为外国的资本家发大财，而于己国的生产，没有丝毫的增益，反足于供外人生产的营养”，（224页）岂不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吗？据此，廖仲恺认为，既注重发展中国的实业，又重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内外交往中求独立富强，中国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愿望一定可以更快地实现。

从上所述，在当时，廖仲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是敏感的，估计是清醒的，提出对外开放的主张是正确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面对中国仍然受到列强侵略，而且蚕食与鲸吞同迫的动荡局势，敢于提出以开放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见廖仲恺的魄力和卓识。

五

廖仲恺振兴中国经济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而在具体道路和建国办法问题上，则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同盟会成立后，廖仲恺热忱期望中国成为“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大多数人幸福”的国家。但是，他以为只要用“平均地权”和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就可达到人人“各遂平等生存”。这是他的主观幻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廖仲恺虽然追随孙中山继续奋斗，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仍未能改变“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的局面。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结合起来进行严峻的思考和研究。通过多方面的反复比较，廖仲恺公开地、直接地说要向苏俄学习，走

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241页）这是他的经济思想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跃进。

众所周知，廖仲恺在早年就已探究社会主义流派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但认识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振兴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则到这时才更真切。他归结说：“最近代国家之政治组织，非确实地立于经济基础上头，断不能希望它能够永久生存发达。但其中有两个不同主义，给国民来选择应用的，一个是资本主义，其他一个是社会主义。”（240页）对这两个主义，他作了比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就是社会的中心，一切生产尽靠他来把持，激励国家行政，不过从消极那方面排除些障碍罢了”。“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至于消费者那方面之利害如何，他却不顾”。（240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为消费而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240页）经过对照，他认定中国发展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奋斗的事业。应该提出，廖仲恺的“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为这时廖仲恺还未能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区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利弊，指出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廖仲恺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其实质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它已表现了廖仲恺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他阐述的许多观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有共同之处，因而在革命的斗争中，成为无产阶级真诚的同盟者。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廖仲恺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有卓见，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单位：文汇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有能

美国的援华抗日

蒋相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援华抗日。回顾一下这段史实，也许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战后直至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来说，也可以从这段经历中吸取一些教益。

自1938年12月至1940年11月，美国政府共给了国民党政府17000万美元的贷款。“租借法案”通过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便把中国纳入受援的国家之列。他宣称：“中国同样显示了亿万平民反抗肢解其国土的伟大意志。”“美国已经讲明，中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①美国所以要援助中国，主要是为了它自身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利益。驻华大使詹森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如果日本的扩张

危及美国船只在太平洋畅行无阻的权利和美国公民在亚洲自由贸易的权利，或者危及美国为菲律宾前途所订下的、并且必将实行的方针政策，那就会涉及美国的根本利益，我们就一定会像受到别人攻击那样起而捍卫我们的利益。^②

不过，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以前，甚至在1940年春纳粹德国对西欧发动闪电战以前，大多数美国政界人士仍以为在亚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列强能与美国联成强大的力量，仍指望日本会北进西伯利亚而不致南侵印度支那。直到1940年6月法国败降，美国才开始正视日本已取代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亚洲的地位并已建成其“东亚新秩序”这一事实。美国在整个东亚及太平洋的安全和利益已受到威胁。在这个时刻，美国还看到了，正在抗战的中国，乃是所剩无几的能够抵住日本侵略的壁垒之一，所以，支援中国抗日，将会起到遏制日本南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给中国援助，尽管是为了它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和以前有所不同，这种国家利益现已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就这一点来说，美国的援华抗日，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的。

不幸的是，美国开始援华以后，中国的内部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抗战的头一年半，国民党政府对作战虽比较积极，但仍压制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由于脱离群众，国民党军队连遭挫败，致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深入敌后，不断打击日寇，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日寇看到了这种危险，于1938年末占领武汉以后，便刹住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将其主力逐渐移至后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此同时，日本又对国民党实行诱降的策略。汪精卫为首

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这一派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但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压制共产党的政策。自此，国民党军队便与日寇配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反共，蒋介石于1940年10月18日亲自请詹森大使转告美国政府：

……我认为，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国民的士气，美国最好是给一笔大数，而不要另敲碎打地给一点贷款。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所怕的不是日军，这个我们的军队能够对付，我们怕的是拒不听命的共产党人。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美国空军的支援，可以把我们动荡的经济和社会情势稳定下来，这样，共产党就无所施其计。^③蒋介石向美国人直供不讳，他乞求大量美国经援和军援，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为了抗击日寇。10月19日，蒋便通过他的参谋总长，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內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在中国内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却仍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这样美援原来的积极作用消失无遗，反却起了鼓励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作用。如11月30日，美国政府不顾共产党驻重庆代表们的反对，决定给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使国民党更加有恃无恐，于1941年1月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乞求美援的目的，美国方面也是清楚的，如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路德断言：国民党必将与日军搞成实际上的休战而让美国人去打仗，它则将美援囤积起来，作内战之用，指望国民党对日寇发动攻势，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有些美国官员和民间观察家如伊文思·卡尔逊和艾德加·史诺等就曾经主张过：将美援直接发给在战场上与日寇拼搏的军队而不问其属于何种党派。

然而，美国政府尽管明知它与蒋政权的联盟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却既不修改其独与国民党打交道的政策，也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改变上述局面。这是美国政府出于更大目的的结果：打败法西斯国家，只不过是美国战略决策的一个方面，只不过是美国作战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夺取世界霸权，包括在远东的霸权。早在1939年2月，詹森大使就曾主张，美国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继承者，必须接过世界领导权的衣钵。他还对罗斯福说：“美国的边疆是整个世界。”^④美国估计到，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它将会碰到三个障碍：以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滋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战后肯定会增强的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力；老殖民主义国家的残余势力。罗斯福觉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对扫除这些障碍是有用的。沃尔特·腊斐布的《罗斯福、邱吉尔和印度支那》一文谈到了罗斯福的计划：

……罗斯福认为，蒋的政府在美国的太平洋计划中是个基本要素。……美国和中国“将维持亚洲的秩序”，非洲将由英国和巴西保持其稳定，欧洲将由英国和苏联来控制。总统曾在1943年3月告诉艾登，这些区域性的安排，则将由“决定基本政策”的美、苏、英、中四强来主持。艾登表示不同意，辩道：中国在战后将会动荡不宁。但是，据艾登说，罗斯福“仍坚信中国至少也是个潜在的世界强国，中国若

出现无政府状态，将是莫大的不幸，因此必须给蒋介石以最充分的支持。”……他还认为，“与苏联在政策上发生任何严重冲突时，中国都无疑会站在我们一边。”于是罗斯福又透露出他的计划的另一面。中国既然如此重要，英国就该放弃香港，作为“亲善”的表现。⑤

所谓“维持亚洲的秩序”，就是要中国承担起镇压亚洲革命运动的任务，并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美国的“新秩序”的轨道。罗斯福还认为，必须使中国成为“苏美之间的缓冲国”。此外，在取代老殖民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他还指望中国同美国站在一起。既然要完成这样一批艰巨的任务，当然就必须把中国抬高到世界大国的地位上。在中国国内，罗斯福又以为蒋政权是一个能安邦定国的力量，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国。因此，必须给蒋以“最充分的支持。”但是，这个“强国”又必须掌握在美国手中。罗斯福的把戏，就是“要扶植出这样一个中国：强到足以维持亚洲的秩序，而又要弱到必须依美国为靠山”。⑥然而，由于蒋政权的腐败，使得美国在支持蒋的同时，又希望他能够革新他的政府，并希望美援能诱使他这样做。

可见，即使是在援华抗日的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已含有另一面，那就是，要把国民党培养成为战后为美国称霸亚洲效劳的工具。后来，随着战争接近胜利，这一目的便日益压倒其他要求。连要国民党进行改革这一点也放弃了。

二

美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致力于对日作战，特派约瑟夫·史迪威来华，任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租借物资的经管人、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作为前线的司令官，史迪威当然要把对日作战放在首位，这就必须改革蒋的腐败的军事机构。他打算挑出30个师来加以改造、训练、装备，并置之于新的指挥人员之下。然而，他的计划，恰与蒋介石的军政体制相抵牾。

蒋的独裁统治，是建立在私有军队、特务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之上的。对中国共产党，他时软时硬，目的在于剿灭；对部队将领，特别是地方杂牌军，他以供应或克扣军饷军械来操纵；对日寇，他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对美国，他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使其内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更造成蒋大肆索取美援的机会。1941年12月30日，蒋召见美国大使高思，请求给他5亿美元的贷款。高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道：蒋说

日本在太平洋开战之初取得的胜利和利用这些胜利所作的宣传，已经影响士气。他特别提到最近泰国总理通过无线电广播向他呼吁亚洲人团结起来反对西方国家。中国可以用战斗的人力帮助共同的事业，但美国和英国必须在财政上援助中国，以防止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货币信用等进一步恶化。这种援助还能提高士气和封住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人的口。⑦

蒋是在暗示，没有大量贷款，他的政府就不能克服经济的恶化和失败主义的增长，他就不得不因此而去和日本一起搞所谓“亚洲人的团结”。他提出要求时又伴之以恐吓，而且是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挫时作这种恐吓。半年后，蒋又向美国提出三项要求：派三个师到中国来，立即建立一支拥有500架飞机的空军，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来华。从此以后，每当他认为美援给得不够时，便要挟说他将向日本投降。

1942年3月，美国正式给了蒋所要的5亿美元贷款。蒋曾对高思说，这笔款，将用其中一部分来作为在国内发行债券的准备金，以缓和通货膨胀。但这个计划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蒋的亲属、大官僚、银行家、大地主等独擅购买这种债券的特权，把美金转入他们的腰包。

蒋记国民党就是靠军队私有、流氓政治、贪污掠夺过日子的。要他们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史迪威提出的改造国民党军队的要求，只能引起蒋的疑忌，以为史要夺他的军队大权。⑥1942年7月，史迪威到任才4个月，蒋就命令其外交部长宋子文请求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也知道，蒋怕的是军队一改革就等于拆他的台。但是，不改革，史迪威又不可能速成能够驱除日寇的力量。因此，他和高思两人都力求美国政府不要因蒋的要挟而作丝毫让步。高思向他的政府建议：

应该作出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运给中国和用于中国，——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中国要什么，而是中国能够用什么，这点很重要，——然后告诉蒋我们将给他什么。

如果他坚持多要并以与日本媾和相威胁，那末，我认为，就应该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告诉他：他一旦与日本谈和，美国的军事代表团和外交使节就将立即撤走，不再与中国纠缠，美国的援华也就从此结束。⑦

美国政府是可以使出反威胁，并用美援为手段，迫使国民党进行改革，促其致力于抗战。

但事实却是，史迪威和高思的观点，不仅与蒋的根本利益冲突，而且也与美国政府中某些人的看法相左。史迪威强调应为打败日本作准备，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则是把目光放在蒋在战后的作用上。对蒋的乞讨和要挟，罗斯福作出了反应，派遣其行政助理罗奇林·居里作为特使来华（1942年7月21日至8月7日）。居里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建议：

我们正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对中国的、从而对亚洲的事态发展施加深刻的影响。我觉得，在军事和外交上都给蒋委员长以充分的支持，是深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为这种支持提什么条件，或附加什么要求。……我们可以信赖他，他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意图去做：执行努力作战的政策，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强国。⑧

居里是主张给蒋以无条件的支持。他最关心的是，罗斯福能够在亚洲取得“道义上的领导权并因而能够在战后施加影响，使亚洲问题得到可以接受的、公正的解决。”⑨这与罗斯福的倾向相投。罗斯福遂决定满足蒋的要求而不附条件。10月22日，他应承按蒋的愿望把空运物资增加到每月5000吨，派500架飞机来华。仅仅是因为参谋总长马歇尔和陆

军部长史汀生劝阻，他才没有在此时召回史迪威。

美国人希望蒋能改革，但也希望蒋能长期当权，充当美国战后争霸的工具。如果强求改革会失掉蒋的欢心，那末，这种要求就得放弃。罗斯福在1948年3月8日给马歇尔的一封信里写道：

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蒋委员长好不容易才当上四亿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除此而外，蒋委员长还觉得必须保持他的崇高地位。……他既是政府首脑，又是统帅，对这样一个人，不能对他说话不客气，或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硬要他作什么承诺。^⑭

为了争取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统治者来维护美国在战后亚洲的利益，罗斯福不赞成强求蒋介石为换取美援承担硬性的义务。

可是，蒋介石并不真正是什么“无可争议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是个没有人民支持的独裁者。罗斯福认为蒋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实际上不过是因为他找不到另外的他所需要的“强人”。美国决策人不是没有考虑过另找一个代用品，但是没有找到。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人数既少，秉性又软弱、动摇。他们的力量既不足以抗衡代表封建、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更不足以抗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况且美国的计划是要利用中国充当战后的亚洲宪兵，其性质就是反动的。这计划本身就排除了取得中国进步势力支持的可能性。因此，就只剩下蒋介石集团这个“无可争议的”选择对象。

为了维持蒋的地位和把中国作为强国对待，美国和英国于1948年2月与中国签订了新条约，放弃了以往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中所规定的种种特权，如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管理租界之权等等。1948年11月，罗斯福让中国在名义上参加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从而正式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宣言声称，这四大国将在战后继续维护和平和安全。罗斯福又邀请蒋介石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更突出地显示了国际上承认中国为强国。1948年11月28至26日，蒋同罗斯福、邱吉尔坐在一起，讨论扶助中国的计划，使其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首领。开罗会议召开的前夕，为了安排蒋的赴会事宜，罗斯福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在呈总统的报告中，赫尔利建议：

在评价蒋委员长的谈话时，最好是用带点怀疑的态度来考虑中国是否真有协助反攻的能力和意愿。最好是要考虑到中国中央政府所重视的是保存实力以撑持其战后在国内的统治地位，而不是打败日本这个眼前的目标。^⑮

赫尔利甚至劝罗斯福赞同蒋介石保存实力打内战而让美国去打日本的基本政策。蒋介石更加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已成了公认的四强之一的领袖，成了美国长远计划中的必不可少的角色，于是更加不肯作任何改革。

三

国民党的顽固、腐败、和无能，导致了1944年的大溃败。规模空前的、肆无忌惮的贪污浸透和败坏了整个军政机体。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薪给生活者挣扎在饥饿线上。忿激的情绪在他们当中不断增长。就在这个时刻，日寇为救其被孤立在东南亚的侵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凶恶攻势。4月18日，日寇在河南开始进攻。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日寇长驱直入，由湖南经广西一直侵入贵州。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惊惶失措，又一次准备逃亡。自4月至12月，国民党就丢失了60万军队，4个省会，145座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86个飞机场。这次崩溃充分显示了国民党推行反动政策的后果。

反之，到这个时期，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空前强大的力量，预示着新局面的即将来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抗战之初的1个增至19个。根据地的人口从150万人增至1亿人，人民军队则从4万人增至12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前后共消灭了52万日军。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们不仅仅是继续敦促国民党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彻底改革了，而且还一再力劝美国政府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准备反攻。在此以前，他们已请求美国政府派观察员访问延安。经过美国政府的反复催促，蒋勉强同意了。这样，美军观察组的首批人员于1944年7月22日抵达延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袖们亲自同观察组会谈，表示愿意与盟国合作，驱逐日寇，共建战后和平。但是，据观察组所奉的训令，它的首要任务只是弄清华北的军事情况。派这个观察组，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承担了援助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义务。

为了挽救日寇深入西南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史迪威还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他请求马歇尔允许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4年7月6日，罗斯福依从马歇尔的建议，致电蒋介石：

……依愚见，目前存在的危急局势，需要将协调所有盟国在华军事力量的权力交给一个人，这些军事力量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内。

……我将把史迪威擢为上将，请你火速考虑，把他从缅甸召来，直接在你下面指挥所有的中美各军。^④

军阀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军队为军阀所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夺去蒋的指挥权，就等于叫他退位。蒋介石是决不会答应的。他更害怕协调各军的史迪威会把美援分配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他又必须应付来自罗斯福的压力。只好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商讨如何授权给史迪威，借此把事情拖下去。罗斯福遂派赫尔利为特使，前来“商讨”。

由于此后的战局不断恶化，罗斯福又于1944年9月19日再电蒋介石，责怪他造成如

此“灾难性的后果”，催促他立即授史迪威以“不受任何拘束的指挥权”；并且暗示，不这样，就将断绝美援。^⑤ 蒋介石大为光火，视此为他“平生最大之耻辱”。^⑥ 9月24日，他请赫尔利转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声称他同意选派一个美国将领充当前敌指挥官，但决不能让史迪威担任此职，因为：

……史迪威将军毫无与我合作之意，反倒自以为实际上是奉命来指挥我的。……假如我无视理智和经验而派史迪威将军做前敌指挥官，那才是故意去招致必不可免的灾难。^⑦

赫尔利支持蒋介石，称蒋为最适于执行中美合作政策的领袖，还对罗斯福说：“我的看法是，你若在这次争端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甚至可能连中国也一起失掉”。^⑧ 要罗斯福在蒋史间作出抉择。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任命艾伯特·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但不要求魏德迈指挥任何中国军队。

罗斯福听从赫尔利的意见，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蒋介石是“必不可少的”。在前一年，他曾对他的儿子说：“在中国，有谁能代替蒋？就是没有别的领袖。不论蒋家有多少缺点，我们都得依靠他们。”^⑨ 副总统华莱士也是这么看。他向罗斯福报告：“在这个时候，除了支持蒋而外，似乎别无他法。中国现在并没有哪个领袖或集团显得有足够的力量来接替这个政府。”^⑩ 就这样，他们知道“对国民党政府，人民怨声载道”，但还是觉得没有其他办法而给予支持。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悲剧。

史迪威被撤换不久，赫尔利即接替高思而任驻华大使。1944年12月24日，这位新大使宣称：就他所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支持作为民国主席和三军统帅的蒋介石”。他还说，美国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所有的军政集团都统一在蒋的麾下。^⑪ 这样的政策，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必然就意味着援助蒋政权反共反人民，因而也就把美国卷入中国的内政，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这种干涉持续了很长时期，至今犹有遗迹。

总之，美国援华抗日的政策，是根据它的国家利益制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要求援华抗日。这一点，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在美国，所谓“国家利益”，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据这种利益制定的政策，即使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也必有其狭隘、反动的一面。美国统治集团在战时已考虑到战后，这似乎是看得比较远，但实际上是短视的，因为他们只是看到如何接替老牌帝国主义而自作远东的霸主，并为此在战后扶蒋反共敌视新中国，阻挠中华民族的统一。战后的历史证明，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在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的今天，美国更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放大一些，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切意图，在三个中美联合公报所订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 ① 福斯特·雷·杜勒斯：《中国与美国》(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第221—222页。
- ② 腊塞尔·布海特：《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Russell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第92页。
-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0年(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etions, 1940)第4卷，第673—674页。
- ④ 同上书，1939年第3卷，第513页。
- ⑤ 沃尔特·腊斐布：《罗斯福，邱吉尔与印度支那》(Walter LaFebe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Indo-China: 1942—945")，《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0(1975年12月)，第1280—1281页。
- ⑥ 戴维·狄尔克斯编：《亚力山大·贾德干爵士日记》(David Dilks,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第488页。
- ⑦ 《外交文件》1941年，第5卷，第768页。
- ⑧⑩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83、157页。
- ⑨⑪ 《外交文件》1942年，第114、713页。
- ⑩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3页。
- ⑫ 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279页。
- ⑬ 《外交文件》1943年，第166页。
- ⑭⑮⑰ 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的指挥问题》(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第383、445—446、453页。
- ⑱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3—174页。
- ⑲ 艾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154页。
- ⑳㉑ 《外交文件》1944年，第243、745—74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

许肇琳 张天枢

世界各地的广东籍华侨、华人约有1500多万人，广东籍港澳同胞有400多万人。他们一向热爱祖国，关心桑梓，素有在家乡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在捐资兴学方面，尤为突出。仅近年的统计，从1978年至1985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我省捐资办学的总投资约4亿多人民币。目前，这一热潮方兴未艾，如何发挥侨乡优势、促进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对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作一回顾与展望。

(一)

回顾历史，华侨捐资办学源远流长。

侨胞在海外自行办学，教育子女，始于1729年（雍正七年）。①海外华侨教育兴起较早。当时，清政府海禁未开，华侨很难为家乡兴学育才作贡献。到了19世纪末，清廷解除海禁，华侨获得返回祖国的合法权利。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奔走革命，鼓励兴学育才，提倡男女教育平等。1898年，康有为出走南洋，鼓吹合群维新，开办学堂。于是，侨情振奋，各地纷纷组织会馆，创办学校，海外华侨教育之风日盛。同时，他们响应国内兴学育才之号召，回到家乡捐资兴学。1908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扁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给扁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华侨以救国救民为本，纷纷回国兴办学堂。

在广东侨乡，华侨捐资办学始于何时，尚待查考。据目前所知，以创建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的原香山县南屏乡甄贤社学（今珠海市南屏学校）为先驱。甄贤社学为留美爱国华侨学者容闳（1828—1912年）所倡办。容氏南屏乡人，童年开始随教会接受西式教育。1847年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学成回国，致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②并上书当局，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1872年，他奉命主持办理招收幼童出洋留学的同时，在家乡倡导乡亲集资创办“甄贤社学”，并带头捐资500银元。亲乡有感于容氏的功绩，碑刻志之。

20世纪初，华侨在广东侨乡捐资办学之风兴起。台山县（旧称新宁县），1902年创办了浮石学堂；1905年，伍姓端芬成务学堂、谭姓育英学堂、梅姓蒙养学堂（后改为

培根学堂)也相继创立。新会县旅美华侨吴虞廷等人,1905年在家乡创立一所高等小学堂和六所初等小学堂。③南海籍华侨也于1905年先后在张槎乡、大江乡创办了陈氏学堂和冯氏学堂。④粤东大埔县华侨1906年在家乡创办了湖山官学(现名虎山中学);1908年,该县旅日华侨何定求、何展鹏、何继武又创办了乐群学堂。⑤平远县华侨姚峻修于1907年捐银元5000元给官立平远中学堂,作为开办经费。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尤其注重推动和指导华侨教育工作的发展。孙中山把普及教育作为振兴中华的决策,深得海外华侨的拥护。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关于“教育乃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⑦并“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的言行,在海外侨胞中影响尤深。于是,侨办学校进一步发展。1913年,平远华侨姚峻修再捐银元10万元,给平远中学建新校舍,置田产和购买图书仪器。⑧创建于1913年的梅县东山中学,创办之初就得南洋华侨丘燮亨等捐巨资,添置新设备、建设新校舍,使学校初具规模。1917年,冯平山先生在家乡新会县出资办起了贫民义塾(又名平山义塾,后改平山学校),专招收贫民子弟入学,免交学费,还供给一应笔墨。1920年,加拿域多利埠华侨成立了捐建台山中学总公司,筹集了加币249596元,扩建台山一中。20年代至30年代创建或扩建的侨办学校还有中山县的仙逸中学(1925年)、鹤山县的鹤山中学(1925年)、开平县的开侨中学(1927年)、海南的文昌中学、罗锋中学和琼文中学,等等。丰顺县旅泰华侨也于1925年集资4000多银元、为该县丰良中学(当时的县立中学)修建了一座命名为“暹侨楼”的教学楼。至1949年仅台山一县,旅外华侨为该县捐建了9所中学和82所小学。⑨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侨乡侨办学校获得蓬勃发展,新建立的侨办学校日益增多。截至1958年止,全省由华侨、归侨、侨眷捐资兴办或赞助的中等学校达96所,能容纳华侨学生、侨眷子弟19,700多人就学,⑩还办了一批小学和幼儿园。1957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海外华侨集资兴学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仅普宁县的华侨、归侨和侨眷,在1958年一年里便创办了八所中学。⑪为支持办好侨办学校,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帮助侨办学校解决经费困难,如高鹤一中,从1957年至1963年,政府先后拨款达27万元人民币,增建了礼堂、课堂和学生宿舍。为解决侨生和侨眷子弟的经济困难,又给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仅1961年,此项拨款达23588万元。所以,学校获得顺利发展,学生数从解放时的285人,增至1200多人(现约2000人)。⑫但是,“文革”十年浩劫,国家的侨务政策被践踏,侨乡教育受摧残,华侨办学的事业一度中断。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侨务政策得以重申,各地各类侨办学校相继恢复,广东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又掀起了在家乡捐资办学的热潮。1981年8月6日,广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若干问题通知》，充分肯定了华侨、港澳同胞在家乡捐资办学的义举，《通知》规定：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建校项目，应列入当地基建计划，并作为优先项目安排。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兴学、作育人才的热潮更加高涨，捐资办学款额一年比一年增长。1978年全省华侨、港澳同胞在家乡兴办中小学校的总投资折合人民币共268万元，1979年增至552万元，1980年达1551万元，1981年1976万元，1982年3374万元，1983年4252万元，1984年6584万元，1985年9175万元。1985年的总投资是1978年35倍。个人捐资百万港元以上的就有50多人。

近年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家乡兴学育才，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基础教育。教育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中小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我国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教师和必要的设备缺乏，与四化建设的要求极不相适应。广大华侨、港澳同胞为振兴中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为造就数以亿计的熟练劳动者，出钱献策，尤其关心家乡的基础教育。例如：台山县，从1978年至1988年止，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支助家乡办学的有16000多人次，总捐资折合人民币1800多万元，接受捐资学校有218所，占全县学校总数的45%。其中完全新建的学校计有中学16所、小学19所，扩建校舍的学校178所，总建筑面积达九万多平方米。四年的成绩超过过去40年，^⑩促进了全县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1984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初中在校学生数为1949年的12倍，高中在校学生数为1949年的15倍。幼儿教育、师范教育和成人教育均有长足发展，成为广东著名的文化之乡。又如，新会县至1984年4月止，全县由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新建、扩建的中、小学校共有91所，总建筑面积达82695平方米，其中个人独资捐建的12所，集资新建的37所、扩建的42所。此外，还捐赠教学仪器、图书一大批，学生台凳10000套。新会县于1981年率先成为广东省实现普及小学五年教育，适龄学童入学率达99.1%，具备了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条件。

第二，新建侨办学校，不论从规模、结构、设备都较完备齐全。除修建一般的教室和教师办公楼外，还有实验室、音乐室、图书馆、礼堂（兼体育馆）、乃至科学馆、外加学校围墙、门楼、传达室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规范的教学园地。有的还设有游泳池和400米跑道大运动场，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得到发展。有的侨办学校还关心教师生活和工作条件，如丰顺县东海中学，在建校舍的同时，为教师修建了六栋宿舍楼房，共36单元。全省已落成的侨办新学校中，规模宏伟、设计得体、设备较齐整的，首推新会县陈瑞琪中学。这是一所由香港同胞陈瑞琪先生的后裔以1000万港元独资捐赠，总建筑面积为14000平方米。计有教学楼六座共36间课室；教务办公楼、实验室、图书馆各一座；还有实验工厂、学生宿舍、教师公寓等建筑；另建室内体育馆、室外400米跑道运动场、游泳池等健身设施。学校布局合理，构图新颖，教学楼的采光、通风和隔音都十分考究，完全符合部颁标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除集资或独资为家乡修建校舍外，还注意给学校配备教学所需的设备，如微电脑、电视机、显微镜、收录

机、钢琴、图书及至课桌凳、汽车等。

第三，能从维持学校长期稳定发展着想，组建学校董事会，设立教育基金等。如台山县附城南强小学，设有100万港元教育基金，每年都有一定款项汇给学校，供学校的维修、扩建及其他费用，学生入学一律免学费。^④中山华侨中学，也设有180万港元教育基金，每年有近20万港元汇给学校维持日常费用。

第四，为鼓励教师教好书、学生读好书，把学校办好，华侨、港澳同胞还特地设立奖教金和奖学金。仅台山一县就有14所侨办学校设立了奖教金和奖学金。旅美华侨黄伯旋先生为家乡学校设立了“长城奖金基金会”。从1982年起至2000年，每年从中提出2000美元，作为奖励教得好和学得好的师生。他在临终时嘱咐家人于每年三月按规定把款汇回家乡学校，并将遗嘱录音，鼓励家乡乡亲办好学校，培养好后代；爱国爱乡之情，感人肺腑。

华侨捐资、集资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形式：

(1) 独资捐建。即由个人承担全部建校费用，如新会县的陈瑞琪中学、潮阳县的峡山学校、普宁县的秀陇学校，等等。

(2) 集资兴建。即以宗亲、姓氏、邑侨集资合建。这是比较普遍的形式。

(3) 国内外乡亲合力筹建。即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助一部分，国内侨眷乡亲募集一部分。如潮阳县和平区新龙中学，华侨、港澳同胞集资折合人民币22万元，国内乡亲募集8万元，县补助2万多元，合资82万元，建成校舍1780平方米，设有课室16间，宿舍15间。和平区新和学校，华侨、港澳同胞集资折合人民币18,000元，国内乡亲筹集191000元，共204000元，建成校舍584平方米。

(4) 华侨、港澳同胞出资，国内乡亲献工献料，国内国外乡亲各尽其力。

总之，各地根据本乡的具体情况、条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形式达到办学目的，确是百花齐放满园春。

(三)

总结多年来华侨办学经验，为更好地发挥侨乡优势，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第一，必须坚定这样的认识，即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办学是他们爱国爱乡和热心家乡祖籍教育事业的表现，对侨乡四化建设是一种贡献。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热心家乡祖籍教育事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中华民族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故乡情，“饮水思源”和“叶茂不忘本”的思想观念深埋在他们的心底，并形成传统。华侨、华人一般还存有修善积德思想，把兴办教育看作是造福桑梓的慈善事业。这些都是他们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动力。这些思想观念，即使在某一时期受到挫折，也难割断。台山籍乡亲伍××先生，“文革”前他就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捐资办学，赠款修

路、筑渡头。“文革”期间却遭到缺席批判，祖坟被挖，祖屋被没收，但他仍念念不忘家乡祖籍，仍然教育子孙不要忘记根本，要爱祖国、爱家乡。他临终时把财产分为四份，三个儿子各得一份，留下一份财产嘱咐儿孙在以后条件许可时把它用于家乡的公益和福利事业。^⑮

第二，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是激发华侨捐资兴学的保证。十年浩劫期间，海外赤子“爱国有心，报国无门”。近几年来，华侨、港澳同胞所以能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如此贡献，无疑是与切实落实各项侨务政策有关。从当前广东省各地侨乡情况来看，各地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的热情高低尚不一样，那些未能挖掘侨乡办学优势的地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未端正对华侨、港澳同胞及其捐资办学的态度，侨务政策未很好落实。而各地成功的经验都说明了：华侨、港澳同胞对家乡教育事业贡献的大小，同落实侨务政策的程度成正比。而具体落实华侨政策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落实侨房归还政策。华侨、港澳同胞把祖屋看作是他们的龙头，发迹的根基，因而特别珍视自己的祖屋。即使已经残破不堪，都被视为至宝。归还祖屋，就会使他们由衷感激，一切疑心和隔阂，都会烟消云散。台山县端芬区塘头乡旅美老华侨阮先生，私房改造时，祖屋《铭园》被没收，意见很大。1982年落实侨务政策，把《铭园》退还给他后，他不顾八十高龄，专程回来，不留城市、不住宾馆，迳奔家乡，住进祖屋《铭园》。而后十分高兴地说：“这次住《铭园》是多年来睡得最香的夜晚。”他感慨之余，赋诗一首：“重洋难隔思乡情，爱国建乡私可忘。八十游子归故里，志为后人绘前程。”表达了他的故乡情和为家乡建设出力的夙愿。他回美国以后，奔波各地，筹集资金，为家乡建成了一所中学——塘头中学。建校期间，他还不辞劳苦，住下来亲自监督建校工程，一连数月。^⑯中山县乡亲马应彪是香港先施公司创办人，在这次落实侨务政策中，把他的三幢房子的产权交还给马家，使马家宗亲十分感动，相率回乡瞻仰祖屋。而后决定将这三幢房屋捐赠给家乡开办学校，还汇款人民币15万元作为学校开办费，并捐赠一批教学设备。

华侨、港澳同胞的祖屋也是他们同祖籍联系的“纽带”。许多地方在落实侨房政策后，老一辈华侨率领子孙后代回家乡瞻仰祖屋和祭祖，言传身教地把爱国爱乡思想传给后代。年轻一代通过回来寻根认祖，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同家乡亲人的联络和密切同祖国祖籍的关系。还可以激发广大华侨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友好关系架设“桥梁”，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第三，要保护和发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办学的积极性。根据各地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1) 必须加强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办学资金的管理使用，发挥其最大经济效益，才能符合他们的心愿。首先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也不要铺张浪费，更不能中饱私囊。其次要讲求实效，既要发挥经济效益，还要把学校办好，注重教学育才的效果。

(2) 办学过程中，在注意修建校舍的规范化、合理化的同时，还要注意改造教育

手段，注意配备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条件。

(3) 在办好本乡本土小学教育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支持县(市)的中等教育。有的乡村的侨办小学校教室用不完，设备多余，而区、县的中学则校舍不足，设备欠缺。因此，务必要综观国家全局、放眼未来，为培养有科学知识、有更高生产技能的科学技术人才作贡献。可喜的是，近些年已有些华侨、港澳同胞认识到：“教育不发展，难望人之前”，开始注意在兴办家乡小学的基础上，进而重视办好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丰顺县、海丰县、汕头达濠区的华侨、港澳同胞捐集或独资筹建县、区的华侨中学校，已经建成或正在筹建的汕头大学、佛山大学、五邑大学、嘉应大学、中山县孙文学院等，都有华侨、港澳同胞的贡献。独资兴办汕头大学的港澳同胞李嘉诚先生说得好：振兴教育乃强国富民之本，舍此不足以兴邦。有好机器、好设备、好技术，没有好的人才去掌握它、使用它，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他决心兴办汕头大学，为祖国“四化”建设培养人才。截至1985年止，他已为汕头大学总共捐赠了港币2.4亿元，并表示为办好汕头大学，继续作出贡献。

① 第四次中华民国年鉴。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

③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第九期。

④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第十一期。

⑤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

⑥⑧ 《平远县志续编资料》。

⑦ 王增炳、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⑨ 《台山县华侨、港澳同胞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台山县教育局华侨办学史编写组。

⑩⑪ 何惠《在蓬勃发展中的侨办学校》《侨务报》1959年9月。

⑫ 《迎接高鹤一中五十四周年校刊》，校庆筹委会，1979年。

⑬⑭⑮⑯ 台山县侨务办公室：《落实各项华侨政策，促进华侨捐资办学》。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

责任编辑：石成

中西方学者论文化的矛盾动力性

〔香港〕鲁凡之

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虽然具有内在整合的“整体性”——即文化内在地具有整合、同化的作用，使各个组成部分发生有机的连系，因而具有统一的基本形格；然而，象世界上任何统一体一样，不管其内在有机性如何强，“整合”作用和“同化”作用如何广泛而细密，这“统一”只能是基本的而非完全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整体性”是带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它立足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及相互制约的基础之上——若提到哲学的层面来说，任何“统一体”都只能是“矛盾统一体”或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当然包括所谓“整体性”的文化在内。

中国古代智慧，可以说最早掌握到世界的矛盾动力性，《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①《老子》在提出“道生一”的同时又提出“反者道之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的宇宙体，那是超越文化（人）而回归自然（天）的“天人合一”的“一”。从《周易》到《道德经》，“道”都既是天之道的自然规律，也是人之道的文化规律。只是《周易》有较鲜明的人文倾向，对“文化”给予正面的肯定价值，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③天道里是交溶着人道的能动性的。而《道德经》则显然有着反人文的宇宙本体倾向，所谓“道法自然”，④是“朴散则为器”⑤才产生文化。“朴散”是人与道割裂的坠落，因而文化是坠落，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⑥在老子看来，“文化”就是“大伪”，是“大道废”的恶果。而人类若要回归于“道”，便唯有将文化视为反面价值而消除之，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⑦这是对“文化”给予反面的否定价值，认为只有损“大伪”才能回归“大道”，只有损“文化”才能回归于“一”。显然，在老子的文化哲学里，人之道的文化规律是要“损之又损”，以化入天之道的自然规律里的。在文化观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上，《周易》与《老子》有着截然相反的取向：前者倾向于“道”，通过人本能动的文化来体现，后者则倾向于人为的文化隐退才见“道”；前者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便成“人能弘道”的儒家思想，后者的观点则是“道法自然”彻底化的道家思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思潮两股干流的源头。但我希望在这讨论中指出的是，中国文化思潮的这两股干流虽然有着上述的大歧异，但它们对世界（包括自然及人为的文化）的发展动力的看法，却又是基本相同的：将“大道”和“万物”都视为“阴”与“阳”矛盾——也就是“反”与“正”矛盾的演

化，而且确定“反”是发展的动力，但无论怎样“反”，却又要达到“和”的矛盾统一。

中国文化这种对于既具“整体性”（统一）、也具“阴阳互演”（矛盾）的自觉，在世界上可说是属于先觉者，对后来西方的历史哲学及文化理论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虽有着古希腊哲学的渊源，但在17、18世纪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学西渐”之后，老子哲学对西方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黑格尔著名的“正、反、合”的提法，我们在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反者道之动”等论说里，是否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概念原型呢？！及至20世纪，在西方被视为一代史学大师的汤恩比（Arnold Toynbee），更直接应用中国源自《周易》及《老子》的“阴阳互演”理论，将之发展成为所谓“挑战与回应”的著名模式，用以分析世界上所有文化（汤恩比提出21个，比斯本格勒多出三倍）的产生、成长与灭亡；汤恩比概括地写道：

“当‘阴’态完满之后，它便准备要进入‘阳’态了。……以科学的语言而论，我们可以说，自外侵入的因素（intruding factor），是在提供一种计算精确的刺激，以唤起被侵系统中最大的创造潜力；以神话学与神学的语言来说，则魔鬼之侵入上帝的领域，即是一种促使完备的“阴”态进入新兴的“阳”态活动，所必须的驱迫或推动。”

“最具激励性的挑战，是处于过份严厉与不够严厉之间，……真正‘适度’的挑战，不但要激励被挑战的团体，达到一项成功的回应，而且要激励它获得一种‘动力’，这‘动力’能使它更向前迈进一步，从既有的成就走向新生的奋斗，从解决一项问题走向提出另一问题，从‘阴’态复进入‘阳’态。”^⑥

汤恩比认为人类文化的产生与成长，均由于“挑战”与“回应”之间所激发的矛盾动力，至于某些文化的灭亡，则由于不能成功地“回应挑战”。在汤恩比的理论架构里，“挑战”就是“阴”，“回应”就是“阳”，促进文化的“挑战与回应”的矛盾动力，则是取自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阴”与“阳”的矛盾动力——这是关于文化的矛盾动力性质在“整体性”层面的一种清楚的揭示。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里，黑格尔既提出“整体性”的思想，也提出“正、反、合”的辩证法，而这两方面对后来马克思学说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马克思学说讨论“整体性”的方面，我在另一篇文章已有详细阐述，现在阐述一下被视为其学说标志的矛盾斗争理论。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乃由矛盾斗争所推动，这些矛盾错综复杂，但主要可以概括为下列的几个范畴：

- （a）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 （b）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或结构与超结构的矛盾）；
- （c）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 （d）阶级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构成一种“整体性”（卢卡契所谓“经济整体性”），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却是推动二者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片面强调生产力及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观点都曾经出现过，但就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来说，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既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亦是赖矛盾冲突去发展的“对立统一体”；在另一层面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结构与超结构之间也构成一种“整体性”（卢卡契所谓“社会整体性”^⑨、葛兰西所谓“历史组合”、^⑩亚尔杜塞尔所谓“综合整体”），^⑪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推动二者发展的动力，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里亦曾出现过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及片面强调上层建筑的观点，但马克思本人却是明确地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与超结构视为既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亦有赖矛盾冲突去发展的“对立统一体”。

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在阶级未产生以前的社会，阶级产生以后的社会，或是将来阶级消灭的社会，作为社会有机整体（即我在本文所谓的文化结构）的发展，都是基本上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动力的，而在阶级社会阶段，这些矛盾则又往往结合性地表现为阶级矛盾，以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⑫实即认为，矛盾冲突产生文化，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则推动文化的成长，而文化的继续成长又反过来消灭阶级斗争，但矛盾冲突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逻辑，可视之为马克思的文化矛盾动力学的主轴。

马克思曾自称其理论为一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所谓文化矛盾动力学即为“批判理论”的一种具体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很能为“批判理论”及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矛盾动力学作哲学性的表达：

“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⑬

用这种方法论去分析文化问题，可得出如下的要点：（a）文化象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矛盾及由此而来的斗争，但斗争有时显著有时缓和；（b）矛盾的诸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统一性或同一性，从而形成文化的“整体性”，但“整体性”只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及斗争的相对缓和，而并非不存在矛盾及斗争；（c）文化由一种发展形态的“整体性”演变为另一种发展形态的“整体性”，则通过比较显著的矛盾冲突及剧烈斗争，其间“整体性”或许会受到一定破坏，但基本上却只属过渡状态的现象，结果是新形态的“整体性”取代旧形态的“整体性”，虽然若干新因子早已存在于旧的“整体性”内部，而若干旧因子经过改造后也可参与构成新的“整体性”，这种因子之间的再配置、再整合，显示了文化改造的可能性，但其动力则是不同因子或不同侧面之间的矛盾斗争；（d）在文化的“整体性”（毛泽东所谓“同一性”）之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与超结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等等，都是相互矛盾着的侧面，在不同层面上各引出或明或暗，或激或缓、或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则总汇成“整体性”层面的斗争，从而构成文化发展的矛盾动力。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到中国，在矛盾理论上是有所发展的。

再说回西方理论。社会学发展，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强调矛盾斗争的学说之外，针对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瓦解问题，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的社会学大师索罗金（P. A. Sorokins），80年代即曾提出一套所谓“社会文化动力学”。他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称为“感性文化”，认为这“感性文化”给西方带来了“人类退化”、“价值原子化”、“人类野蛮化”、“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等等。今日西方已“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调，而且关连到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文化要经历“危机——考验——净化——神圣——复活”的发展模式，“感性文化”正在瓦解，“理念文化”即将重临，“这个改革包括了价值系统根基的改换，以及文化价值、人类关系的彻底变更”，它“要由宗教革命来完成”，使西方人“从感性的罪恶中提升出来”。^⑩索罗金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作由中世纪“理念文化”向另一新“理念文化”过渡的“转型期”，这“转型期”里充满社会分裂及矛盾冲突，在索罗金看来，处于两种“理念文化”之间的资本主义“感性文化”是人性的—种坠落、文化的一种病态，其特征就是充满社会分裂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可以将索罗金的文化理论简略地总结一下：第一，他从内心深处厌恶分裂、矛盾、冲突、斗争，他的灵魂实质上是中世纪的灵魂，憧憬着或怀恋着“理念型”宗教世界的和谐、统一、无争、完整，俄罗斯民族的深沉和宗教无疑在他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某种排除矛盾冲突的“整体性”，可说是他的文化理想（即他所谓新“理念文化”的内容）；第二，他客观地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充满分裂、矛盾、冲突、斗争，但他却将它仅仅视为人性堕落，仅仅视为文化瓦解及文化“转型期”的病态现象；第三，他寄希望于一次“整体性”的斗争——新的宗教革命——一种文化革命，来挽救西方文化，这样，他又肯定矛盾冲突对文化更新的必要性，他的目标是排除矛盾斗争的和谐完整。根据上述的简括，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一些批判：第一，否认“整体性”的思想（例如波柏尔）是一个极端的偏差，寻求排除矛盾斗争的绝对“整体性”（例如索罗金），则是另一个极端的偏差，我们肯定“整体性”必须与肯定矛盾动力的观点辩证地结合起来，偏废任何一方面都属于机械性思维的表现。第二，矛盾动力是一种普遍性，人性升华时是如此，人性堕落时也是如此；文化新生及成长时是如此，文化瓦解及灭亡时也是如此。世界上既没有离开矛盾的和谐，也没有离开斗争的完整。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片面地发展了分裂、矛盾、冲突、斗争和“价值原子化”等等，这些诚然与西方文化的解体现象相关连，索罗金寻求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改造以回应西方文化危机，这种想法基本上也并没有错——虽然寄希望于一次新的基督教宗教革命则未免是空想（甚至带有复辟情绪），但西方持续已久的文化危机需要“整体性”的文化革命来挽救，这种提法则确实具有客观依据。可是，索罗金不能够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于是一股脑儿地将对抗性的矛盾统统视为人性堕落、文化瓦解，不理解他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谐完

整也是包含着“非对抗性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只能通过文化改造促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尽可能非对抗性化，不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不能取消掉或主观地否认其存在的。事实上，矛盾是一切文化及世间事物的发展动力根源。

在美国还有另一派影响重大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社会学，其大师帕生斯(Talcott Parsons)发展了一套以功能关系“整合”为枢纽的“大理论”(grand theory)，^⑤这是一种肯定社会文化“整体性”的理论。但帕生斯的大弟子密顿(Robert Merton)虽继承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好些基本前提，但他却对他的老师的理论提出批判，认为帕生斯过份强调“整合”的功能一体性——“整合”并没有错，但“过度整合”(over-integration)则是一种偏差。“过度整合”忽视了社会文化内部的不可整合因素，忽视了矛盾冲突带来不平衡的离异以至基本模式的变迁。帕生斯虽也有“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的概念，但毕竟是过份强调了“整合”而低估了矛盾冲突。为了弥补帕生斯理论的不足，密顿提出了“脱序”(anomie)的概念，^⑥认为“整合”的同时有“脱序”，看到情况的两方面才不致于将“整合”变成“过度整合”。所谓“脱序”正是对矛盾冲突的承认。密顿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有三项有偏差的假设，即“社会功能一体假设”(postulate of functional unity of society)、“泛功能主义假设”(postulate of universal functionalism)、“不可欠缺假设”(postulate of indispensability)。密顿认为社会功能关系有不“整合”的一面，“以功能一体假设(此假设可能相当切合某些无文字社会)并入功能分析的模型中是很危险的”，“不能假设所有社会都充分地整合，……必须承认文化事项可能有多种后果”，其中有些是“功能的”(functional)，而其他或许是“功能失调的”(dysfunctional)，以至是“非功能的”(non-functional)，而履行某些功能的文化因子亦非绝对地不可欠缺，相对的功能对等项(functional equivalents)或“功能替代项”(functional substitutes)是存在的。总的来说，密顿并没有否定社会文化“整合”的“整体性”，他否定的只是排除矛盾脱序、排除变项选择的“过度整合”，即否定将“整体性”绝对化，并指出组成社会文化统一体的诸因子之间，有“功能的”、“功能失调的”、“非功能的”的矛盾，在“功能的”范畴内也有“显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与“隐性功能”(latent function)的矛盾。

密顿亦认识到，结构功能主义那种排除矛盾冲突的“过度整合”倾向，片面地“根据其功能来描述社会制度，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目的论(teleology)”。客观地看，帕生斯社会学的一个重大作用，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斗争——变革理论，而发展出一套“过度整合”的保守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斗争理论并不排斥“整合”、“同一”的“整体性”，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倒是帕生斯的“整合”理论排斥了矛盾冲突与变革，因而他自己的门人批评他“过度整合”，而提出“脱序”、“反功能”之类显示矛盾冲突的概念来作理论调整。密顿本人并不愿意别人称他为结构功能主义者，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从这一学术渊源来的。其实，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里，为保守主义作合理化解释的结构功能主义早已陷进理论危机，这一点，曾专门讨论过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哥尔德纳

尔(Alvin Gouldner)在十多年前即指出过了。^⑩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社会冲突的显著扩大化,西方文化危机的“脱序”现象日趋严重,都给结构功能主义以事实的打击。密顿在检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指出:“功能失调的概念在结构的层面上蕴含紧张、压力的概念,可提供一条研究动态与变迁的途径”,结构功能主义本身的传统已经转向注重矛盾冲突的研究,密顿就是一个代表者。这样,这个在美国形成的社会学传统,与在西欧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包括社会学)传统之间,便可以有了较多的对话基础,肯定社会文化的矛盾动力性质,正是这共同基础之一。

- ① 《易·系辞上》。
- ② 《老子》四十一章、四十二章。
- ③ 《易·乾》。
- ④ 《老子》二十五章。
- ⑤ 《老子》二十八章。
- ⑥ 《老子》十八章。
- ⑦ 《老子》四十八章。
- ⑧ 参见汤恩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节写本上卷。
- ⑨ 参见卢卡契(Georg Lukacs):《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⑩ 参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
- ⑪ 参见亚尔杜塞尔(Louis Althusser):《给马克思》(《For Marx》)。
-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 ⑬ 毛泽东:《矛盾论》。
- ⑭ 参见索罗金(P.A.Sorokins):《我们时代的危机》(《The Crisis of Our Age》)以及《人道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 ⑮ 参见帕生斯(Talcott Parsons):《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理论的当前地位》(《The Present Status of“Structural-Functional”Theory in Sociology》)。
- ⑯ 参看密顿(Robert Merton):《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 ⑰ 参看哥尔德纳尔(Alvin Gouldner):《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美学研究范围的自律与扩展

彭修良

“美学冷下去了，文化学热起来了”，这是时下的议论。其实美学与文化学并不存在学科间的屏障，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美国著名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在他的《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中曾写道：“文化的范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扩大，对近代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美学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涉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①并说美国美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是美国文化本身的某些倾向的逐步成熟所造成的。”^②因为美的规律，审美活动的规律是由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制约的，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决，首先直接取决于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特性的研究，而美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化圈层的扩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文化学的研究也是美学不断发展的需要。

美学研究的范围是历史地发展和变化的。自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鲍姆嘉通主张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来，中经康德、谢林、黑格尔，由于他们都忽视物质实践的伟大作用，一直把人类物质生活中的审美活动排斥在美学大门之外，把美学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认为美学只研究艺术问题，研究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规律、艺术发展的规律。如康德，他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即实践的、认识论的和美学的，而美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实践的和认识论的领域，这样就拒绝了人类物质生活中的审美活动。谢林、黑格尔认为审美活动是非功利的，与实用无关，是与物质生活、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高于物质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于是他们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的哲学”。这种美学研究范围的界说，延续了150年之久，至今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文化圈层的扩展，美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托马斯·门罗就明确地指出：“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它的研究领域

主要由下面两组现象组成，一组包括艺术作品（绘画、诗歌、舞蹈、建筑、交响乐等）或其他类型的产品、形式或作品；另一组包括与艺术作品有关的人类活动，如：外在的和内在的行为和经验方式、技巧、对刺激的反应、创造、生产和表演艺术的活动，还有领会、鉴赏、使用、欣赏、评价、管理、教学诸如此类的活动。”^③按照他的意见，艺术不仅是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等等，而且服装设计、烹调术、整形外科学、纹身、酿酒等等也是艺术。在他列举的四百多种艺术样式里，其中绝大部分已超出艺术范围，其中有一些属于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审美问题。瑞士著名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约瑟夫·甘蒂纳和托马斯·门罗一样，也认为美学已经超出了仅仅对艺术的研究，美学不仅要结合人的艺术活动，而且也要结合人的物质活动，因此，他将当代美学概括为“环境美学”。

美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在苏联一些著名美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如奥夫相尼科夫几乎在他的每部著作中都强调：生产和生活中贯穿着人的审美活动，美学应该广泛地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并对以往的美学批评道：“几个世纪以来，美学处于一种不涉及物质生产而局限于艺术领域的状态……这种观点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生产劳动的极端不公正的态度。”^④A·齐斯也说：“在一个人们摆脱了贫困，对未来满怀希望的社会里，审美原则取得了以前社会无法相比的巨大意义。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课题是研究现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审美活动的各种方式，包括工业艺术设计，审美教育，人周围环境的审美性质，以及审美原则的其他各种表现。”^⑤尤·鲍列夫在他的《美学》一书中也明确写道，当人的活动表现出族属的意义时，“全人类的因素赋予人的活动以审美的色彩或者至少是审美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任何活动在一定程度

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审美活动。”^⑥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他们为美学制定的原则，而是它反映出了当代美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现代发达社会，把美学原则运用于对客观世界各种方式的实际掌握之中的巨大意义。

近两年来，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我国也有一些美学家注意到了美学问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注意到了审美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并着手从理论上探讨这些问题，以至出现了一些与美学有关的边缘性的学科，如经济美学、商品美学、工业美学、服装美学等等。但是不管美学研究范围在现代有多么大的扩展，至少我们不能把客观世界的所有现象都归入美学研究的范围，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创造和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的审美内容从美学中排斥出去，使美学研究的范围变得过分狭窄，以至妨碍美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准确地界定和扩大美学研究范围，从根本上来说是当前美学发展的需要。

前面已经讲到，“美的规律”、审美活动的规律是由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容、结构和功用制约的，因此，准确地界定和扩大美学研究范围，应该放在整个文化系统来考察。

关于文化，有的理论家把它归结为精神生产领域，还有的理论家把它归结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与上述理论家不同，我们遵循苏联当代著名美学家 M·C·卡冈对文化的理解。卡冈认为，文化虽然是自己的所有成分有机相联的某种整体，但它仍然被划分为三种相对独立的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但是它们的区别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文化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则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至于艺术创作，它是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互相溶为一体，产生出某种性质上独特的现象——艺术。^⑦如果我们旨在准确地界定和扩大美学研究的范围，那么就必须依据文化中的这三个基本层次。因为审美定向、审美原则、审学性质、审美价值、审美体验，既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之中，也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和艺术活动之中。

关于物质生产活动，大家知道，它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的劳动活动过程的环境条件的形成和发

展，劳动成果是否符合人的多方面的需要等等。如果说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那么物质生活中的审美活动也是人的最基本的审美活动，精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都是由它派生的。

关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美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曾作了全面的阐明。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深刻地指出，人作为普遍的生产力，他可以创造各种迥然不同的物品，而且是在摆脱了每个个人的直接物质需要的情况下生产的。并强调指出，人具有能够揭示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尺度的创造能力，“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⑧马克思在这里明明讲的是物质生产，却不用“生产规律”、“客观规律”等字眼，而用“美的规律”。这无非是说，物质生产不仅增殖社会财富，而且还培养和发展人按照“美的规律”理解和创造物品的能力；不仅可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还可以提供高尚的精神享受。其实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一部工业设计理论的基本点。

工业设计作为审美活动的特殊形式，它是把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审美活动和通常所说的非审美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实用艺术活动。或者说实用艺术在工业范围扩大的结果，是美学渗入技术、艺术闯进生产的结果。它通过被现代工业所创造的日常生活用品、劳动工具等来传达一定类型的艺术趣味，从而实现群众性的审美文化交流。按其对人的审美影响来说，它比其他任何审美活动形式都要广泛，日益成为确立高尚艺术趣味和发展人的美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美学中要想避开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审美活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

总之，揭示物质生产劳动中体现的审美因素，对我们扩大美学范围似乎是最有前途的，因为它揭示最基本、最富有群众性的人的活动的审美内容。另外，它将对我们的清蕴涵在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的愿望得到发展和增强，因为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以最大众化的形式体现审美的本质。对艺术的审美价值的需要和掌握，是同人们对蕴藏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的美学的需要的增长，同掌握美学的价值紧密地、辩

证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的美学应该广泛地研究物质生产范围内“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塑造”这一重大课题，来提高美学对劳动人民的审美教育中的作用。

人按照美的规律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精神领域。精神生产是意味建立科学的理论、概念等等。精神文化是观念的，在实践的活动中变成物质力量。精神领域的审美活动包括人的行为（通常说的人的关系美）、科学创造、体育运动、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各种庆祝活动等等。这里面虽然有的还未被美学充分研究，但它们都是一种实践性的艺术活动，属于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方式。

在精神领域的审美活动中，首先要提到的是道德与美的关系，正如苏联美学家尼·阿·德米特里耶娃所说：“当人类社会把美的概念从物质的领域推广到精神领域中去的时候，首先是推广到道德关系方面。”^⑨这是因为道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不仅贯穿于人类各个社会形态，而且还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道德体现的是个人与整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以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⑩我们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身就包含巨大的审美内容：个人的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着的意愿和人类意愿相一致，以充分发展“人自身”，丰富人的本质，发掘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美。因而，培养马克思主义道德也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塑造”。道德教育主要是使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而这种精神上提高的有力因素就是美感的发展，它会使人的思想意识高尚起来。这样，道德的形成和美感的形成就合而为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学起到未来的伦理学的作用。

在精神生产领域里，科学活动中的美学问题，一方面是美学原则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科学的伟大成就给人的美的感受和感动。一般情况看来，科学是追求真，但在科学活动中往往也在追求美，使科学真理中的真与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法国著名数学家阿·大·马认为：“在我们用下意识所形成的巨大组合中，……只有若干组合是谐和的，因而同时是美的和有用

的，它们能够激起我们的特殊的几何直觉。这种几何直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组合，从而使它们得以被我们意识到。特殊的美感是一个独特的筛子，只有那些依赖自己的和谐而成为真理的东西才能通过它。特殊的科学美感也是科学创造性的一个标志，它在科学发现中，往往是有意识的证明活动的先导。没有美感的人，很难成为发明家。”^⑪理论物理学家韦尔也曾说过：“我的工作总是力图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是选择美。”^⑫从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科学家在创造活动中往往与艺术家一样，以对美的追求作为自己创造的重要动机。

另外，科学创造同人类的其它一切创造活动一样，它不仅包含着认识，也还包含着对科学创造的劳动成果的美感愉悦。对奇异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及其高度和谐的揭示、对自然规律显示的美、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感觉、对人类依靠科学获得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权的认识等等，由此引起的喜悦却和艺术家在创作中获得的美感一样强烈。苏联的B·恩格里加尔特院士曾讲过：“就科学家的创作成就所带来的欢乐情感的力量和深度而言，完全同于艺术家在完成其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情感的性质和力量。这也就是只有人才能感受的最强烈、最高尚的快感……。”^⑬总之，美学是科学最积极的环节，而且在今后，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创造的审美动机的意义也将会越来越大，科学创造作为人们内心的满足和人类精神力量的美感的泉源将日益广泛地吸引人们的兴趣。

在精神层次，除道德和科学创造以外，文化教育、体育运动等，都与美有直接关系，因此它们也都属于美学科学范围之内。

以上我们强调了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中的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范围的重要意义，但这并不否定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否定美学与艺术的密切关系及其历史渊源，把一般的艺术理论从美学领域排斥出去，以致将艺术活动的原则、特征消融在其他审美活动方式中去。艺术作为人的审美活动最高阶段的产物，它最能充分地表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社会审美理想的最重要的表现领域。社会审美文化的一般水平都取决于艺术，取决于它的艺术思想成熟的程度。因此，我们的美学更应该深入探讨艺术中的美学

问题，特别是要深入地探讨一些部门艺术的美学问题。

从以上我们对文化系统中的三个基本层次的分析来看，这三个基本的不同领域、不同美学学科中，由于各有其特殊成分和专业范围，因此又会出现各种美学分支。如技术美学将会出现工业美学、商品美学、经济美学等美学分支；实践美学将会出现教育美学、体育美学、科学美学等美学分支；艺术美学中有“单体艺术美学”和“多体艺术美学”，“单体艺术美学”包括小说美学、散文美学、诗歌美学、音乐美学、雕刻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等。“多体（或叫综合）艺术美学”，包括戏剧美学、电影美学、舞蹈美学等。我们只有这样充分地考虑到了它们的多层次性质，才能准确地界定和扩大美学研究范围。

- ① 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84页。
- ② 同上书，第179页。
- ③ 同上书，第273页。
- ④ 奥夫相尼科夫：《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9页。

- ⑤ A·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6页。
- ⑥ 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文化艺术出版社，第98—99页。
- ⑦ 参见M·C·卡冈的《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 ⑧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51页。
- ⑨ 尼·阿·德米特里耶娃：《审美教育问题》，知识出版社，第30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 ⑪ 转引自刘大椿：《科学活动论》，科学出版社出版，第219页。
- ⑫ 转引自钱德拉萨克：《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载《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4辑，第75页。
- ⑬ 转引自П·A·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陶原珂



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

——论汉代抒情赋

何天杰

在汉赋中，抒情赋与那些铺采摘文、飞扬踔厉的大赋相比，只能算作是一条浩瀚巨流中的不惹人注目的几朵小浪花。时代相隔并不太久远的屈原、宋玉们在楚辞中的那种疾痛惨怛、缠绵婉转的哀唱，到了受楚辞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汉赋当中，只传来了微弱的回响。汉代抒情赋数量的相对稀少，似乎在证明着：主要由楚人所建立的汉王朝中，抒情的传统已被人们忘却和抛弃。这种传统几乎截然中断的现象，即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汉代以及汉代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评论家们在给赋作定义或论述赋体特征的时候，都只说它的细腻描写、铺陈连类、言志讽谏、丽辞美文，而绝少把赋与“情”挂起钩来的。^①直到刘勰，才在《文心雕龙·论赋》中提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把赋中之“情”视为体物与丽辞之间的中介环节。不过，刘勰此说却主要地是在魏晋以后抒情小赋大量涌现的基础上提出的，未可视为对汉代抒情赋特征的理论总结。

作为汉赋重要组成部分的抒情赋，长期以来遭到了冷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毕竟是不正常的。这种状况不仅使汉赋研究难以深入与全面，而且影响对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脉络的准确把握。故笔者不揣粗疏浅陋，草此拙文，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从先秦的楚辞到汉代的抒情赋，有一条相当清晰的发展轨迹，这就是炽烈的情感色彩的渐次消褪，而以冷静的理智抑制感情的倾向日益增强。也就是说，在屈原那里，是情胜于理；而在

汉人这边，是理胜于情。

屈原的辞多作于被迫离开楚宫廷之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对家国命运前途的焦虑，由身处窘境仍不放弃对仁政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产生的强热的激情，都汇聚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他的辞作的主旋律。从理智上屈原已清醒地意识到在怀王、顷襄王这批庸主的治理下的楚国国运颓亡之势的不可逆转，但在感情上他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强烈冲突在屈原的辞作中掀起了哀怨缠绵的巨澜，回荡反复，不能自己。屈原的人格之美同时也是在他对社会习俗的反抗和哀吟中得以实现的。从他的“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高唱中，我们见到的不是随机应变或喜怒不形于色的苟且之徒，而是一位不惜以生命去殉自己理想和信念的勇士，是一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②以生命谱写出瑰丽诗篇的诗人。可以说，正是这种不为任何权威、理智、说教所遏抑的激情，使楚辞获得了衣被百代的艺术成就。

但是，屈原那种奔涌的激情在汉人的抒情赋中却悄悄地消失了。尽管“悲士不遇”是汉人抒情赋中的永恒主题，但从贾谊开始，“同生死、轻去就”，便成了汉人抒情赋的基调，成了他们超然物外的思想武器。这种巨变的原因，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寻找。

汉王朝的诞生，是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随着君权至上的理论主张和行政措施的被付诸实践，帝王成了社会上一切活动的轴心，而臣民则成了帝王意志的

附属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许慎的《说文解字》把“君”解释为“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就再清楚不过地透露了个中消息。在帝王的淫威之下，臣民甚至连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感情的权利也没有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得罪宣帝被革去爵位之后，没有按照“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的惯例，而倡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并且“采贱贩贵，逐什一之利”，还要“烹羊烹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结果惹怒了宣帝，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被处以腰斩，③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事实上，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政治局面的结束，汉人们已经失去了屈原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这种现实在汉人抒情赋中的反映，就是“情胜于理”让位于“理胜于情”。

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汉王朝的君主们还有意识地先后推崇道家 and 儒家的学说，儒学在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至汉元帝时甚至上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道、儒二学的盛行，对两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老庄都讲顺应自然，全性葆真，似乎并不否认情欲是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是，老子由“物极必反”、“祸福相倚”出发，庄子从“齐物我”、“等生死”起步，都站在超理性的立场上证明情欲之扰人害生，从而走向了禁欲主义的个体养生：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同上）

“得失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所谓悬解也。”（《庄子·大宗师》）

“将盈嗜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庄子·徐无鬼》）

老庄否定情欲的主张在汉代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淮南子》的“嗜欲者使人气越，而好憎者使人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

耗”自不必说，就连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未能免俗，在《论衡》中不止一次地大谈“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老聃得以寿矣”，“归之于命，委之于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起来。了解了这种思想氛围，我们对贾谊的《鹏鸟赋》为何基本上是《庄子》、《道德经》、尤其是《鶡冠子》这些道家之言的合成，张衡的《髑髅赋》为何从文字到思想内容都是《庄子·至乐》的推衍，也就不难解释了。汉代的抒情赋作家尽管也忧虑现实，也有生不逢时的牢骚，但他们大抵善于从老庄之道中寻求自我解脱的妙方。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刘歆的《遂初赋》、扬雄的《太玄赋》、冯衍的《显志赋》、张衡的《归田赋》等等，无一不是用老庄的以理智摒弃情欲之说来寻求心理平衡的。

老庄的禁欲主义理论在两汉大行其道，实质上是个人与以王权为代表的社会发生的冲突中，个人不得不屈从社会的现实在哲学思想领域的反映。从这点上说，老庄的主张与儒学的主张可谓殊途同归。儒学的情欲理论与道家略有不同的，是它不否认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在此前提下，它主张通过教育、政治舆论等手段对情欲加以节制。

孔子注重感情的自然流露，他可以“学而时习之”、“闻韶”而乐，也可以因颜渊之死“哭之恸”。④不过，他仅于喜哀好恶诸情赞同，于怨、怒却是不提倡的。孟子则较孔子为通脱，他不再一般性地排斥怨怒之情，他甚至还把恻隐、羞恶等感情活动也与仁义礼智挂起钩来。⑤但是，孟子认为礼比食色亦即人的欲求更为重要，实际上已开了后世荀子“以礼制情”的先河。与孔孟关于情欲的片言只字的说明不同，荀子的论述较为详尽。基于“人性恶”的认识，他反复强调“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也”，“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⑥明确地提出了“以礼节情”。但是，荀子的这一理论对臣民显得毫不含糊，对君主则极为矛盾。他一方面反对君主“急逐乐而缓治国”，一面又主张“为人主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⑦将君主的物质享受连同强权一齐视为君权的标志与必要组成部分，这不仅给他的学生李斯、韩非制造的君主可以极欲的理论留下了漏洞，而且使他的“以礼节情”理论本身显得不够完

满。因此，秦汉之际的儒家后学在吸取别家学说长处的基础上着手修正、完善孔孟荀的情欲理论。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⑧的音乐理论的启迪下，他们提出了“礼因人情”的思想，力图将“节情”由外部的带强制性的规范转化为人心内在的自我欲求。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补充的“节情”说，随着鉴于秦王朝由于君主极意声色，放纵情欲导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而于汉文帝时代开始的君主教育思潮的兴起，已将其对象由臣民扩展到包括君主在内的全社会。这样，荀子“节情”说中的“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⑨的“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⑩的理论罅漏，也得以补正。新的“节情”说在具体方式上要求情欲的“中节”，这在《中庸》中表述得最为完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至董仲舒，更把阴阳家说引入儒学的性情理论，用“以性制情”最终找到了“中节”的途径，汉儒的节情理论就此完成：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惟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

……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桎，与天道一也。……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轭其情以应天？”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⑪

汉儒“节情”理论的完善，使节制情欲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连汉武帝因伐大宛得千里马喜而作歌，也受到汲黯的正颜直谏，^⑫仅此亦可见“节情”思想渗入汉人意识之深了。也正是如此，随着儒学的日隆，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大批的节情赋作。班婕妤因畏成帝所宠的赵飞燕之陷害，自请到长信宫奉养太后，作《自悼赋》。以切身之痛而作，到了唐人手中可以敷衍出一篇幽怨难已的宫怨诗来，可她在自伤身世之余，居然能“《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用历史上曾发生过妻妾相争来自我安慰，节制感情。班彪于西汉末的大乱中避居梁州，作《北征赋》览古伤今，发出“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的哀叹，却又能“夫子固穷，游文艺兮，乐以忘忧，唯圣贤兮”中得到排遣。此外，如班固之《幽通赋》、

班昭之《东征赋》、蔡邕之《述行赋》、祢衡之《鸚鵡赋》，有着相同基调的节情之赋，不知凡几！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汉人对屈原及其辞作作了不尽符合事实的评价或争议。但是，不管是对屈原的忠君爱国人为地夸张拔高的刘安以及司马迁，还是指责屈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扬雄；不管是认为屈辞“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班固，还是疾呼“《离骚》之文，依托五经而立义焉”的王逸，他们的思想武器不外是道、儒二学。他们对屈原在辞作中所表现的人格、情感的时代隔阂感，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道、儒的以理制情的理论对汉人影响之大、禁锢之严。

二

在检索汉代抒情赋作之中，我们发觉了一个甚为有趣的现象：绝大部分的抒情赋都是以骚体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为题材而写成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才有所改观。

究竟如何来理解这一现象呢？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⑬这对启发我们解释上述现象的思考，当不无裨益。

如上文所述，汉代是一个“以理制情”的时代，但是，“以理制情”的利剑却未能斩断汉人们感物而动的天性，为数众多的汉人的悼屈赋，就是他们这一天性的表现形式。在汉人悼屈赋中，较为出名的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庄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扬雄的《反离骚》、班彪的《悼离骚》、梁竦的《悼骚赋》、王逸的《九思》等。历来人们对这些赋作是贬多于褒的。班固认为汉后楚辞“其失巧而少信”，^⑭刘勰的“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⑮也包含着对汉人悼屈赋的指斥。朱熹选编《楚辞集注》，更把《楚辞》原本中的《七谏》、《九怀》、《九思》删去，理由是它们“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⑯。明代杨慎在《文心雕龙》评中说：“屈原《楚辞》，有疾痛而自呻吟也，东方朔以下拟《楚辞》，强呻吟而无疾痛者也”，实亦朱熹之见的阐发。

诚然，与屈原的眷恋故国，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相比，自宋玉、唐勒、景差辈便瞠乎其后者，难以为继了，更遑论汉人。但据此论定汉人悼屈赋全为无病呻吟，毫无个人感情，则近于武断

了。贾谊以少年英才，遭绛、灌等老臣的妒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追伤之，因以自喻”，能说他毫无个人感情吗？东方朔巧言善辩，才高志雄，然“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武帝根本不算委以重任，而只让他在身边“诙啁而已”，他在《答客难》中抒写了怀才不遇的愤懑，能说这种感情与他在《七谏》中的哀怨之情毫无共通之处吗？王褒的赋固然多为歌功颂德之作，然观其《圣主得贤臣颂》的“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便知他还不是以弄臣自甘的，可他的任务不过是随宣帝游玩打猎，“所幸歌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或写赋给得病的太子解闷，说他毫无牢骚，显见非实。再如刘向，可谓终生与专权的宦官、外戚抗争，数遭逮捕贬斥。他给元、成诸帝的奏章“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他还为同志者之死伤感而作了《疾谗》、《救危》、《谏要》、《世颂》等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其类也”，这里的古事，不正包括了他在《九叹》中哀怨的屈原之事吗？还有梁竦，他作《悼骚赋》的动机，《后汉书》所记颇详：他受兄弟梁松一案的牵连，被“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仅举数例，便可了解汉人之悼屈原并非皆作无病呻吟者。在以理制情的社会氛围中，汉代的抒情赋家选中了以其人格受到社会普遍尊崇的屈原作为抒情的题材和对象，实则包含着以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内涵，是对时代精神的不自觉反抗。

再从形式来看。挚虞《文章流别论》曾说：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亦与此意相类。这里的古诗之赋指楚辞，今之赋指汉赋。且勿论对楚辞“言省而文有例”的评价是否得当，但对汉赋（主要指大赋）的指责却是一针见血！应当说（以“铺采摘文”为主要特征、在创作上有一套程式化了的的表现手法的大赋，实在是不适宜抒情的。尽管在汉人辞赋评论中于此并无明确阐述，但在汉人抒情赋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他们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大赋无力担负抒情的任务。所

以他们才力图在大赋的程式以外寻求适宜于抒情的形式，他们首先选中了楚辞。因为楚辞有“抒情与唯美的倾向”，⑩抒情倾向可以弥补大赋不宜抒情之不足，而唯美则可以使抒情赋与大赋不至于有太大的差距。同时，主要由楚人创建的汉朝中楚辞及楚歌有极深的传统，汉代抒情赋借重楚辞形制，也易于为世人所接受。从形制结构与句法上来看，楚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虚字“兮”的大量使用。它不仅使辞作节奏跳荡，声调悠扬，而且使辞作家之情抒发得摇曳多姿。姜亮夫先生直以为它“表情之宕荡恣睢，含意之富赡而采润，则古今无出其右者矣”，⑪闻一多、林庚、马茂元诸先生亦有相似意见。确实，汉抒情赋因模拟楚辞的写法而用“兮”字及长短句式，使它与大赋形制上的平板有了较大差异。时风所尚，无怪乎北人出身的董仲舒、司马迁，也在其《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赋》中“兮”呀“兮”呀起来，典型大赋作家司马相如在写抒情赋作《长门赋》、《哀秦二世赋》时也选择了楚辞体形式。必须指出，汉人向楚辞形式的学习，有着为后人所漠视了的深刻意义。这种表面上显得拙劣的模仿，在“以理节情”弥漫着的全社会的汉代，实际上包含着保持抒情传统的努力，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但是，事物往往有其两面性。屈原不仅以其高洁的志行为汉人做出了榜样，而且肆其情志，“自铸伟辞”，“惊采绝艳”，使他的辞作在艺术上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一个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慑服于屈原的汉代抒情赋家们对楚辞的不由自主的模拟，却使汉代抒情赋从一开始（在贾谊那里）便陷入了泥淖而不可自拔。他们是在创作实践中才渐渐懂得这点，并以创新代替因袭的。

屈骚是中原理性注入楚辞抒情传统中的产物，这决定了它的性质是“怨刺上政”的政治抒情诗。汉代抒情赋对楚辞的模拟，无形中先天地划地为牢，使自己抒发的感情围绕着政治中心转动。从这点说，汉代抒情赋与因帝王好恶而兴衰的大赋初无二致。而汉代抒情赋家既无屈原时代纵任性情的社会环境，也缺少屈原那种不惜殉身的决心，因之他们的作品便徘徊于既要继承楚辞的抒情传统，又要节制情性的矛盾之中。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只有从新的抒情题材中突破一途。在这里，王褒的《洞箫赋》颇值得注意。它的重要，倒不是对箫的制作，声音感人的细腻描写，反复渲染，而是它基本上属非政治抒情，大

约亦即好赋的汉宣帝所称道的“小者辩丽可喜”一类。可惜的是，王褒本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在赋中仍不时宣扬“赖蒙圣化，从容中道”，兼之当时社会环境仍不允许过多地抒发与政教无涉的个人感情，故终西汉之世，他的首创几乎嗣响乏人。直至东汉中期之后，苏顺、张衡、祢衡等人才乘其余波，在非政治抒情题材中找到了突破口。

从形式上来看，汉抒情赋之模拟楚辞颇受后人讥议，人们或称其为骚赋，或称其为绍骚，或径称其为楚辞。^⑩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组成部分，汉代抒情赋如果始终停留在对楚辞形式的模仿上，那么它与大赋之间难免总有一条鸿沟。于是，汉代抒情赋家开始了形制上的新的探索。大赋之不宜抒情不仅是因为过于铺陈，而且在于它采用韵、散夹杂的句法，不少大赋在首尾部分为了交代事由及议论说理而纯用散文句法。这种散文化倾向使大赋抛弃了楚辞还多少保留着的《诗》的低回反复、一唱三叹的节奏，这使大赋更难以胜任抒情。但是，随着大赋作家对形式华美的刻

意追求，从王褒的《洞箫赋》起，大赋从总体而不是偶然的句子中出现了骈俪化的趋向，这一趋向发展的结果使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诗的节奏，向诗回归。这种变化对汉代抒情赋家不无启迪。于是，从东汉开始，就有人试图纯用赋体来抒情了。如果说安、顺帝时代的苏顺的《叹怀赋》在这方面是一次不很成功的尝试，那么张衡的《归田赋》便可称作成功的创新。试看他的“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吊长流”……，不正是在铿锵的节奏中抒发对黑暗政治的激愤之情吗？以后，又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尽管这类纯用赋体写成的抒情赋在数量上不足与骚赋相比，但它代表着抒情赋的发展方向。不如是理解，那么魏晋以后纯以赋体写成的抒情小赋的大量涌现，便难以说明了。汉代抒情赋家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探索和努力，掀开了抒情赋的新的——页，这一劳绩，后人是不应忘记的。

- ① 详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第一篇第一章。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张少康《文赋集释》认为“陆机关于诗赋的‘缘情’、‘体物’的论述，我们应当看作是一种互文见义的说法”，但陆机于此论述了十种文体的特征，为何于碑诔等其余八体未闻互文见义，而独于诗赋则称互文见义？于原文之体例殊不合，当为张先生一时疏忽。故不取。
- ②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 ③ 见《汉书·杨敞传》。
- ④ 见《论语·学而》、《论语·先进》。
- ⑤ 见《孟子·告子》、《孟子·公孙丑》。
- ⑥ 见《荀子》的《修身》、《性恶》、《礼论》等。
- ⑦ 见《荀子》的《王霸》、《富国》诸篇。
- ⑧ 《礼记·乐记》。

- ⑨ 《荀子·君道》。
- ⑩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 ⑪ 引文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仁义法》。
- ⑫ 见《史记·乐书》、《汉书·武帝纪》。
- ⑬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页。
- ⑭ 见《汉书·地理志》。
- ⑮ 《文心雕龙·情采》。
- ⑯ 朱熹：《楚辞辨正》。
- ⑰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篇第三章。
- ⑱ 《楚辞学论文集·〈九歌〉‘兮’字用法释例》。
- ⑲ 分见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王逸《楚辞章句》等。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函授学院

责任编辑：刘斯翰

关于俞秋圃其人及龚自珍 四首诗作的系年问题

——《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补正

樊克政

读了《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所载刘逸生先生的《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以后，笔者认为，刘先生指出王佩诤先生校本《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的《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以下简称《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与《张诗龄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三首）“编年明显有误”，是很正确的；不过，刘先生对赠张诗龄三首诗写作年代的具体考订，似乎还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刘先生文中所涉及到的俞秋圃其人，也尚待查考。同时，刘先生认为《太常仙蝶歌》系年有误的观点也还值得商榷。现不揣简陋，试为补正，不当之处，望刘先生和其他方家指正。

一

这里先从俞秋圃谈起，因为尽可能搞清楚俞秋圃其人，特别是他生活的年代，是直接关系到《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编年是否有误的问题。

关于俞秋圃其人，诚如刘先生所说：“其生平难考。”不过，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卷十二《琵琶》中，倒有一则关于他的记载，节录于此：“琵琶本胡乐，……近时能者甚多，工者绝少。……近惟有吴门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称善手，以此技遨游公卿间，亦今之贺老也。”不仅如此，嘉、道间名诗人陈文述（1771——1848）的《颐道堂诗选》中，也曾一再提到俞秋圃，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俞秋圃有一定帮助，摘引如下：

卷九页十五有《琵琶行，听云间余（按，应为“俞”，当系刊刻之误，诗中“俞家指法出苏家”句及以下诸条均可证）秋圃弹〈玉树后庭花〉》。

卷十一页十三有《过也是园吊李味庄观察》。诗中有云：“留得敬容残客在，攀条犹为说生平。（自注：林远峰、俞秋圃、改七芟、家竹士，皆观察旧客也，往来余幕中，说公遗事。）”

卷十二页二十一——二十二有《云间舟次对月听秋圃弹琵琶，并订重九细林携琴之约》，诗中有“俞生琵琶天下奇”句。

卷十六页二十一——二十三有《秋夜青溪水榭玩月，听吹笛女子楚鬟奏〈霓裳羽衣

曲》，因赋长歌赠之，并书白香山《霓裳羽衣诗》后》。其小序云：“余曩在建威将军宅，听边月华琵琶弹《白翎雀》。又在吴门听云间俞秋圃弹《玉树后庭花》，皆有诗纪事。”

卷十九页十五——十六有《玉树堂月夜，听俞秋圃琵琶弹《海青》、《夕阳箫鼓》、《玉树后庭花》诸曲，并出《琵琶谱》及同人赠诗，乞余作序，诗以赠之》。诗中有云：“十年我向江南住，听汝琵琶凡几度？华亭明月苏台树，酒边饱听新声处。……自惜生平抱绝技，名流海内投诗篇。檀槽解作琵琶语，乌丝还有琵琶谱。一卷新书乞我传，排当细向灯前数。”

卷十九页十六——十七有《听琵琶之次夕，月明如昼，花影满庭，秋圃为余鼓琴，奏《梅花三弄》、《鹤舞洞天》、《海鸥忘机》三曲，诗以记事》。

卷二十一页二十四有《为俞秋圃刊《琵琶谱》感赋》（六首）。其第一首自注云：“陈隋调即《玉树后庭花》，君独得不传之秘。”第二首自注云：“云间女士姜西梅，君琵琶弟子也。”第五首自注云：“君录同人赠诗为《海情集》。”

按，“云间”系江苏松江之古称。“也是园”即上海之南园。毛祥麟《墨余录》卷七云：“南园，古渡鹤楼，一名也是园，在邑之西南隅。”“李味庄”即李廷敬，曾在上海任苏松太道。“苏台”指吴县。又，陈文述，浙江钱塘人，嘉庆五年举人。历摄江苏宝山、上海、常熟等地知县，并官江都知县等。自嘉庆十二年后，其眷属曾长期侨寓于吴县。

综合以上资料来看，俞秋圃系江苏松江人，为琵琶名手，善奏《玉树后庭花》、《海青》、《夕阳箫鼓》诸曲，又能鼓琴。常往来于苏州、华亭、上海、松江一带，出入于地苏官的幕中。他曾著有《琵琶谱》一卷，又曾辑录友人赠诗为《海情集》。说他是清代一位久已湮没的音乐家，看来是不过分的。

关于俞秋圃的生卒年，尚未见记载。上引见于《颐道堂诗选》的组诗《为俞秋圃刊《琵琶谱》感赋》之第五首云：“霓裳残谱托知音，玉树堂前烛影深。读到海情旧题句，枪怀何止感人琴。”“人琴”系悼念之词。联系该组诗之第六首所云：“分明胡马度阴山，仿佛文姬入汉关。此是当年广陵散，肯令遗响绝人间？”（自注：君病中贻书，以兹谱相托。）可知该组诗显然作于俞秋圃去世以后。这里应当说明，《颐道堂诗选》虽未明标系年，但此书所收诗作实际是按时间先后编次的。该组诗之前，同书卷二十一页四有《山塘新建柳依依祠》，其小序有云：“依依字灵和，广陵女子，……道光乙酉，吴中好事者为建祠山塘清节堂左。……聿观厥成，因为诗以志之。”知系道光五年（乙酉）所作。该组诗之后，同书卷二十一页二十五——二十七有《海运感事诗（有序）》，亦为道光五年所作^①。显然，组诗《为俞秋圃刊《琵琶谱》感赋》只能是作于道光五年，故俞秋圃卒年之下限当不晚于道光五年。又，上面提到的《玉树堂月夜，听俞秋圃琵琶……》与《听琵琶之次夕……》二诗表明，当陈文述作此二诗时，俞秋圃还健在。从二诗在《颐道堂诗选》中的次第来看，当均作于道光二年以后^②，故俞秋圃卒年之上限当不早于道光二年。

既然俞秋圃卒于道光二年至五年间，这就充分证实，龚自珍的《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诗不可能作于道光十年。

关于《张诗龄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七绝三首，刘先生对于第二首所云“去年扈从东巡守”及第三首自注所云“君去年出山海关，今年游西山”的理解是：“张祥河是在嘉庆二十三年以内阁中书身分随驾出山海关，到沈阳协办祭扫事宜；那么，‘今年游西山’，自然就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了。”由此认为：“这三首诗改系于嘉庆二十四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然而，《清史列传·张祥河传》明载：“嘉庆二十五年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清史稿·张祥河传》亦载：“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二传均未说张祥河在中进士前已任内阁中书。对此，刘先生的解释是：“张祥河在中进士之前已任内阁中书，中进士后仍回到中书任上。只因《清史列传》及《清史稿》行文苟简，没有交代清楚而已。”并说：“笔者说张祥河在嘉庆二十三年已官内阁中书，并随扈出关，是毫不违背当时情况的。”其实并非如此。查张祥河之子张茂辰等所撰《先温和公年谱》载，张祥河于嘉庆十二年中举人，嘉庆十三年随父入京，应会试，未中。嘉庆十四年“挑取誊录”。嘉庆二十年“充会典馆绘图官”。直至嘉庆二十五年应会试，方才中进士，“殿试二甲，授内阁中书，充会典馆校对官”（见该年谱各年条）。该年谱中，并无张祥河于中进士前已任内阁中书的记载。如果张祥河在中进士前确曾已任内阁中书，其子在写年谱时自然不会不记。又，孔宪彝、鲍康《内阁汉票签中书舍人题名》（咸丰十一年刊本）页七十八亦载：“张祥河：……嘉庆二十五年由进士到阁。”可知张祥河确是于嘉庆二十五年中进士后，始任内阁中书，而非于嘉庆二十三年就已官内阁中书。在这个问题上，《清史列传》与《清史稿》并不存在“行文苟简，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

那么，张祥河是否曾于嘉庆二十三年以其他身分随驾出关呢？也不。张茂辰等《先温和公年谱》嘉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条载：“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三岁，……七月出都，由淮、徐至金陵、杭州，九月回里（按指江苏娄县）。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四岁，春至杭州，秋至扬州，十一月偕顾荃士姑丈入都，仍客董文恭公邸第。”又，查张祥河《小重山房初稿（道光间刊本）·诗八》页五有《十一月六日，偕荃士北行，春木诸子饯别河干，赋此却寄》诗，该诗系嘉庆二十三年所作^③，故可知张祥河于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始北上赴京。而据《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载：嘉庆二十三年“七月甲子，上东巡启銮。……八月……辛卯，谒永陵，……九月丙申朔，谒福陵。丁酉，谒昭陵，……辛亥，上迴銮。……冬十月……丙子，上还京。”可见，清仁宗顛琰嘉庆二十三年的出关“东巡”之行，始于七月二十八日（甲子），终于十月十一日（丙子）。其时，张祥河尚远南方，没有也不可能随驾出关。

既然张祥河并未于嘉庆二十三年随驾出关，则龚自珍的《张诗龄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七绝三首，自然也就不可能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可见，刘先生关于这七绝三首应“改系

于嘉庆二十四年”之说，尚不能成立。

张祥河究竟是于何年随驾出关的呢？查张茂辰等《先温和公年谱》，张祥河生平只有一次随驾出关，其事在道光九年。该年谱道光九年条载：“九年己丑四十五岁，充方略馆纂修官，……八月，扈蹕盛京。九月，赐文绮，登医巫闾山。十月，回京，蒙恩加一级。时祁春浦先生（嵩藻）、许滇生年丈（乃普）亦以供奉随扈，每散值，必联吟行帐中。比返，得《沈阳纪程诗》五十首。”按《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载：道光九年“八月……庚辰，上奉皇太后谒盛京祖陵。九月……丁未，上谒永陵。……己酉，……上谒福陵，……十月，乙酉，上奉皇太后还宫。”可知清宣宗晏宁确于道光九年八月十九日（庚辰）至十月二十四日（乙酉）间出关东巡。又，张茂辰等的记载，从张祥河的《小重山房初稿》中，也可得到证实。该书《诗十六》全系有关“扈蹕东巡”之诗。其中如《通州城外》、《行帐二首同许滇生作》、《出关》、《雨夜渡萨尔浒》、《兴京》、《盛京》等诗题，很清楚地勾画出一条离京赴关外的线索。《行帐二首同许滇生作》之第二首云：“扈随那省有尘劳，黄幄东巡庆此遭。辽海风烟秋戍静，榆关星月夜天高。”此诗正可印证《先温和公年谱》道光九年条所云：“许滇生年丈（乃普）亦以供奉随扈，每散值，必联吟行帐中。”《诗十六》共有诗作五十一首，这与《先温和公年谱》所说“得《沈阳纪程诗》五十首”亦相合（五十乃约数）。显而易见，《小重山房初稿·诗十六》的这些诗作，当即张祥河道光九年所作之《沈阳纪程诗》。另，张祥河《诗舲续稿（民国八年刊《小重山房诗词全集》本）·关中集》页二十七有诗题为《余性喜鹅。道光九年，扈驾盛京，至红墙，上赐生，枢臣因得一鹅，随行六十六日……》。《诗舲续稿·来京集》页十三《十月二日，恩赐紫禁城骑马，恭纪》诗自注亦云：“道光九年，随扈盛京。”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先温和公年谱》关于张祥河于道光九年随驾出关的记载是确凿无误的。

张祥河既是于道光九年随驾出关，可见《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所云“君去年出山海关”之“去年”，是指道光九年，而“今年游西山”之“今年”，则当指道光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七绝三首，只能是作于道光十年。

三

最后，再来看看《太常仙蝶歌》。关于这首诗，刘先生一方面依据该诗小序中“姚公者，太常少卿仁和姚公（祖同）也”一语，认为该诗“写于姚祖同在太常寺任内之时”；另一方面又依据《清史稿·姚祖同传》指出：“姚由河南巡抚降补太常寺少卿，乃是道光二年以后的事。至道光五年，姚再授陕西按察使，六年回京，七年又到广东任按察使。”并谈到：龚自珍于道光三年七月因丁母忧离京，“道光四年至五年均居忧在乡”。由此得出结论：“龚氏在京写诗给姚祖同，只有道光二年至三年七月前始有可能。”“龚自珍写《太常仙蝶歌》必不能迟至道光七年。”因而提出：该诗“旧系于道光七年（丁亥），误。应改系于道光二年之后，三年之前”。同时，刘先生还指出：“龚氏诗序中所谓‘公为大吏历五

省’，指嘉庆二十年任河南布政使，二十一年调山西布政使，又调直隶布政使，二十四年升安徽巡抚，二十五年调河南巡抚，是为‘五省’。其后道光五年任陕西按察使及七年授广东按察使，则已历七省了。这亦是此诗不能系于道光七年之证。”

龚自珍写《太常仙蝶歌》，真的“只有道光二年至三年七月前始有可能”吗？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〇五载，姚祖同系于道光二年“十二月，补太常寺少卿”。而龚自珍《致邓守之书》有云：“天寒岁暮，……兄冒三十三日之冰雪，踉跄而归。家严、慈幸皆无大恙”（《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从信中“或者柳子厚所云：黔其庐，赭其垣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禄之相我耶”可知，信当写于道光二年龚家藏书楼发生火灾（参见《龚自珍全集》页三〇八《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所附自记）之后的同年十二月。显而易见，写信之时，龚自珍已返抵南方（上海）家中，计其行程，其离京时间当在同年十一月（当时，姚祖同尚未任太常寺少卿）。《太常仙蝶歌》小序中既称姚祖同为“太常少卿”，则该诗写作时间无疑不可能在道光二年。那么，该诗是否会作于道光三年春龚自珍返京后至同年七月呢？也不会的。因为以下几点可以说明，该诗旧系于道光七年，尚不能否定。

首先，应当看到，《清史稿》卷三八一《姚祖同传》关于姚祖同于道光“七年，授广东按察使”的记载，是不够具体的，因为该传并未言及姚祖同被授广东按察使，是在道光七年的几月。这样，该传就易于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姚祖同道光七年并不在京。但事实却不然。查《清宣宗实录》卷九十四载：道光六年正月“甲申，……命陕西按察使姚祖同来京，寻以四品京堂候补。”同书卷一二八载：道光七年“十月戊子，……以广东按察使周锡章为湖北布政使，候补四品京堂姚祖同为广东按察使。”可知姚祖同于道光六年正月初二日（甲申）被调离陕西按察使任，次年十月十六日（戊子）被任命为广东按察使。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又，《续碑传集》卷十，张履《浩授资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姚公神道碑铭》云：姚祖同曾于道光七年“八月，奉命偕刑部尚书陈公若霖赴湖北京山县察勘王家营隄工”。查《清宣宗实录》卷一二四载，道光七年八月辛卯有谕：“王家营隄工，……现已派陈若霖、姚祖同前往详勘。”同书卷一二七载，道光七年十月丁丑有谕：“前派陈若霖、姚祖同前往详勘湖北王家营隄工，计此时当已抵楚省。”可知姚祖同系于道光七年八月十八日（辛卯）前被派往湖北，同年十月初五日（丁丑）前尚未还京。这样，姚祖同道光七年的实际在京时间至少应为，该年正月至八月上半月。而道光七年龚自珍正在京（据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故道光七年的八月上半月以前，龚自珍完全有可能在京为姚祖同写《太常仙蝶歌》。

其次，从《清史稿·姚祖同传》来看，姚祖同于嘉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曾相继被任命为河南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安徽巡抚、河南巡抚，职务虽有五种，实际却仅历四省，而并非如刘先生所说，“是为五省”。事实上，只有加上姚祖同于道光五年始任的陕西按察使，才够五省。由于广东按察使之职是直到道光七年十月十六日才任命的，所以，无论龚自珍在道光七年的正月至八月上半月之间的任何时候为姚祖同写《太常仙蝶歌》，自然都要说“公为大吏历五省”了。可见，姚祖同道光七年以前的任

职情况，并不能成为否定《太常仙蝶歌》作于道光七年的理由。

第三，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太常仙蝶歌》系于道光七年，并不自王佩诤先生始，而是始自龚自珍本人。查道光原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卷尾，龚自珍跋云：“余自庚辰之秋戒为诗，于骛言语简思虑之指言之详。然不能坚也。辛巳夏，决藩柅为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诗二百九十篇，……不自割弃，而又涂次之，录百二十八篇，为《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两例，存馀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亦见《龚自珍全集》页二四三，题为《跋破戒草》）该跋末署：“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由此可知，《破戒草》《破戒草之余》系龚自珍于道光七年十月亲自所编。需要说明的是，道光原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均为系年编次，而《太常仙蝶歌》即见于《破戒草之余》页六——七的“丁亥”诗内。既然《太常仙蝶歌》系于道光七年（丁亥）是龚自珍本人所为，这就进一步说明，此诗非道光七年所作的可能是性是不存在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既然《太常仙蝶歌》作于道光七年八月上半月以前，但其时姚祖同并未任太常寺少卿，而是以四品京堂候补，那么，为什么诗中却对姚祖同以“太常少卿”相称呢？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一般说来，诗文中对某人官职的称谓，与该人其时所任的官职是一致的；但当该人辞官以后或在京候补时，其友人的诗文中，对该人则往往仍以原任官职相称。如：龚自珍道光六年作有《京师春尽夕，大雨书怀，晓起柬比邻李太守（威）、吴舍人（嵩梁）》诗（见《龚自珍全集》页四七四），其时便是李威已辞广州知府任，在京闲居之时（据《岭云轩琐记》卷端《李威传》）；龚自珍在《与吴虹生书〔三〕》中称吴荣光为“荷屋中丞”（《龚自珍全集》页三四九），其时便是吴荣光“以京卿需次”（《筠清馆金石文字》卷端《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即已由湖南巡抚“降为四品京卿”（《清史列传》卷三十八《吴荣光传》），在京候补期间。

当然，在这类情况下，其友人诗文中对该人所谓的原任官职，大多是该人前此的最后一任官职（如以上二例）。不过，也不尽然。如《己亥杂诗》第一一二首自注提到“陈静菴博士”，“陈静菴”即陈杰，据《清史列传》卷七十三《陈杰传》载，他曾“官钦天监博士，迁国子监算学助教，以疾归”，可知他引疾辞官前的官职是国子监算学助教，而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谓的则是他最初所任的官职。又如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九有《重九得潘绂庭书，知宾谷榘使歿于都门，感赋二首》，“宾谷”系曾燠的字，“榘使”即盐运使。据《续碑传集》卷二十一，包世臣《曾抚部别传》载，他于“乾隆……壬子……授两淮盐运使，……嘉庆丁卯擢湖南按察使”，此后相继任湖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道光壬午……特命公以巡抚銜视两淮盐政。丙戌召还，以五品京堂候补。庚寅卒于京寓。”可知曾燠卒于以五品京堂候补期间，他前此的最后一任官职是带巡抚銜的两淮盐政，按理可称“中丞”（如潘曾莹《红蕉馆诗抄》卷五有《哭曾宾谷中丞，呈顾南雅学士文并寄吴兰雪刺史》），而陈文述所谓的却是他早先在乾、嘉之际所任的官职。由此看来，龚自珍在《太常仙蝶歌》中不用姚祖同以四品京堂候补前的最后一任官职——按察使（或称廉访）相称，而以其在京候补前的倒数第二任官职——太常少卿相

称，并不奇怪。

总括上述，笔者认为《太常仙蝶歌》原系于道光七年并无错误，该诗不应“改系于道光二年之后，三年之前”。

① 《海运感事诗（有序）》原未署作年。该诗小序有云：“余于嘉庆庚午……撰为《海运议》。……今年春至袁浦，会高堰溃决，黄流阻运，复以此议言之观察梁公荏林，深以为善。并言之相国孙公、制府魏公，亦均以为可。”“袁浦”即清江浦。据此可知，作该诗之当年，陈文述曾到清江浦，因运道阻塞，而向“相国孙公”、“制府魏公”等提出海运之议。查陈文述《颐道堂文抄》卷十三页十四《万廉山司马传》中亦云：“乙酉春，余以运道梗塞至淮，诣节相孙公、制府魏公问起居，言引黄借运不可恃，请行海运。”将此处文字与上引《海运感事诗》小序相对照，两处所说的显然是同一件事，故知《海运感事诗》小序中所说的“今年春”，即《万廉山司马传》中所说的“乙酉春”。由此可见，《海运感事诗》系作于道光五年（乙酉）。

② 此二诗之前，《颐道堂诗选》卷十八页二十八—二十九有《哭曼兄》。“曼兄”指陈鸿寿（为陈文述族兄），其号曼生，卒于道光二年（据秦祖永《桐阴论画》下卷《陈鸿寿》）。显然，《哭曼兄》当作于道光二年，故可知《玉树堂月夜，听俞秋圃琵琶……》与《听琵琶之次夕，……》二诗当作于道光二年以后。

③ 《小重山房初稿》中的诗作虽未明标系年，但实按写作时间之先后编次。该诗之前后，同书《诗七》页一有《戊寅春正五日，申浦访李心庵农部，留饮易园竟日》，《诗八》页八有《己卯正月三日，过黄左田师并西书屋，观历年手画岁朝图赋呈》，故可知《十一月六日，偕荃士北行，……》诗作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刘斯翰



也谈模糊聚类分析法 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与张铁明同志商榷

李忠海

《学术研究》于1985年第5期发表了张铁明同志题为《教育现象的模糊性及对教育理论数量化研究的几点启示》(后简称《启示》)一文,其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现象的模糊性”和“研究教育现象的模糊性的现实意义”两方面问题。这对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启示的。《启示》的“入截矩阵与教育中的相似分类”一节,指出依多科的总分和平均分去划分分数段是不够合理的,并指出分数类属方面的模糊性,也是正确的。但在继续论述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所举的例子中所列的“五名高考生(S)的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六科(X)成绩的隶属度的集合”不过是考生成绩表用模糊数学的语言的再现,并且指代也不明确。从文章中无法看出隶属度表示的“隶属”指的属于哪个模糊集合。

模糊数学谈隶属度首先要指出一个模糊集合 A ,其次才谈到论域中的元素对模糊集合 A 的隶属度,并且一般取值于 $[0, 1]$ 。

二、对学生成绩的聚类是经典聚类分析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模糊聚类分析是对具有模糊性事物的聚类,比如由于各种因素使学生成绩本身造成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反映学生成绩时可用“模糊数”来表示。这种数是经典聚类分析所不能处理的,而这正是模糊聚类分析法的用武之地。另外,学生成绩被认为是一定分数之后,如果不考

虑分数与学生实际情况的差异时,学生成绩是不带有模糊性的。因此,这里应用模糊聚类分析有越俎代庖之嫌。

三、《启示》指出模糊聚类分析可用于“对教师的组织管理和学生编班施教,以及对于大学招生和研究生录取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应用。《启示》中指出在其所述的例子中,“就以上5个学生的成绩来说如录取2人,就应是 S_1 和 S_5 ,而不是 S_3 和 S_5 ”。对于这种录取方式的根据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推断: S_5 成绩最高因此应该录取,而 S_1 比 S_3 更相似于 S_5 ,所以 S_1 比 S_3 强,尽管 S_3 的总成绩高于 S_1 的总成绩。如果我们这样推断是符合作者的思路的话,那么这种推理的根据是什么?这样的推理真能推出 S_1 比 S_3 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里只举一例说明这种推理的不合理性:设有三名考生的各科成绩如下表所示:

	X_1	X_2	X_3	X_4	X_5	X_6	ΣX_i	\bar{X}
S_1	76	58	44	22	81	46	327	54.5
S_3	54	56	76	90	52	68	386	64.3
S_5	86	68	54	32	91	56	387	64.5

由于《启示》中没有明确说出其聚类步骤和所有算子,这里处理数据是用《启示》中提到的海明距离求其相关矩阵,并用最大——最小算子求其

等价关系矩阵，用入截取可得：

当 $0.9 < \lambda \leq 1$ 时，各自分为一类，即三类： $\{S_1\}$ ， $\{S_3\}$ ， $\{S_5\}$ ；

当 $0.725 < \lambda \leq 0.9$ 时，分为两类 $\{S_1 S_5\}$ ， $\{S_3\}$ ；

当 $0 \leq \lambda \leq 0.725$ 时，分为一类： $\{S_1 S_3 S_5\}$ ；

聚类结果和总分顺序皆与《启示》中所举之例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可得结论：如果在这三位考生中录取两人，那么应该录取 S_1 和 S_5 。但从考生成绩的具体情况看有下述情况存在： S_3 的总成绩比 S_1 多59分，并且 S_1 有两科成绩在50分以下，而 S_3 的各科成绩均在50分以上。这就不能不怀疑《启示》中的推理有一定的问题。这种问题产

生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的录取标准有问题。从 S_5 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其总成绩最高，但有一科只有32分，能说他是一名真正的好学生吗？并且以总分最高录取 S_5 ，又怎样说明其合理性？另一种是所用的数学工具是否合适，如我所用的数学工具就出现了上述难以让人接受的结果。

《启示》中所出现的上述不足也许是出于偶然，但却影响了全文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故不揣冒昧提出来与张铁明同志商讨，以示相互交流切磋之意。

作者单位：吉林省东北师大数学系
责任编辑：石 成



“李清照有子”说质疑

郑宏卫

官桂铨同志在《李清照儿子徙居泉州》（见本刊198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李清照有子，且其子徙居泉州。此说大有商榷余地。

官文立论据于道光《福建通志》卷193《宋侨寓传》中的如下一段话：

建炎南渡，存诚以徽猷阁帅广东，与思诚俱行，秩满，以泉南俗淳，乃自羊城抵泉，家焉。

后思诚历中书舍人，以宝文阁制守泉，明诚以集英殿修撰帅金陵，卒于官，诸子亦徙居于泉。

官文贸然把“诸子”断为清照之子，不妥。因为“诸子”一词，可作多种解释，一指赵明诚的儿子，且至少有两个；二指赵明诚的儿子和侄子；三指赵明诚的众侄。据王仲闻考定，“赵挺之孙可知者有二人：一名恬、一名谊。”他还认为“未知此二人为存诚子抑思诚之子”（《李清照事迹编年》，《李清照集校注》），把明诚排除在外。思诚也确实有子，宋人李弥逊《祭赵道夫待制文》中有“有子而贤”之语。而且，明诚之母先明诚南下，死于江宁。其母不会单独南下，当与其二兄或其中之一偕行。后明诚奔母丧南下，不久起复知江宁府事，因此存诚与思诚俱行入粤时，李家诸子可能留在江宁，直至明诚卒后，他们才徙居泉州。据此看来，“诸子”一词作明诚的众侄解较为信而有征。

据现存有关李清照的史料来看，宋人确认明诚无子，并无只字提及清照有子。翟青年在《稽史》中述及明诚收藏的三代鼎彝等南渡后“悉为盗斂”时，叹息说：“所存者九牛之一毛，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洪适在《隶释》中辑录了《金石录》中的汉碑题跋，并为作跋。跋中虽说“赵君无嗣”。《隶释》成书于1166年，距清照之卒仅十几年，跋中言明诚无子之事，谅必不致有误。

再从现存的李清照作品来看，除了《打马图序》中有“使儿辈图之”一语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有关她有子的迹象来。相反，倒有“尝药虽存弱弟”（《投翰林学士綦密礼启》）、“怜杞妇之悲深”（《祭赵湖州文》）等语暗寓无子之意。至于“使儿辈图之”一语，清人俞正燮在《易安居士事辑》中认为，“盖易安无所出，儿辈乃格非子孙”。结合宋人记载来看，俞说比较在理。再说，明诚卒时，清照已46岁，倘有子，该早已成年，她也晚年有托，不必去依靠自己的弟弟，更不至于“晚节流荡无归”（王灼《碧鸡漫志》）了。



一部有见解的论著

——读《陶渊明论略》

曹 础 基

陶渊明是一个普遍得人喜爱而又被人热心研究的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着眼于对其进行阶级分析，判定其为进步还是落后、甚至是否反动的性质上。从文学本身，也曾围绕着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过论争。这虽并非毫无裨益，但对陶渊明研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近十年来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局面已经改变。

李文初同志的《陶渊明论略》一书，是新形势下的可喜成果。它是作者十多年来在教学、科研上所花心血的结晶。细读全书，我感到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全面地、系统地去评述陶渊明及其创作，而贯注于研究中的症结，不避枝经肯綮，进行条分缕析。因而它是言之有物的，是一本有见解的评陶之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之有见解，首先表现在不泥古。如《诗品》关于陶渊明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历来人们只在其评价是否公允上产生过异议，而没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是钟嵘说的。李氏却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从钟嵘上推至陶渊明还不到九十年，何以谓之“古”？又从有关古籍记载中归纳出齐梁人称汉以

前为“古”，而并不称魏晋为“古”的结论。进而又具体地分析了这八九十年间被《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列入“隐逸传”、“处士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诗人；《诗品》中称作“处士”、“征士”的诗人又皆在陶渊明之前或与之同时，没有源出于陶渊明的，故无所谓“宗”。从而认定今本《诗品》中这一句话不出于钟嵘，怀疑其为唐以后人读《诗品》时批语所窜入。说得有理有据，论证严谨。

作者之有见解还表现在不从众。学术研究是不以多数为标准的，而且以人云亦云为大忌。目前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有一些意见是“权威性”的，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如陶渊明享年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多定为六十三岁；《形影神三首》是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是批判佛教思想的；晋宋之际，玄风对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好的等等。但李文初同志经过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如谓陶渊明的生年、享年当抛弃沈约的说法而以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为是；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当为始仕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参军，而非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形影神三首》与批判佛教毫不相干；陶诗的意境、风格、语言特色都可看出玄学的启发

与影响，因而“我国美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生巨变、诗歌艺术引起重大创新、整个文坛呈现出新的转机，究其原因，恐怕与玄风大有关系”。此外，还认为自然与名教的和谐统一构成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核心；陶诗风格的主要特征可以“自然美”三字概括等，都很有新意，诚为作者长期读书、思索、积累而来，而绝非一时兴致可得。从《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陶渊明评价的来龙去脉是摸索过一番的，并常常以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朱自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每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都不但靠见识，而且靠工夫。在论证方法上，常把文字训诂、史实考证、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如在《论陶渊明之隐》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晋宋之际人们对隐逸的多种理解与不同态度；提出所谓隐者有朝隐、充隐、形隐、心隐几种类型，然后阐明陶渊明之隐是颇近心隐的一类。他如《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中对生死观的纵向、横向的分析比较，《陶诗的理趣》中对“自然”之义的推敲，都体现了一种

踏实、细致的学风，而无空言泛论、随感意测之弊。

文学本身具有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对陶诗的评价，过去主要以社会学的眼光，这是必要的，今后也不可少，因为社会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陶渊明论略》中《论陶渊明之隐》、《陶谢诗的比较研究》等篇，正是从社会关系上、从整个时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剖析、廓清了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同时作者又较多地从美学的角度对陶诗的艺术特色给以细心的分析，《陶诗与魏晋玄风》、《陶诗的理趣》、《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等都多方面地揭示了陶诗的美学价值。特别是对陶诗自然美的解剖，大有助于读者鉴赏能力的提高。如果能参阅作者的另一本著作《汉魏六朝诗歌赏析》中对陶诗的解说，则可得益更多。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王正宪教授谈治学育人

初春的一个早上，我们采访了我省著名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正宪。这位年近七旬的学者，虽病体初愈，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了他治学育人的一些体会。

王正宪教授1917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35年~193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获法学士，1941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夏，他怀着一股报效国家的热情，毅然放弃国外高薪聘请的机会，携同夫人潘孝瑞女士回到祖国。王正宪教授先在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任教，院系调整后转入中山大学。由于我国教育在过去曾经有过失误，不太重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山大学一度取消了经济系，王教授被调到地理系达30年之久。因此，他在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直到1982年他才重返经济系当教授。1983年他转到管理系，并兼任领导职务。1985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成立，王教授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学院院长。同时，他还担负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任务。王正宪教授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现任中国世界经济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学会理事，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统计学会副会长，广州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美国国际企业经营学会会员，香港学术刊物《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季刊》（英文）国际编辑委员会委员、香港国际亚洲研究中心荣誉会员等职。

几十年来，王正宪教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发表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从1942年

起，他就开始研究我国的金融、货币、物价、计划管理等问题。先后发表了《战争时期重庆地区组别物价的研究》、《汇兑管制论》、《论农民消费及其稳定性》（英文）、《计划经济与工业建设》等论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凯恩斯主义和中国的货币政策》、《经济特区和我国就业问题》、《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跨国公司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封建主义与我国企业管理》（英文）等文章，对我国的金融货币问题、特区经济问题、国际经济等问题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王教授说：以前，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西方经济学，1948年才开始学习《资本论》。回国以后，我加强自修马列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教学和科研，几十年来，我教过10多门课，包括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工业地理、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给我们开创了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局面，使我有生以来所学的科学知识，在这几年特别感到有用场。我真想将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的祖国，我的学生。

关于治学问题，王教授指出：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在研究过程中应容许提出不同意见。因此，（1）学术领域应和宗教领域不同，应容许百家争鸣，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2）学术领域中也不容许少数服从多数，因为真理常常是少数人先发现的；（3）学术研究应不断发展，应容许跳出已有的框框，容许对教科书和他人著作大胆提出怀疑。因此，学术研究决不是人云亦云；它应当鼓励独立思考，探讨新途径和提

出新问题。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一篇学术论文应当掌握充分而翔实可靠的资料，应当有严谨缜密的分析，并应用已有的各种分析方法和工具，甚至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而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学术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如果仍囿于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掌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应用各种分析方法和现代化工具（包括国外经济学中的），又容许对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解决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

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研究的关系问题，王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政策是经济学在政治上的体现，但经济学的研究并不等于经济政策研究。因此，经济学的学术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等同。否则，经济学就无法前进。例如，马寅初的人口论和孙治方的利润观点都曾不幸地被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今后应引以为戒。

王教授接着说，当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界，迫切需要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制造一个充满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的学术环境。因此，第一，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提倡学术自由，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第二，高等学校的经济院系要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应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基本分开，在课程设置上容许有很大的不同。第三，在经济研究中应建立正确的学术标准。今后评价经济学著作，一定要看它是否资料翔实，论证严谨，论断中肯，见解新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及是否有益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第四，在选举财经院校及经济理论界的各级领导人时，应特别注意他们

是否懂得学术，是否懂得如何办学，以及懂得划清学术与政治界限。另外，掌握英、法、俄、德四国语言的王教授还认为，在当今各国经济发展日益互相渗透，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一个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必须学贯中西，才能扩大眼界，不致偏颇，分析问题才能得出比较精辟的结论。他建议，在综合性大学中，应重视俄语教学，把俄语作为一门重要的第二外国语。

近几年来，身为院长的王教授多次应邀出席欧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与全院同志一起，为建立、繁荣、发展我国的经济管理学呕心沥血。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该院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管理教育课程和教材，聘请海内外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来院讲学，不断选派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王教授培养学生素以严谨著称。他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培养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多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自1983年起，他开始培养国际企业专业的研究生，同时积极推荐有才华的学生出国留学。

谈兴越来越浓，但时间已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就请王教授谈谈他近期的学术研究计划。他说，最近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国际企业经营、利用外资、特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等问题。他还告诉我们，目前国内的《国际经济学》的翻译本不很理想。如果精力允许的话，他想结合中国的特点，写一本《国际经济学》或《国际企业经营》，另外摘些专题研究，如“国际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等。听了王老这番话，我们感到高兴，也深受鼓舞。

衷心祝愿王老今后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湛明）



夏书章教授谈行政管理学在我国 的建立、应用及其发展

行政管理，是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和政府组织同时存在的，但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长期酝酿以后，伴随着《行政学概论》（1926年，L·D·怀特著）和《行政学原理》（1927年，W·F·魏劳比著）的相继问世才正式宣告诞生的。行政管理学刚从政治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旋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历史、人为的因素，这门学科的发展一直是缓慢和曲折的。时至今日，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有没有改变？我们应该怎样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初夏的一天，记者来到了美丽的康乐园里，拜访了我国著名的行政学专家夏书章教授。

夏书章教授，生于1919年，是江苏省高邮县人。早年曾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先后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行政学研究院。1946年回国，在江苏学院任教，1947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授至今，其间历任教研室、系、所行政职务，校教育工会主席、副教授、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副校长等职。1980—1981年，应聘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兼纳布拉斯加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在雅鲁、弗吉尼亚、密苏里、加州等大学讲学。1984年，应邀为香港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学术演讲。现在，夏教授是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副组长。

数十年来，夏教授除了从事繁重的行政领导职务和教学任务之外，还在科学研究的园地上潜心钻研，辛勤耕耘，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迄今为止，已经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章，并相继出版了《管理·伦理·法理》（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人事管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高等教育管理学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市政管理八议》（同上，1985年版）、《行政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即将出版的有《管理·心理·医理》、《从“三国”故事谈现代管理》等，从而引起了政治学和管理学界同行的注目。

夏教授知道了记者的来意之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行政管理学在我国建立、应用和发展的情况。

他首先告诉我们，行政管理在各种管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如果搞得不好，效率低，就会严重地影响到其他管理效能和效益的正常发挥，从而拉经济建设的后腿，拉生产力发展的后腿。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弊端诸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虚职、副职、兼职过多，效率低，没有一套严格的、科学的干部考核、晋升和退休制度等等，正严重地影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因而，对行政管理学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曾经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什么都要和资本主义“对着干”，似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学科名称，都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因而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难以理解的现象。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学这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都被一一取消了，其根据据说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有这些学科！其实，看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在于这门学科的名称本身，而在于它的内容和实质，在于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难道我们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就不应该有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为此，夏书章教授曾于1982年初在人民日报撰文大声呼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值得欣慰的是，自此至今不过短短几年，对于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有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正朝着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前进。这种情况，雄辩地说明，行政

管理学对于我国，是极其需要的，亦是很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它完全可以而且必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一种其他学科所代替不了的独特作用。

那么，这是否预示着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已经在我国备受重视并进入了学科的初创阶段？夏教授对此持肯定的看法。他认为，这门极富潜力的学科，其发展前景肯定是无可限量的，但它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目前尚处于一个刚刚开始阶段。要在这个原来就荒芜的园地上建立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如要总结过去我们行政工作中好的经验，注意调查研究，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找出现行管理中的弊端，认识其危害性，并研究这些弊端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应该怎样去改进和消除它；此外还有搜集有关古今中外的详尽资料，以供参考和借鉴，避免走弯路；在这过程中，同时要拟定计划，肯下本钱，增加投资，以充实和加强研究机构，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师资和科研队伍。所有这些措施和办法，都是构建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这座“大厦”不可缺少的“工程”。但除此之外，当前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工作，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说它无专业可言，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其实，有人类就必然有管理，有国家、政府就必然有行政管理，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个中的学问确实是甚多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在今天，人们对这门新兴的学科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还有继续大力宣传、介绍之必要，力求使人们对它能够有一个正确、公正、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第二，由于行政管理学是从外国尤其是美国发展起来的，因而适当介绍他们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可以为我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提供参考和借鉴。但是，决不能离开我国的国情，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照搬外国的一切，不仅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有时甚至还要起反作用的。这是因为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同的社会制度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照搬照抄，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只是一个模式。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自己的特点去办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

人之长，补己之短，力图创建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学科来。第三，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最为密切的学科，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一门实干的学问，因而要真刀实枪地在应用方面下功夫。而目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不实干的空对空似乎才算是学问，而实干的反倒不成其为学问，这实际上又是一种误解。行政管理学如果脱离了实际，任凭你讲得天花乱坠，那也是没有用的，更加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的，因而研究这门学科，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而必须把它和当前的改革联系起来，为改革服务，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当然，行政管理学又是一门有着严密理论体系的学科，我们重视其应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它的理论性，恰恰相反，我们要尽量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第四，人事管理，是改革行政管理学的突破口之一，而提高人的管理素质，则又是人事管理重要的一环。因而目前需要大力抓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以充实师资和科研力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轮训大量的在职干部，因为这些干部一般都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强烈的做好工作的愿望，对行政管理现存的弊病、危害感受良深，有切肤之痛，也意识到改革这些弊病是当务之急。这是他们学习、研究行政管理学的有利条件，而事实上，他们也是研究这门学科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假如能给他们增加一些关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必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篇访问记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夏书章教授为史策同志编著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话：“在我国，行政管理毕竟还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渐受重视的新的学科领域。其建立、发展、充实和提高，很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及有关方面的热情关怀、支持或扶植。我们衷心地希望并且深信：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行政管理学也将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的，我们正翘首以望，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能够尽早在神州大地上建立和发展起来，能够充分地发挥它对四化建设所起的应有作用。同样地，我们也衷心祝愿夏书章教授身体健康，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达才）



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1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

由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历史学会和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4月23日至25日在广州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共86人，提交论文53篇，就下列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

怎样估价廖仲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课题，到会同志把国共合作分为四个阶段，对廖仲恺在其间的作用作相应的探讨。

在合作政策的提出和制定阶段，就国民党内部来说，左派势力的存在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基础。而廖仲恺在当时国民党左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从而对合作政策的提出和制定起了多大的作用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合作的准备阶段，廖仲恺成了国民党内主张合作的领导人，他担任孙中山的联俄使者，两次赴日本与苏俄代表谈判，加深了相互了解，加速了合作的进程；他本人在此时期树立了联俄联共的坚定信念，不仅赞成改组国民党，而且欢迎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反复开导反对或怀疑改组的国民党人，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先决条件。

在合作的确立阶段，廖仲恺发挥了核心关键作用；他主持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和临时中执委，负责选派代表、草拟党纲、党章和改组宣言、审议报告等筹备工作；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反对在党章中加入不利于国共合作的条文，否决限制共产党人的提案；他提名部分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

在合作的实行阶段，廖仲恺是坚决的捍卫者

和执行的模范；他信任和重用共产党人；他领导了黄埔军校的筹建，亲任党代表；他统一广东财政，为国共合作、整军和巩固党基提供物质保证；孙中山逝世后，他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全力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与各种分裂势力作斗争。

所以，不少人认为，廖仲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所奠定的。

关于廖仲恺与“扶助农工”问题

与会代表指出，廖仲恺对“扶助农工”政策的阐释与贯彻，是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但在如何估价廖仲恺扶助农工的贡献和作用时则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廖仲恺扶助农工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理论上，他把对待“农工阶级”的态度当作区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标准，深刻认识到工农的作用，认为“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国民革命“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强调农民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才可以解救自己。在实践中，他坚决维护工农利益，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行径。他深入工农，帮助组织工会、农会、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他亲任罢委会顾问，设法解决在罢工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工人运动的榜样。在某些问题上，他还超过孙中山，如镇压商团叛乱，就比孙中山坚决。

另一种意见认为廖仲恺扶助农工思想有局限性，他虽然强调工农的作用，但他把自己摆到救世主的位置上，来拯救农民，这是一种低估人民群众力量的唯心主义表现。此外，不能说他在某些方面坚决而认定他在扶助农工问题上对孙中山

有所发展，超过孙中山，因为他始终忠实执行、贯彻孙中山的思想和政策。

关于廖仲恺对平均地权的认识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其认识水平低于孙中山，如他在《孙中山平均地权诠释》里，没有对“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加以解释和发挥，未涉及解决农民土地，只限于土地的增殖如何归公的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廖仲恺与孙中山对平均地权的认识没有高低之分，其实质一样，都鲜明地反对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土地，反对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

关于廖仲恺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问题

对这一问题，代表们较多地讨论了廖仲恺的社会主义思想，肯定他对社会主义的探求和介绍，但在廖仲恺本人有否社会主义思想问题上，有人认为廖的思想虽然与时俱进，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过渡，但并无重大突破，而且新民主主义思想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只能说廖仲恺思想预示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有人则认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没有绝对的鸿沟，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是可能的。

廖仲恺所处的时代，中国流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在肯定廖仲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代表们就其社会主义思想性质展开讨论，有几种不同看法：一，空想社会主义；二，主观社会主义；三，“单税社会主义”即民生社会主义；四，合作或实践的社会主义。

与会者认为，廖仲恺一生经历了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因此，其思想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实现早期到晚期的飞跃。但在估价这一飞跃的程度时，有人认为，廖仲恺虽然早期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在晚年又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但这只是斗争的需要，而且他始终没有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终其一生的思想仍停留在旧民主革命的范畴，无任何资料足以证明其晚年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有人则认为，廖在晚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认为中国将来的前途应是社会主义；他赞同和主张采用苏俄模式；在实践中，他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实质上是对革命动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因此，他的思想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就纳入了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边缘，如果不是“廖案”的发

生，他必将会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者。

关于廖仲恺的直接民权思想，有人认为以往那种以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不是廖仲恺所新创而断定其直接民权思想“仍旧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范围”，没有新的东西的观点有简单化之嫌，它忽视了“五四”运动对他的深刻影响，指出，正是“五四”运动中广大民众政治上的主动精神和伟大力量，使他有了新的进步，从而向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过渡。

关于廖仲恺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问题

代表们认为廖仲恺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他首先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满之患”，而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制度落后，指出“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要变革社会政治制度，扫除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军阀，这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与会代表还进一步探讨了廖仲恺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主张实行平均地权和发展合作社经济；重视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特别是铁路建设；主张统一财政和军政；裁减、废除厘金；进行货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提倡组织近代的专业化生产；打破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代表们认为廖的经济思想不仅丰富，而且有独到之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实现，本身也有局限性，基本上属于实业救国思想范畴，在某些方面带有主观空想的性质。

在讨论廖仲恺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关系时，代表们指出，由于战争的环境和当时的财政困难，以及廖主要负责财政工作，导致了其经济思想难以在实践中体现，因此，其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着怎样解决财政困难而进行。代表们肯定廖在整顿广东财政从而解决财政困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对其成绩估价时，有人认为他在民初进行的工作对缓和当时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有成绩的。有人指出，他在1923—1925年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未能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也未能完全统一广东财政，就此而言，他不是成功者。有人则主张不要孤立地分析其作用，认为廖死后宋子文在财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与廖生前所作的努力分不开的。

（史学会）



广东理论界举行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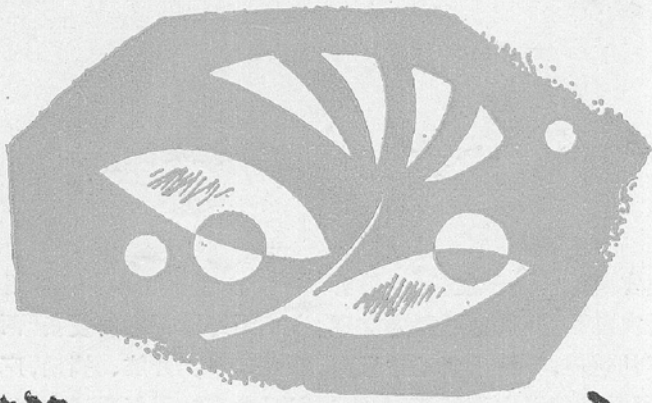
今年7—8月，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发表50周年。7月1日又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文章。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发扬“两论”的精神，及结合领会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文章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广东省社科联特于7月8日邀请了我省30多位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举行了“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两论”既是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几十年来，这两篇著作一直是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教材，也是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有力武器，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学习和研究“两论”，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同志们认为，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既要反对自由化的观点，又要反对僵化的观点；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这是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又一深刻的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

同志们认为，“两论”在我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①“两论”仍然是我们认识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社会性质的有力武器。《实践论》抓住主观与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以社会实践为中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认识过程的矛盾运动，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客观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主、客观矛盾统一的辩证途径，全面地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法认识论。它说明，只有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认识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而《矛盾论》则指出了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运动，并据此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从而阐明了客观辩证法，也揭示了主观辩证法即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它教导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具体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两论”仍然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贯穿于“两论”的基本思想，就是主观与客观、理论同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的统一，而要达到这个统一，是必须解决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这些环节包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各个时期矛盾变化的状态和特点；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③“两论”仍然是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理论武器。过去党内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改革、开放、搞活的过程中，僵化思想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对旧体制、旧制度、旧思想的迷恋之上，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新的东西可能触及和“危害”它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学习、领会“两论”的基本精神，反对唯书、唯上，反对僵化思想，反对官僚主义，无疑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与会有些同志在充分地肯定“两论”的巨大的理论价值的同时，还提出要在新时期运用和发挥“两论”的思想，就必须注意三个问题：①是要搞好应用环节。要发挥“两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功能，就必须把它通俗化和具体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②是进一步克服左倾思想影响，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抽象的公式，僵死不变的教条。③是不能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看成是一劳永逸的。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仍然要自觉地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达才）



学术研究

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总第八十三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0.5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 075 号
本刊每逢双月二十日出版